SHU
BAO
HUA
JIU

郑逸梅

书报话旧

學林出版社

书报话旧

郑逸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队 图书馆

学林出版

责任编辑：陈政文
封面设计：赵宜生

书报话旧　　郑逸梅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80,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600册

书号 7259·002　　定价 0.62元

作者近影(时年八十八岁)　　郑有瑛摄

的，甚至还有私人花钱出书，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许多书报，怎能都看到，都能记忆，更不可能个人拥有这许多书报；就是公家拥有了，经过时局和人事的变迁，也不可能保存无缺，那么以实物作为佐证，也就难以完全办到。

我对于书报虽然爱好收藏，但限于资力，不可能大量收购；即使能买，居室地方狭小，也无法储藏。况且解放前我苏沪迁徙，又遭战乱，家室被毁，书报损失很多。以后虽一再补购，还是没有恢复原状，若把它作为资料，那是有限极了。这样是不是知难而退，不搞了呢？搞还是要搞的，只能尽我所看到的，所回忆的，以及平素掌握的，并参考有关刊物的记载，同时访问了当时的有关编辑及工作人员，他们讲给我听，我把它写出来；至于好不好，完备不完备，是另一个问题。我以为有了这个底子，以后有人写作，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纠正补充，那岂不是不好的也就好了，不完备的也就完备了。这是开荒工作，古人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步工序。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我这里所谈的书报，都是属于文史性的。民初，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量出现的时期，谈到书报，当然不能摈弃这一类不谈。但我也不打算多谈，因我在《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的史料部分，写了十万言左右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已谈得很多，再谈未免重复，不如略举一、二有代表性的作品，举一反三，以省笔墨。

总之，我写这本书，无非供新闻出版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参考，所以每谈一书一报，只把书报的内容等等，作一介绍，不加批判，因为以往的不少书报，其思想内容和取材，需要批判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大有批不胜批，判不胜判之概。况且本书不是一本书评，也不是一本报评；加之我政治水平不够，也

就只好注重资料而忽略批判了。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我写这本书，尚在一九六四年左右。当时系应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之约编写的，及完成，即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因此当然不可能问世了。值得庆幸的是，本书原稿在浩劫中没有被毁，后来辗转移至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秋，学林出版社把稿子交给我，并嘱我补充修改。由于我所有的文物资料已在浩劫中悉付荡然，反觉得原稿中的一些资料，目前已无从再觅，越发敝帚自珍，忘掉了自己的浅陋，把它交给学林出版社出版。不当之处，请同文及广大读者加以指正。

郑逸梅

一九八二年春

目　录

引　言…… 1

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 1
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3
高梦旦与“商务”教科书的出版…… 7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9
《续古逸丛书》的书目……12
不齐全的《丛书集成初编》……13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竞争……16
搜罗广博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
《百衲本二十四史》独缺《薛史》……21
赛铜字模的发明……25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始经过……27
林纾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30
《迦因小传》和《迦茵小传》……35
中华书局是怎样创始的……37
中华书局的图书馆……39
《中华大字典》是怎样编成的……41

"中华"的《联绵字典》……44
两种发生纠葛的书……46
丁氏兄弟创制聚珍仿宋铅字……50
鲁迅嘉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52
"红屋"——世界书局……55
三种伪书……61
章锡琛创办"开明"的经过……67
关于《辞通》……71
刊行大量笔记的文明书局……75
我国自制印刷铜版的第一人赵鸿雪……77
具有四百年历史的扫叶山房……79
最早编印白话教科书的彪蒙书室……82
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吴友如其人……84
从《申江名胜图说》中看到九十年前的上海风光……88
《申报》馆的《聚珍版丛书》及其他……89
《南社丛刻》和它的蜕变……91
南社社员所著的几种单行本……93
关于苏曼殊的作品……98
记神州国光社的代表性出版物…… 103
天主教学校的教科书与邹翰飞之死…… 106
推销革命禁书的徐敬吾…… 108
《海上繁华梦》揭发骗局…… 110
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12
《官场现形记》颇多真人真事…… 114
《庚子国变弹词》的资料从何而来…… 117
《小说林》和《孽海花》…… 120

王韬的《蘅华馆日记》手稿…… 125
《鞠部丛刊》博采众长…… 127
鸳鸯蝴蝶派典型作品《玉梨魂》…… 130
关于活叶文选…… 135
记述上海史实的几种书…… 137
一折八扣书是怎么回事…… 141
从《中国美术》一书看流入英国的文物…… 143
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 146
晚清小说的宝库《绣像小说》…… 148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几种期刊…… 150
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156
竞立社的《小说月报》和亚东破佛…… 158
早期的金石书画刊《鼎瘿》…… 160
关于《礼拜六》周刊…… 163
《新生周刊》的《闲话皇帝》引起狱讼…… 166
文史性刊物中的突出者《逸经》…… 169
《古今》与《文史》两种同类刊物…… 172
《社会日报》和《社会月报》…… 174
上海最早的报纸——《上海新报》…… 176
陈撷芬创办的中国第一张女子报——《女学报》…… 178
关于《苏报》案…… 180
两位老报人谈《申报》…… 183
《申报》为什么宣传杨乃武案？…… 190
《申报》随报附送的画刊…… 193
《申报》的收藏…… 196
史量才被刺及其他…… 199

《新申报》是怎样创办的？…… 203
报纸登载长篇小说的创始者蔡尔康…… 207
南京路上的几家报社…… 209
《新闻报》是怎样推广销路的？…… 210
《新闻报》的“财源”——广告费…… 214
上海《时报》和有正书局…… 217
《神州日报》的花絮…… 221
辛亥革命时期的号角——《民立报》…… 224
关于《天铎报》…… 228
《太平洋报》和柳亚子…… 230
对外宣传反袁的《民国西报》…… 233
《民权报》和民权出版部…… 235
反对袁世凯的《袁政府画史》…… 237
袁世凯收买报纸…… 239
《亚细亚报》两次被炸…… 242
上海的画报潮…… 244
“死作雄鬼”的朱惺公…… 248
小型报中的“四金刚”…… 251
别树一帜的《小日报》…… 258
小型报中的《大报》…… 260
大报中的小型报——《立报》…… 262

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

前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上海成立了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该馆设在麦家圈(即现在的山东路)。它除备有大小英文铅字外，并刻有中文铅字大小两种，大的等于现在的二号字，小的等于现在的四号字。

五口通商以后，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带来两个教士，一名雒魏林，一名麦都思，作为随行人员。那时麦家圈一带，都是田陇河渠，没有市面。麦都思首先在那儿建造基督教堂。由于传教需要印圣经，他们就在附近创办墨海书馆，用铅字排印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小册子。印刷机器拙笨得很，长一丈数尺，宽三尺，旁置有齿重轮二只，由两人掌握，用一头牛旋转机轴。当时人们感觉到新奇，纷纷前来参观。有好事的作了一首竹枝词："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接着他们又设立了华英书院，教授英文，把那儿的地皮逐渐圈了去，这就是麦家圈这一名称的由来。麦都思在墨海书馆旁边筑屋居住下来，作为终老之计。后来麦的儿子麦华佗任驻沪领事，麦都思又是工部局最早的董事之一，在文化侵略活动中，是个特殊人物。至于雒魏林也是不甘寂寞的，他创办了仁济医院，即现在的第三人民医院，当时规模没有这样大，是后来逐渐扩充的。

墨海书馆的编辑共两人，一个是外国人艾约瑟，另一个是

中国人王韬。王韬很有才华，别署天南遁叟，著有《弢园文录》、《蘅华馆诗》等数十种，有“长毛状元”之称。实则太平天国的状元，另有其人，和王韬无关。他和艾约瑟合译《格致西学提要》，又翻译了《六合丛谈》，那是伟烈亚力原稿，内容涉及面很广，举凡天文地理、动植矿物都有，所以译称“六合”，“六合”指东西南北上下而言，是无所不包的意思。王韬供职墨海书馆先后十多年，他所著的《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就是由该馆铅字排印的。

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巨擘，刊行了许多图书，举凡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等等，可谓应有尽有。抗日战争前，它曾以"一日一书"为号召，即每天刊行新书一种，数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创始时，没有意料到后来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商务印书馆"的名儿，望文生义，它原来主要无非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等，梦想不到将来要出这许多图书，否则这局限性很大的"商务印书馆"的名儿，决不会取的。

我有一位老同学华吟水，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数十年，掌握了许多史料。我曾经把他记载的有关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些珍贵资料加以整理，觉得颇有参考价值：原来该馆发起人只有夏瑞芳和鲍咸恩二人。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人。咸恩，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幼年同过学，以后又同事于上海《捷报》馆，为外国人排字。瑞芳精明果断，咸恩谨慎勤劳，两人性情虽殊异，可是颇能友好合作。后来瑞芳娶咸恩的胞妹为妻，更从友好而结为亲戚。《捷报》(China Gazette) 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英文报纸，经理兼编辑为英国人。他性情粗暴，视中国工人为奴隶，动辄辱骂。瑞芳、咸恩两人不甘屈服，毅然脱离《捷报》，自谋出路。那时适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奋发图强，从事文化教育的革新，印刷事业，大有前途。他们两人多年在报馆工作，精于印刷之道，于是打定主意，开始筹备

印刷机构。当时他们预计每月可以接到几笔商店、行号的小生意，如传单招贴之类，还可以替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印一些印刷品。每月如有六七百元的收入，克勤克俭，也可以维持生活了。

最初开办的资本额，原定四千元，分为八股，每股五百元，由发起人认购，可是资金不够，未能如数凑足，只得邀请教友沈伯芬认二股，计一千元，其余的股份，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四人各认一股，计二千元，高翰卿、张蟾芬、郁厚坤三人各认半股，计七百五十元，总数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数目虽不大，但当时发起人都是职工，没有多少积蓄，筹集到这笔钱已很不容易了，且瑞芳的一股，还是由他的妻子向一个女同学处挪移来的。

正式创办商务印书馆的议约，订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初三日，在三洋泾桥（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口）的一家小茶馆楼上。股金收到后，即着手购置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仅购得三号摇架二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手扳架三部，手揿架一部，以及中西文铅字工具等，所有资金几乎耗尽，后由股东沈伯芬筹划了流动金二千元，才得以周转。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阴历正月初十日正式开幕。最初的地址，是在江西路宁波路口德昌里末弄三号，为三幢房屋，租金每月五十余元。夏瑞芳、鲍咸恩、郁厚坤三人工作不分职位，通力合作。无奈流动金还感不足，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还要请高翰卿担保，那时高已升任美华书馆的中方经理，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后来营业日益有了起色，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翌年，因房屋倾塌，且不敷应用，于是迁至北京路庆顺里口，为六幢屋子，

陆续添置了大阪铸字炉、花旗印书机等。还买了四匹马力火油引擎一只，又设立了木工部。从此，它的业务中心也由印刷转到出版，在管理上全用新法，与当时官办书局袭用的旧法不同。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日本人经营的上海修文印刷局，因故停办，所有机器工具全部贬价出让。"修文"原本投资约近十万，由于历年亏损，乃由印锡璋介绍，经过几度磋商，卒以一万元代价归商务收买，计有大小各号印刷机，二、三、四、五、六号铜模以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等。商务购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业务便大加扩充，印书始用纸型，发展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出版机构。当时他们感到我国的印刷技术比较落后，便派鲍咸昌东渡日本进行考察。鲍咸昌归国后大力革新印刷技术，因此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同时推夏瑞芳为总经理，鲍咸恩为印刷所所长，其他发起人亦逐渐进馆办事，出版了好几种书籍，销路最好的，如《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由胡洪赍译注)，以及《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等。它的部分书籍改用有光纸印行，比原用毛边纸、连史纸印，便宜三分之二，因此销路益畅。

该馆在创办初期，不分官利和余利，所有盈余都并作营业资金，直到张菊生、印锡璋等投资加入时才重新估值。那时张菊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因印件关系，时常与该馆接洽业务。这时夏瑞芳正想扩充业务，准备设立编译所，拟聘张菊生主持，双方一谈，意见相合，同时印锡璋亦有意参加，就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印二人在福州路晝锦里口聚丰园菜馆商谈合资经营的办法。最后决定资本额为五万元，除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七倍升股外，余以新股招足，这是光绪二十七年(一

九〇一年)的事。

张菊生进馆后,先在北福建路西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蔡元培担任编译所所长,又请了几位学者翻译外文书。为了继续发展,不久又将编译所迁至城内唐家衖,编著和翻译各种参考用书,创刊《外交报》(杂志性质),共出十卷,译印《帝国丛书》和《地理丛书》等,又印行《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两厚册。嗣后出版严复著的《英文汉诂》,第一次使用中文书横行排版,开始应用新式标点符号及著作权印花证。

高梦旦与"商务"教科书的出版

商务印书馆编印小学用《国文教科书》(当时称语文为国文),始于一九〇四年。在这以前,南洋公学已编有《蒙学课本》,代替《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等启蒙读物。接着俞复、丁宝书等,在无锡办三等学堂,自编《国文读本》。后来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读本》,就是据它改编而成的。但这些书,既不按学制,也无所谓教授法,只能说是初具教科书的雏形而已。影响最大、最受教育界和广大学生欢迎的,是商务出版的小学教科书。

谈到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就要提到高梦旦其人。高名凤谦,福建长乐县人。他的长兄啸桐,为有名的古文家。梦旦幼时即以长兄为师。他为文不尚虚浮,在杂志上发表时署名崇有。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时,高梦旦投寄《论废除拜跪事》一文,梁阅后,大加赞赏,从此两人书札往还,月必数次。时任浙江大学堂监督的劳乃宣,看到高梦旦的文章,很为钦佩,礼聘他为大学堂的总教习。后来大学堂选派学生十人赴日本,高梦旦率学生东渡,任留学监督。他在日本考察年余,感到日本兴盛之故,首在教育,而教育又以小学为基础,因此毅然归国,决心为出版小学教科书而努力。

这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由张元济主持。高梦旦返国之后和张元济谈起出版小学教科书的重要性。张元济对此建议欣然接受,便聘高梦旦入商务,任国文部部长,主编小学国

文教科书，并请日本人长尾、小谷、加藤三人协助。他先订出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列席者有蒋竹庄(名维乔，是蔡元培就其所办爱国学社诸教员中推荐的)、张元济、庄俞等。有关教科书的内容，不管是谁提的，如大家认为有讨论之必要，就不厌其烦地讨论研究。第一次初稿完成后，高梦旦每夕携带回家，请知友们批评。他认为编辑人员识见有限，必须集思广益，才能使内容更加充实完善。第一册出版后，由于其中《天地日月》、《父母子女》、《井户田宅》几篇，首冠一幅旭日东升彩色图，非常美丽，引起小学生的喜爱，全国纷纷采用。商务在两年中出了十册《最新小学国文教科书》，深受全国教育界的欢迎，畅销十余年之久。继之张元济编《修身》十册，杜亚泉编《格致》三册，徐隽编《算术》四册，以及地理、历史、珠算等，这是属于初等小学用的。张元济、高梦旦、庄俞、姚祖晋、张景良、黄启明、谢洪赉、陆费逵还编了高等小学用的《国文》、《修身》、《地理》、《算术》、《珠算》和商业课本等，并另外编了教授法、详解等，作为教师参考。接着，又编《最新中学教科书》。从此，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就日益完备了。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狂轰滥炸，使上海遭到空前浩劫。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惨遭炸毁，烧了三天三夜，纸灰飘扬，甚至南市和徐家汇一带，上空的纸灰象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这是我国文化上无法弥补的损失。

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虽在一九二六年，但图书的收藏，于前清光绪年间商务印书馆建成新屋于宝山路后，就已开始，时为一九〇四年。

据闻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出让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索得陆氏书目，请示于该馆经理夏瑞芳。那时该馆的资产仅数十万元，夏瑞芳慨然拨现金八万元收购，以备编辑所参考之用，事虽未成，也可见他致力于文化事业决心之大。此后陆续收进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谏闻斋散出的藏书，辟涵芬楼以储藏。未几，辛亥革命成功，清宗室盛昱意园、丰顺丁日昌持静斋、江阴缪荃孙艺风堂藏书散出，商务又各购得数千百种。凡二十年间，广事搜罗新旧图书，已达数十万册之多。

一九二四年，该馆出其历年盈余中所提存的款项，计规银十一万余两，在总厂对面宝山路西兴建五层钢骨水泥大厦，移涵芬楼所藏图书，充实其中，名为东方图书馆，一九二六年对外开放。一九二九年，添设儿童图书馆，一九三一年，复设流

通部，以贯彻服务社会的初旨。

东方图书馆的五层大厦，最上层为杂志报章保存室，及商务历年出版图书保存室。四层为普通书库，占地四千六百方尺，置书架五十六排，共三百七十余架，统长一万四千八百余尺，可藏书四十余万册。四层一部分及三层为善本室，内藏涵芬楼善本书及全国地方志。二层为阅览室、杂志陈列室及事务室等。下层为流通部藏书室及事务室。馆南空场为花圃，南面建西式平房五间，为儿童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之前，藏书五十一万八千余册，图表照片五千余种，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据杨家骆的《图书年鉴》上载，当时北京图书馆藏书仅四十余万册）。其中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一百二十九种，二千五百一十四册。元版一百七十九种，三千一百二十四册。明版一千四百一十九种，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三册。清代较精版一百三十八种，三千零三十七册。抄本一千四百六十种，七千七百十二册，名人批校本二百八十八种，二千一百二十六册。稿本七十一种，三百五十四册。杂本三十一种，三百八十三册。如以旧四部分类而言，计经部三百五十四种，二千九百七十三册。史部一千一百一十七种，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册。子部一千种，九千五百五十五册。集部一千二百七十四种，一万零七百三十五册。此外一九三一年，还收进扬州何氏藏书约四万余册，部分版本正在整理，尚未计算在内。全国地方志约共二千六百六十五种，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八册，内元代纂修者二种，明代纂修者三十九种，清代及民国时期纂修者二千五百二十四种，册数更多。其中有很多孤本，如万历年《吴县志》五十四卷、《旌德县志》十卷、《临江府志》十四卷、《荆州府志》五卷、

《黄冈县志》十卷、《大昌县志》六卷、《建阳县志》八卷、《南皮县志》十七卷、《宝鸡县志》三卷。还有，仅有的抄本和原稿如李锺峨的《通江县志》、张凤孙的《泰宁县志》、魏崚的《长泰县志》、周儁的《信宜县志》、宋锦的《崖州志》、胡勋裕的《始兴县志》、周叙彝的《安南县志》、孔尚标的《同官县志》、端方的《砖坪厅志》、武全文的《崇信县志》、德俊的《两当县志》、杨镳的《复州乡土志》等，以及仅国外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的罗定权《资县志》，北京图书馆所藏尚缺卷五的苏佳嗣《长沙府志》全部，科学院所藏尚缺一至四卷的呈麟《南溪县志》全部。至于稀少珍本，更不及备录。外文图书二万余册，其中有十五世纪前出版的西洋古籍多种。

外国杂志报章，也极完备，著名的有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化协会所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及中国》等杂志，都是研究我国国故的参考书，且属全份，尤为珍贵。此外还有福州及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及公元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五一年间香港出版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全份，尤为难得。该馆所藏的科学杂志，也很珍贵，如出版已达一百多年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的初版全套，就是远东唯一孤本。

至于我国出版的日报，如上海的《时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清末光绪、宣统之间与《京报》并行的《谕折汇存》，均藏有全份。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该馆所藏，也都达三十年以上。我国杂志之备有全份者，为数更多，如《新民丛报》、《国闻周报》，以及该馆出版的《外交报》、《东方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等等，都是不易搜集的。

《续古逸丛书》的书目

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建立涵芬楼，储藏古籍，又大量影印和排印了较珍贵的图书，对于国故，的确有相当的贡献。

日本学者自明治维新后，蔑视我国的古书，因而流传在日本的我国古籍纷纷散出，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乃委其随员杨守敬广事搜罗，即在东京精印，称为《古逸丛书》，共印一百部。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继黎氏未竟之功，以丛书体例刊行《续古逸丛书》。从宋本《孟子》开始，先后出了四十七种。如北宋本《南华真经》、《尔雅疏》、《说文解字》。淳熙本《曹子建文集》、《啸堂集古录》。蜀本《窦氏联珠集》、《七唐人集》。北宋本《龙龛手鉴》、《文中子中说》。绍兴本《道德经古本集注》、《汉官仪》。北宋本《汉丞相诸葛武侯传》、《颐堂先生文集》、《珞琭子三命消息赋》。金本《山谷琴趣外篇》，《公是先生七经小传》、《礼部韵略》、《孔氏祖庭广记》。新雕《汉隽》、《张子语录》、《龟山语录》、《酒经》、《清波杂志》、《续幽怪录》、《通玄真经》、《大典原写本》、《陶渊明诗》、《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乐善录》、《名山书判》、《清明集》、《武经七书》、《披神秘览》、《春秋公羊疏》、《乖厓先生文集》、《谢幼槃文集》、《水经注》。宋本《中庸说》、《程氏演繁露》、《梅花喜神谱》、《杜工部集》等，纸墨都很精美，可惜书的尺幅大小不一，有欠整齐。且当时印数太少，商务印书馆已无存书，香港冯平山图书馆虽有，但不全。姑录书目于此，以供学者参考。

不齐全的《丛书集成初编》

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主编《四部丛刊》正续编及三编后，又致全力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刊。此后就把丛书的整理工作，交给了王云五。王一方面主编《万有文库》一、二集，一方面又从事《丛书集成》的编辑。这时尚在一九三五年，选定最有学术价值的丛书一百部，先行出版，定名《丛书集成初编》，嗣后再出二编、三编，和《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一样，陆续出版，以期集古今丛书之大成。当时曾刊《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一书，作为宣传，刊载辑印丛书集成初编缘起，原文很长，兹摘录一段如下："半载以还，搜求探讨，朝斯夕斯，选定丛书百部，去取之际，以实用与罕见二者为标准，而以各类具备为范围。别为普通丛书、专科丛书、地方丛书三类，各分为若干目。普通丛书中，宋代占二部，明代二十一部，清代五十七部。专科丛书中，经学、小学、史地、目录、医学、艺术、军学诸目合十二部。地方丛书中，省区郡邑二目各四部。其间罕见者如元刊之《济生拔萃》、明刊之《范氏奇书》、《今献汇言》、《百陵学山》、《两京遗编》、《三代遗书》、《夷门广牍》、《纪录汇编》、《天都阁藏书》等。清刊之《学海类编》、《学津讨原》等。虽其中间有删节，微留遗憾，要皆为海内仅存之本，残圭断璧，世知宝贵，今各图书馆藏书家斥巨资求之而不可得者也。至若清代巨制，如武英殿聚珍版，知不足斋、粤雅堂、海山仙馆、墨海金壶、借月山房、史学、畿辅、金华等，原刻本每部多至数百册，内

容丰富精审，皆研究国学者当读之书，所谓合乎实用者，其信然矣。”又云：“综计所选丛书百部，原约六千种，今去其重出者千数百种，实存约四千一百种。原二万七千余卷，今减为约二万卷。以种数言，多于《四库全书》著录者十之二；以字数言，约当《四库全书》著录者三之一。命名《丛书集成》，纪其实也。”

原来初编丛书百部中，如有一书，频见于数丛书中的，就取最足之本。同属足本，没有校注的，取最早出之本，有校注的，取最后出之本。名同而实异的，兼收并蓄。名异而实同的，择善刊入，而注其异名。缘起谓六千种去其重出，实存约四千一百种，实则四千一百种，确数为四千零六十四种，排印以五号字为主，有不宜排印的，那就改为影印，版式宽市尺三寸五分，高五寸二分，与《万有文库》完全相同。纸张用道林纸和新闻纸两种，普通本分装四千册，精装本分装一千册。一九三五年五月起发售预约，预约价普通装道林纸本四百六十元，新闻纸本三百元。精装本道林纸的一千元。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原拟每隔半年出书二期，第一期一百三十一种，四百册，第二期五百零三种，八百册，第三期七百五十种，八百册。不料出至第三期后，“八一三”沪战爆发，商务印刷厂地处战区，无法继续印书。后在租界另设工场，并求助于香港分厂，把没有刊出之书，重行发排，但生产力已大不如前。直至一九三八年六月续出第四期书，三百零一种，四百册。一九三九年六月，出第五期书，四百三十五种，四百册。一九四〇年初，续出第六期，八百二十八种，六百册。尚有第七期书一千一百十六种，六百册，预计一九四一年可以如数出齐，奈香港沦陷，分厂无能为助，上海日寇进入租界，业务完全停顿。所有制成的书

版，无法付印，已印成的书页，无法装订，东搬西移，损失很多。抗战胜利之后，第七期印成书，已为数不多，且须清偿预约户，加之逐年配发，逐年减少。解放后，发行移归新华书店，到一九五四年四月，商务转入公私合营，第七期书只留一百多种，六十七册，即前一至六期书亦告残缺。一九五九年古籍书店为了配成整部，供应读者需要，和商务联系，有补印《丛书集成》缺书之举。在征求预约广告中，有全部共计三千四百六十七册云云，实非全璧，尚缺约一千种，五百三十三册。初编丛书百部，未能齐全，确甚感遗憾。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竞争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大出版机构的发行所都在河南路，两家相处比邻，彼此竞争激烈。如商务发行《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百衲本二十四史》、《清稗类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小说月报》、《儿童世界》、《英语周刊》等，中华书局便跟着发行《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小字典》、《辞海》、《中外地名辞典》、《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清朝野史大观》、《新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英文周报》。甚至有一次涉及版权问题，诉诸法庭，双方大伤感情。

商务和中华的竞争，最突出的是被喻为"双包案"的两部大部头书的出版。商务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四部丛刊》，中华于一九二四年跟着发行《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由张元济主持编辑，樊炳清、姜殿扬、林志烜、张元炘、胡文楷、庄吕尘、孙义、丁英桂等力助而成，全部影印。原来商务的涵芬楼广收善本，具有优越条件，那么丛刊选取的版本，当然是最好的了。如初编全书三百二十三种，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写宋本十六，影写元本五，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十八，日本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其余也属明清佳刻，名人校本，朱墨两笔校的，便用套版印行，先后两版。"一二八"沪战中，再版之

书，大多化为灰烬。一九三六年发行缩版本，有平装的，有精装布面的。初编二百四十册，续编五百册，三编五百册。如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查东山的《罪惟录》，都是手稿本，为外间所未见，也列入三编之中。

中华的《四部备要》，主持的是陆费伯鸿、高野侯、丁竹荪、吴志抱等。陆费伯鸿辑印《备要》的动机，表面上说是由于他的前五代祖父陆费墀总校《四库全书》而思有所继承，讳言步商务后尘。他在《备要》缘起上有那么几句话："先太高祖宗伯公讳墀，通籍入词林。《四库全书》开局，以编修任总校官，后任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任职之专且久，鲜与匹焉。晚岁构宅于嘉兴府城外角里街，颜其阁曰'枝荫'，多藏四库副本。洪杨之乱毁于火，今者角里街鞠为茂草矣。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向往之。"这里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啊！实则他看到商务刊行《丛刊》，暗地羡慕不已。恰巧当时杭州八千卷楼旧主人丁辅之昆仲，把创制的仿宋铅字让给中华，陆费伯鸿就用仿宋字印行《备要》，在报上大事宣传，称为聚珍仿宋版，也依据最精善本，如《五经古注》用宋岳珂相台本，《十三经注疏》用清阮元附校勘记本，《鱼玄机诗集》用北宋本，《陆放翁全集》用明汲古阁本。第一集，选书四十八种，四百零五册，刊印样本，发售预约。订明五年出齐五集，全书三百五十一种，连史纸线装二千五百册，定价九百元。后来又印行精装点句本。

我友吴铁声，他服务中华书局数十年，深知当时情况，据他见告：商务印书馆辑印的《四部丛刊》，选择宋元明清较好的版本影印，对稀少古本的复印与流传，是有一定贡献的。记得有一次，商务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象一般

排印本之鲁鱼亥豕，错误百出。陆费伯鸿不甘缄默，也刊登广告，针锋相对，说《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的错误。不象影印古本，有的以讹传讹，印刷上的墨污，把"大"字变成"犬"字或"太"字等等，贻误读者。中华书局还在广告中重金征求读者意见说：如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本错误者，每一字酬以一元。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同行嫉妒，营业上互相竞争，这原是常事。但是因此也成了一件好事，《四部备要》中存在的错字，当然不少，前人说得好，校书如扫落叶，一面扫，一面生，确是难免的。自经读者来信指出，书局付出酬金数千元，因而在《四部备要》重印时错字得以纠正，提高了质量。

搜罗广博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所刊行的工具书，有些于社会贡献较大。《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便是其中之一。

该书刊行于一九三一年五月，精装一大册，凡三百余万言，编辑者有谢寿昌、陈镐基、傅运森、殷惟龢、方宾观、谭廉、张堃、臧励龢诸人，由陆尔奎、方毅校订。

编刊该书的动机是这样的：臧励龢编辑《辞源》时，感到《辞源》虽收入地名七千余条，但由于体裁所限，不能把全国古今地名一一收入。而阅读书报，遇到地名，往往在《辞源》上无从查得，很不方便，因此他很想把《辞源》收入的七千余条作为基础，从事扩充，加之他少年时，爱好考古学，后又到处游历，东至榆关，西至巴蜀，南逾岭峤，北历燕赵，游踪所至，凡有关形势阨塞，郡国利病，无不随时纪录，这为他编刊地名辞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过了一个时期，陆尔奎提议编《中国地名辞典》，由谢冠生主其事。一半尚未完成，谢就游欧离职，停顿了一年，臧便自告奋勇，晨钞暝写，经过三年才得以成书。书成臧也有事他去，校勘增订，由馆中其他编辑担任。中间商榷审核，邮书往还殆无虚日，这样又经过了四年，附入《行政区域表》、《全国铁路表》、《全国商埠表》、《各县异名表》。付印后，因政治区域有所变更，新置及新改诸地名未经列入，又增刊《地名大辞典补遗》，共一百多条，这在当时来说，内容是比较完备的。

这书搜罗广博，群经正史，《国语》、《国策》、《通鉴》、诸子及各种古籍有诠释的，无不采取。又地以人传，凡有名于世的名胜寺观、园亭台榭，即使已经零落湮没，也仍列旧名。其他如群山脉络，水道变迁，名城要塞，铁路交通，矿山商港，村镇墟集，无不新旧毕备。至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记胜》、《读史方舆纪要》、《清一通志》、各省通志等，更采辑周详，足资考证。

《百衲本二十四史》独缺《薛史》

商务印书馆辑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一九三〇年发售预约，由张元济主其事。首冠一序，即出于张的手笔。原来，张元济曾听到叶德辉这样感叹："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所以他就发愿辑印旧本正史，才有刊行《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举。当时所选用的版本，除《旧五代史》、《元史》、《明史》之外，都是用宋元版本影印的。逢到断笔、缺笔、花笔和欠周到之笔，都用硃笔描修；书版黝旧，则用粉笔垫衬。原版断烂，便据他本写配，总之手续繁多，殚精竭力，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全书约六万五千余页，分装八百余册，用金属版精印，分连史纸、毛边纸二种，都是线装本。书根上加印书名册数。当时的预约价，一次缴清的收三百元，分期缴清的收三百六十元，连史纸毛边纸价同。一九三一年八月，商务举行三十五周年纪念，曾发行特价。

该书原期于一九三三年全书出齐，不料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沪战爆发，敌机滥肆轰炸，商务总厂被毁，不但成书无存，即原版本也遭波及，那制成之版，完全化为灰烬，不得已，一方面补配原本，广事征求，一方面更制新版，重行印刷。赶至一九三三年年底，一至三期书才得印成。一九三四年三月重售预约的，只有连史纸一种，预约价四百八十元，订后即可取书十种。尚有十四种，分四、五两期续出。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军

兴，全书八百二十册已告完成，但战时各地存书颇多损失，抗战胜利后，清偿预约户，所存的书已为数不多了。可是由于一度主持者对于线装书不加重视，把仅存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贱价售出，全部售价低至六、七十元，那《衲史》六开本的原铅皮版，作为废品处理，因此一时不易重印了。

《衲史》的唯一遗憾，就是《旧五代史》没有找到薛居正原书，用的是吴兴刘氏刊原辑《大典》本。当时商务不惜重价征求，遍登申、新各报，历时很久。那登报广告是这样说的：

"殿本《旧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并非薛氏原书，然不敢谓必亡也。昔闻有人于殿本刊行后，曾见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有谢在杭，许芳城藏印，甚以当日修史诸臣未见其书为惜。又明末福建连江陈氏世善堂，清初浙江余姚黄氏续钞堂，均有其书，安知今日不尚在人间。敝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虽选定《大典》有注本，然欲餍读者之望，愿出重价，搜访原书。敬告各界人士，如藏有旧刻薛氏《五代史》原书者，倘蒙慨允见让全书，固极欢迎，即零卷散叶，亦甚快睹，请即摄照一叶，寄至敝馆总务处出版科，并示价格，当即通信商议，如不愿割爱，仅允借照，敝馆亦可遵办，别议报酬，伏维公鉴。"

上述广告登载后，没人应征，仅有某某和商务接洽，说该书曩时为安徽歙县诗人汪允宗所藏，一九一五年让给某书贾，但谓是书为大定刊本，与所说金承安转运司刊本已有出入，且名《五代书》，不作《五代史》。商务辗转探索，迷离惝恍，不得要领。结果该馆只能把刘氏嘉业堂所刻《大典》注本列入《衲史》中。按《大典》本为余姚邵晋涵取《永乐大典》所引《薛史》掇拾成文，不足，更补以《册府元龟》所引，以及《太平御览》、

《五代会要》、《通鉴考异》等书数十种，有的入正史，有的作附注，也一一载明来历，四库馆臣，复加参订，书成奏进，勅许颁行。最先刊印的为武英殿本，主其事的，把所注原辑卷数尽行削去，彭元瑞力争不从，《薛史》真面目不可复见。同时有《四库全书》写本，南昌熊氏据以影印，仍有删削之处，刘本得诸甬东抱经楼卢氏，疑亦当时传录之本，所列附注凡一千三百七十条，彼此对校，殿本少于刘本凡五百三十八条，库本少于刘本凡四百七十一条。刘本较为完备。

至于《旧五代史》是怎样一部书呢？原来赵匡胤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诏修《五代史》，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次年书成，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后来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失实，重加修订，修成后藏在家里。欧阳修死后，朝廷取付国子监刊行，因此《五代史》有新旧之分，实则各有优缺点，很难轩轾。经过了若干年，废去了《薛史》，从此《薛史》传本日稀。

《薛史》在元、明时虽流行不广，但尚未全绝。明末黄梨洲即有是书，当时吴任臣作《十国春秋》，曾向黄氏借阅。以后黄氏藏书遭到水火之灾，该书是否被毁，无从查考。上述关于汪允宗所藏，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曾详载其事，且转录汪氏《货书记》一篇，据说该书一九一五年在香港卖给广东书商，从此便不知下落。也有人说，汪氏藏本为丁乃扬所得，但丁秘而不宣，托言移家时失去。张舜徽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都谈到这部书，都希望该书尚在人间，有出而与读者相见的一天。

溧阳人彭谷声，解放初写信给我，信中云："《薛史》为海

内著名孤本，先祖宦粤时所得，有鉴于清明上河图故事，从不轻示于人。抗战时期，弟亲自挑至皖南，始克保全。”（当时谷声曾请吴湖帆绘千里负书图以为纪念。）谷声二十年前客死西陲，我曾写信给他的儿子长卿询及这事，得到长卿复信，大意说：“当时年幼，不知道这回事，或许父亲离沪时寄存戚友处也未可知”，但是经过查询，始终没有发现，成为一个谜了。

赛铜字模的发明

我们读了《梦溪笔谈》，知道隋代已有木板印刷。毕昇在一〇四一年，即创始用活字印书。德国人戈敦保于一四四〇年开始用活字版，比我国落后了四百年。这是我们足以自豪的。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举凡凸版、平版、凹版，都是很完备的。铅印书册，是利用凸版的，这种印刷，必先浇铸铅字，而浇铸必先有字模。我国文字繁多，《康熙字典》有四万七千多字，《中华大字典》四万八千多字，即通常用的，也有几千个字。如果每个字制一个字模，工作就很不简单，且代价很大；加之字有头号、二号、三号、四号、小四号、五号、小五号、六号、七号等九种，字体有仿宋、楷书、扁字等等，又有长形、方形的区别，要备齐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电镀铜模，那是美国长老会派姜别利(Gambie)来华主持宁波美华书馆印刷教会书报时传来的，先以黄杨刻阳文字，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于是制成大小铅字七种。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商务印书馆请字学家把姜氏字体加以釐正，然后如法泡制。奈制造非咄嗟可以立办，且镀制字模，通常用直流发电机来发电，电压在 1.5 伏特以内，也有用隔膜电池来制字模的。备着一缸，缸的外围，悬挂着预备镀制的铅字，与饱和硫酸铜溶液；内围悬挂锌条和稀硫酸溶液。缸中电压在 1 伏特以内，经过二十天左右，字心才得成功。再经锯

磨锉刨，把字心嵌入铜壳，每个字又须半小时。故每副字模制造时间，约一个月。

商务制版厂厂长唐凌阁及照相股股长张沾卿、工友林九龄，经过共同研究改革，于一九三五年发明了赛铜字模，又名培珀字模。这种字模有铜模的效用，却无铜模的缺点。且制成仅须一刻钟，成本也很低廉。从此大大地推动了商务印刷事业的发展。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始经过

大家都知道，四角号码检字法，是商务印书馆创始的。当时正值王云五主持馆务，故有人认为这是王云五的智慧。实则，王云五是经人启发赞助而成的。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启发和赞助者，究属是谁呢？这是长乐高梦旦老先生。梦旦生于一八七〇年，虽应科举考试，但思想却是进步的。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林迪臣在杭州做官，推行新政，创办西湖蚕学馆，开中国实业教育的先声。当时帮助林迪臣计划的，就是高梦旦和他的哥哥高啸桐。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劳玉初（乃宣）把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聘高梦旦为总教习。次年大学堂选送学生赴日本，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领学生东渡。他看到日本教育很发达，特别是普及小学，就有编辑小学教科书的动机。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冬回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聘他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同参加者，尚有蒋维乔、庄俞等。当时商务资本有限，经理夏瑞芳担心耗资费时，势必亏本。没想到第一册出版后一销就是数万册。夏瑞芳喜出望外，决定续编。高梦旦看到旧式字典详简失当，不切实际，便倡议编《新字典》，增补旧字典所没有的新字，和旧字典所没有的新义，且根据《新字典》，刊行《辞源》。五四运动兴起之后，高梦旦觉得新文化已获得了群众基础，商务印书馆既为文化服务，就不能不走新的道路，于是把所发行的杂志大大地革新一番。他觉

得《康熙字典》检查不便，便研究改进的方法，创为八十部首，先后共十多年，不知换了若干次的稿，才十成八九。这时王云五进入商务，高梦旦便把稿件交给王云五整理。王云五在高梦旦原稿的基础上才搞出了四角号码的检字法。商务当时的内部刊物《同舟》第四卷第十二期上刊有王云五写的《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一文，提到这事说："高先生是多方面的研究家，又是许多研究家的赞助人。高先生对于研究的兴趣很浓，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二十几年前，有改革部首的草案，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此法较旧法已很便利，但高先生是一位彻底的改革家，自己认此方案还不算彻底，始终没有把它发表。他又抱成功不必在我的态度，当他把自己的检字方案搁置时，便留心到外间有没有热心研究改革检字方案的人，后来给他发见林语堂先生曾经发表一种首笔检字法，那时候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席。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间，高先生因事到北平，辗转托人介绍，与林先生详谈，力劝林先生继续研究，后来回到上海，和我商量，我也赞成此举。因此便由商务编译所与林先生订一合作研究的契约，于一年期内，由商务按月资助林先生若干元，由林先生酌减教书的钟点，从事新检字法的研究。后来我对于检字法的研究，也发生了兴趣，有一天，对高先生说起这事，他虽极力赞助他人从事这项研究，但因我日间职务很忙，不愿我过于劳苦，便把成功不必在我一语来相劝，但是我的兴趣已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便瞒着高先生，每晚在家里私下研究，过了约摸半年，我偶然发明号码检字法，欢喜到了不得，次日对高先生和盘托出，他也欢喜万状。其后我因为这号码检字法虽然易学，但对

于笔画较多的字还觉不易检查，于是决计放弃此法，另行研究，又费了一年工夫，才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在这时期和以后继续研究修订四角检字法的一二年内，高先生无时不赞助我，并且给我许多有益的意见，及至四角检字法研究告一段落，高先生又认为一种新方法的成功，固由于本体的效用，但是宣传工作也有重大关系，于是他便把宣传四角检字法，引为己任。近年我因为职务特忙，简直没工夫顾到检字法，高先生却继续不断把这检字法热心推行……”

从这个记述看来，王云五不过因人成事，高梦旦的创造和改革精神是不可没的。自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以后，高梦旦就提倡应用于该馆所出版的字典编排，以及目录索引上。以后各地图书馆的编目和机关企业的档案编列，也普遍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

林纾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

清末的翻译家，成就较高的，当推严复和林纾。严复所译的，主要是西洋哲学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作品，林纾所译的，完全是小说。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署践卓翁、冷红生、补柳翁、蠡叟等，福建闽侯人。他是用古文的笔调翻译西洋小说的创始者。据郑西谛（振铎）统计，林纾译作共有一百七十一部，二百七十册，绝大多数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尚有手稿本，存置商务的涵芬楼未及付印，"一二八"之役，被毁于兵燹的有数十种之多，这种精神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尽管当年林纾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和时代相抵触，但由于他着力介绍西洋文化，使社会素不重视的小说，突破封建的传统观念，而在文学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个功绩，却不能一笔抹煞。并且有人说："林氏以古文译西方长篇小说，写景抒情，曲折如意，尤其难得的，原文的幽默风趣，他居然能相当地表达出来，替古文辟了一个新境地。"

林纾自己不懂外国文，所译的作品，都经别人口讲，由他笔录成文。他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译一千五百字。有人形容其译笔之快是"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当时胡适也自叹不如说："我自己作文，一点钟可写八九百字，译书一点钟只能写四百多字。"同林纾合作的，有王晓斋、魏易、陈家麟、胡朝梁、王庆通、陈器、毛文锺、林凯、严培南、曾宗巩、叶于沅、李世忠、廖琇昆、林驺、王庆骥等十余人之多。第一部和他合作的

是王晓斋。其他合作者大都只精外国文，在中文方面则比较差，可是王晓斋却例外，他不仅精通法国文学，而且中文修养也相当高。晓斋的同邑何振岱称晓斋是："偶为古今体诗，自写襟抱，无所规仿，而纵笔所至，往往神与古会。"这的确很不容易。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林纾在马江客居丧偶，非常惋痛。王晓斋适从法国巴黎归来，和林纾会晤时谈及法国作家大仲马父子的作品脍炙人口，《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更为小仲马极笔，劝林纾同译。王晓斋这个主意，无非想借此稍煞林纾丧偶的悲思。而林纾一提笔，却情深一往，不觉缠绵凄婉，流露于字里行间。林纾译《迦茵小传》，自题买陂塘词的小序，也提到这事，说："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即晓斋）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释，矧长安逢秋，百状萧瑟。"这可以考出他译《茶花女遗事》是在一八九八年夏秋之间，翌年有玉情瑶怨馆的木刻本，原来是钱塘汪穰卿斥赀付梓的。又有文明书局本，封面吴芝瑛书，有茶花女及亚猛的肖像。还有广智书局铅印本，首冠小仲马的像片，及林纾的像片，本子是很小的。又新民社袖珍本，加新标点，内有小仲马遗像二幅，林纾遗像二幅，遗书一幅，遗画二幅，冷红生自传和林纾逝世纪念文章。一九二三年的冬天，书归商务印书馆发行，销得很多。

阿英在《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文中说："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上海《中外日报》登着《茶花女遗事》告白：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昌言报》馆白。"原来《中外日报》和《昌言报》都是汪穰卿办的。又说："告白中所说的原版本，是

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素隐书屋本，不是玉情瑶怨馆本。”似乎该小说一八九八年即有印本了。

林纾所译小说，当时简称“林译小说”，他所以这样多产，是与商务的鼓励分不开的。那时的稿酬，一般每千字二、三元，惟有林纾的译作，商务却例外地以千字十元给酬。来者不拒，从不挑剔。当时的十元，可购上白粳一百六十斤，代价可算是很高的了。

商务出版的林译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呢？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云：“林纾所译之书，大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计一百五十六种，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种已出版，有十种散见于第六卷至第十一卷《小说月报》中，无单行本。有十四种原稿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其中译英书者九十三种，译法书者五十二种，译美书者十九种，译俄书者六种，译希腊、挪威、比利时、

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者各得一二种，尚有未注明何国者五种。”这是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林纾逝世后，根据他生前记录而加以统计的。

林译小说都列入《说部丛书》一至四集中，并各有单行本。后又把《说部丛书》一至三集中所列入的林译本，汇刊为《林译小说》一、二两集。第一集自《吟边燕语》至《玉楼花劫》止，共五十九种，九十七册。第二集自《大侠红蘩露传》至《戎马书生》止，共五十八种，八十九册。加上《说部丛书》第三集最后二种，及尚未收入《林译小说》的《鹧巢记》初编二册和《鹧巢记》续编二册，以及《说部丛书》第四集中的林译本共十八种，二十五册。

至于林译小说未出版的原稿，尚有《孝女履霜记》、《五丁开山记》、《雨血风毛录》、《黄金铸美录》、《洞冥记续编》、《情桥恨水录》、《神窝》、《奴星叙传》、《金缕衣》、《军前琐记》、《情幻》、《学生风月鉴》、《眇郎喋血录》、《夏马城炸鬼》、《凤藻皇后》，还有一种哈葛德原著，和陈家麟合译的，当时尚未定名，共十六种，（刘氏误为十四种）九十册，约一百二十万言，都藏在商务，“一二八”战役中全被焚毁。已出版的存书，在闸北货栈中，也付诸一炬，所以至今“林译小说”，在旧书店中，已很少见，真是物稀为贵，被视为瓌宝了。当时陶寒翠的《林书丛论》，载《新月》半月刊，每一译本，作一介绍，很为详尽。

林译小说，都是文言的，自白话风行，商务当局一度和程瞻庐接洽，拟把林译文言改成白话。程瞻庐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不愿意干，也就谢绝了。此后商务就另行设法，他们看到《黑奴吁天录》改编的话剧，一再由春柳社、春阳社演出，轰动一时，但原书翻译用高深的文言，不够通俗，于是请人

把该书分别以《汤姆叔的茅屋》和《黑奴魂》为题，用白话译出，连载于《儿童世界》，载毕，又刊单行本。

商务印书馆纪念建馆八十五周年时，从林译小说中，选出十种重印出版，有《巴黎茶花女遗事》、《离恨天》、《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吟边燕语》、《拊掌录》、《迦茵小传》、《不如归》、《现身说法》。商务认为林纾的文言文译本，对少数专业工作者仍有参考价值，因此保持原文，只将书名完全改用新译名。我以为既属纪念性质，书名改用新译名未免多此一举了。此外，还出了一本《林纾的翻译》，收有郑振铎、阿英、钱锺书的文章，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编订的林译全目。

《迦因小传》和《迦茵小传》

晚清时期，竞相翻译小说，《迦因小传》，便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译作，当时销数是很大的。甚至最早提倡话剧的通鉴学校，就曾把它编成剧本，由王钟声饰主角迦因，上演于春仙茶园，轰动一时。

这部小说，是西欧哈葛德的名著。当初有两种不同的译本。一是林琴南译的，一是蟫溪子译的，两种译本各有风格，难以轩轾。琴南是翻译界的权威，他翻译这部书，在一九〇四年，是由魏易（冲叔）口述的。从他的序文看来，蟫溪子所译尚在他之前。如云："余客杭州时，即得海上蟫溪子所译'迦因小传'，译笔丽赡，雅有辞况。迨来京师，再购而读之，有天笑生一序，悲健作楚声，此《汉书·扬雄传》所谓'抗词幽说，闲意眇旨'者也。书佚其前半篇，至以为憾。甲辰岁，译哈葛德所著《埃司兰情侠传》及《金塔剖尸记》二书，则迦茵全传赫然在哈氏丛书中也。即欲邮致蟫溪子请足成之，顾莫审所在。魏子冲叔告余曰：'小说固小道，而西人通称之曰文学，为品最贵，如福禄特尔、司各德、洛加德及仲马父子，均用此名世，未尝用外号自隐。'蟫溪子通赡如此，至令人莫详其里居姓氏，殊可惜也。因请余补译其书。嗟夫！向秀犹生，郭象岂容窜稿，崔灏在上，李白奚容题诗。特哈氏书精美无伦，不忍听其沦没，遂以七旬之力译成，都十二万二千言，于蟫溪子原译，一字未敢轻犯，示不掠美也。……"可知当时琴南还不知蟫溪子为何许

人，很想和他通信哩。

序文中所说的天笑生，即吴门包天笑，他逝世时已九十八岁。至于蟠溪子，其人姓杨，号紫麟，苏州人，住在盘门，盘通蟠，故别署蟠溪子。他的长兄绥卿，是个孝廉公，为盛宣怀幕府中人物，他从小喜读英文，造诣很深。他的夫人是苏州老教育家李叔良的姊姊，天笑和叔良、紫麟订有金兰契，往返很密。紫麟肄业上海，暑假时期，校中师生放假回家，他一个人感到寂寞，晚上常到出售旧西书的店铺，搜寻旧的西洋小说，无非借此研究英文，并以消遣而已。有一次他检得残破的外文书数种，索价很廉，他欣然购归，中有《迦因喜司托来》一种，觉得很有兴味，但只有下半部，上半部不知去向，他感到莫大遗憾，便邮书欧美各大书店，都未觅到。这时恰巧天笑有事来上海，居所和紫麟相去只数百步，且那儿有一公园，因此两人于夕阳西下时，常在疏林浅草间比坐纳凉，非常舒适。紫麟袖出半部头的《迦因喜司托来》给天笑看，天笑也觉得虽非全璧，却很有意思，便相约一同把它译出，经过几个月译成，由天笑携交文明书局出版。

后来，琴南译了全部，书归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辗转探得了紫麟和天笑的地址，特地写信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并言亦用《迦因小传》为书名，但因字加一艸头为《迦茵小传》。信寄到《时报》馆，当时天笑在《时报》馆主持副刊，紫麟担任翻译，恰为同事。若干年后，天笑晤见琴南，琴南还谈到这件事。

紫麟任职《时报》馆，是天笑介绍的，可是宾主不甚相得，后即辞去。他为人刚直，颇尚气节，晚景不很好，六十不到即逝世。他和天笑合译的小说，除《迦因小传》外，尚有《身毒叛乱记》等书。

中华书局是怎样创始的

中华书局成立于民国元年元旦，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诞生，有那么一段小故事：

中华的创办人陆费伯鸿，他是编纂《四库全书》桐乡陆费墀的后人，名逵，以父名芷沧，因字少沧，任职文明书局。这时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常出席于书业商会，和文明书局的陆费伯鸿时常晤见。高梦旦发觉他不仅能掌握印刷发行业务，而且对于编辑工作也有相当经验，认为这样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于是和张元济商量，用优厚的薪金聘请他为出版部主任。高梦旦以后又把侄女嫁给他。岂知伯鸿别有雄心壮志，不受羁縻，颇思另创基业，图谋发展。

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潮流，奔腾澎湃，不可遏止。这时商务当局对于发行下学期的教科书大为踌躇。他们觉得，如果仍旧印那些"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课文，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这不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吗！但又觉得，要是编印革命教科书，却又不能公开，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要触犯清廷，如何得了。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商务当局想到了那个被称为"智多星"的陆费伯鸿，于是便找他来商量办法，他却很肯定地说："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下

学期的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毋需更动。”商务当局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决定印行旧本了。实际上，陆费伯鸿所说的话，不是由衷之言，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他自以为“蛟龙非池中物”，这正是别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他目光锐利，看到清政府朝政日非，民情激昂，革命党人抱着牺牲精神，仆一起百，再接再厉，革命成功，即在眼前。所以他一方面若无其事的敷衍商务，一方面秘密地邀请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他的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但编成了不能公开付印，因为一方面不给商务当局知道，一方面又须避清吏的耳目，普通印刷所也不敢承印这种所谓“大逆不道”的革命书册。不得已，托鸭绿江路日本人所经营的作新印刷所，付诸铅印，大都为二号字，图为木刻。伯鸿的三弟叔辰亲往校对，进行迅速，到武昌起义时，书已十成八九。这时，伯鸿立辞商务职，商务愿月酬四百元挽留他，伯鸿以别有组织，和克敦、知方等毅然不顾，而自创基业，资本二万五千元，发行所设于福州路，为二层楼房，于民国元年元旦开幕，命名为中华书局，伯鸿为总经理，戴克敦为编辑长（直至一九二六年克敦逝世，编辑长由伯鸿兼任）。一套合于新时代的新课本称为《中华教科书》，赶印齐全，春季开学，各校都采用《中华教科书》，销数很好。商务所印的许多内容陈旧的春季课本，顿时成为废纸，欲另编新本，已措手不及了。这使高梦旦非常难堪。蒋维乔调笑高梦旦说：这一下，你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中华书局的图书馆

中华书局成立后六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编辑所中附设藏书楼，当时规模很小，只不过是为编辑人员参考翻检之用。至一九二五年，才扩充为中华书局图书馆。一九三〇年，舒新城应聘为编辑所长，大量收购图书，藏书达二十余万册。按照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分类编目，成十大门类：普通门、哲理门、教育门、社会门、艺术门、自然门、应用门、语言门、文学门、史地门，每门分十中类，再分成十小类，比较科学化。一九三五年，澳门路新厂落成，图书馆便迁入新址，把书库设在新厂四楼，藏书达五十万册。

此后根据图书馆整个藏书体系，搜购范围再行扩大，但着重收集方志、丛书、金石书、医书、类书、禁书，同时也注意版本，如明清精刻本、殿本、套印本、巾箱本、老石印本，以及批校本、稿本等。据当时统计，约有二千五百多种，二万册以上，各省重要县份的地方志，大都齐备。丛书类书，如佛藏、道藏，以及原版铜活字本《图书集成》等，约有一千二百多种，五万册以上。金石书，包括甲骨在内，约共六百多种，三千多册，有关甲骨的书，也差不多齐备了。至于罗致明清精刻本，无非为刊印《四部备要》准备条件，计明版有二百四十三种，二千九百八十册，清精刻初印本及批校本，约三百多种，三千余册。还有其它更珍贵的宋版和元版书。名人手稿，有梁启超的《财政原论》(《饮冰室全集》没有收入)、钱亦石的《时事问题鑰》、张闻

天的《西洋史谈话》、郑振铎的《纫秋山馆书目》四种，共六册，书目中的古书，均让售于该馆，该书目即振铎让售时所手缮。书目后附有跋文，可以从中窥见振铎在敌伪环境中的艰苦生活和他的坚贞气节。

在新出版物方面，特别注重收集杂志、日报一类的有关现代史料，杂志都装成汇订本，中文的有二万七千零三十一册，西文和日文各四千册。日报方面，中文报纸汇订八千六百六十七册，西文的四百五十五册，日文的五百零三册，数量是相当大的。可是只供编辑人员参考阅览，对外向不公开。解放后，对各出版社、学术研究机关，及其它单位的查阅，尽量予以方便。

中华书局自创办起直到解放，出版图书共一万四千三百多种，它的图书馆有一种置备一种，齐全无缺，这是商务印书馆所不及的。因为商务的东方图书馆在闸北，“一二八”战争中，付诸一炬，以致自己出版的图书自己馆中没有存留，未免引为遗憾。中华的图书馆在市中心区，未遭兵灾，金瓯无缺，这是它得天独厚处。

《中华大字典》是怎样编成的

解放前出版的字典，最完备的要算中华书局的《中华大字典》。因为《康熙字典》只收四万七千余字，《中华大字典》却收四万八千多字，凡《康熙字典》所没有的字，可以在《中华大字典》中检得。且近代的方言，翻译的新字，也都录入，内容比《康熙字典》更为广泛，对清人的文字训诂，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未谷《说文义证》、王念孙《广雅疏证》诸书的说法，也多采用，纠正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误。解说文字，先注音，后释义。在注音方面，以宋丁度等的《集韵》的音切为主，《集韵》没有的字，兼采《广韵》和其它韵书的音。每个音只用一个反切，加注直音，并标明该字的韵部。这比《康熙字典》的一个音并列几个反切简明一些，删去以前字书中叶韵的音，更为切合实际。在释义方面，分条解说，一条只注一义，只列一个书证。对每个字，大都先说本义，次及引伸假借的用法。这又比《康熙字典》更有条理。此外，对于形体虽同，而音义并异的字，便另作一个字头，排在本字之次，也比《康熙字典》眉目清朗。它还在单字之下附列一些由这个字组成的词或人物名称，使字书兼具词典之用，也颇可取。

该书的编成是很不简单的。编辑该书的动机，还在中华书局成立之前。那位主纂陆费伯鸿尚在湖北，他感到《康熙字典》有四大弊病：一、解释欠详确；二、讹误甚多；三、世俗通用的字没有采入；四、不便检查。他当时大发厥愿，准备编成一

部新字典。可是他单枪匹马，无人赞助，只得知难而退。直到辛亥革命前夕，陈协恭约了几位同事编辑字典，恰巧中华书局成立，乃把所辑的字典稿，作股本二千元，归该书局字典部，由伯鸿主持其事。恰巧伯鸿的一位江西朋友欧阳仲涛来沪，便把修订之事委托给他。当时未知此中甘苦，认为编字典很容易，伯鸿和仲涛预计六个月可以完成，即售预约，料理印刷。印竣若干页，觉得颇不称心，而仲涛因病返赣，不得已把字典编辑部移至南昌，重新修订，阅二年而成，邮寄来沪，伯鸿与范静生抽阅了数卷，发现仍有不少可商之处。于是又加修订，先后五次易稿。本拟再加修订，讵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鸿和仲涛深恐旷日持久，将来大局不可预料，决意立即付排。可是排版发生困难，因通用铅字不足七千，中华书局铅字较多，亦不过万余而已。而《中华大字典》容纳之字，在四万以上，临时雕刻，费用既大，时间又长，再加校对不易，连校二十多次，仍不能保证无误。起初以为六个月可完成，竟至六个年头尚不能尽善尽美。参加编纂者，凡三四十人，共二千多页，四百多万言，编辑印刷之费，约五万金左右，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很大的了。一九一五年出版，有大本，有缩本，伯鸿、仲涛都有序文，此外又有林纾、梁启超、李家驹、熊希龄、廖平、王宠惠各作引言，并附《篆字谱》，以便学者参阅。

《中华大字典》是根据《康熙字典》修订的，但没有完全包含《康熙字典》的内容。且《康熙字典》错误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据清人王引之作《字典考证》，即纠正了《康熙字典》的引书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据近人蕲春桂末辛所著《校正增注康熙字典》一书，共校正九千四百八十六条，增注八千七百四十四条。当编辑《中华大字典》时，那《校正增注康熙字典》一书

尚未写成，以致有些差错，以误传误，一错到底，须待以后再行订正了。

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华书局编辑部根据一九三五年初印本重印，把书前的题词、序文和《切韵指掌图》一并删汰，甚至把花过很多精力的编辑人名，也一笔抹煞，那是不妥当的。

“中华”的《联绵字典》

湘中名宿符定一，字宇澄，湖南衡山县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解放后，曾任北京文史馆馆长。他曾花了三十年的精力，编成《联绵字典》三十六卷，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十二集，装成十册。这在学术上贡献是很大的。这书脱稿后先售给商务印书馆，但商务认为用处不大，印出了没有销路，便婉言谢绝了。不得已他便让给中华书局，中华居然接受，一九四三年出版。

刘叶秋的《中国的字典》，对《联绵字典》作了如下介绍：“这部书虽以字典为名，实际是一部专收双音词的词典。所谓联绵字，主要是指双声、叠韵和重叠的双音词，但本书所收，除去这些之外，连助字、虚字以及一般的双音复词，也包括在内。《尔雅》中的释训一篇，多收重叠的双音词，正是后代《联绵字典》的先河，宋张有的《复古编》，则已标出联绵字的项目，后出的《骈雅》、《叠雅》等书，也是专辑联绵字的词书。符定一这部《联绵字典》，更是广搜博采，集其大成的著作。符氏是有意要补《复古编》之未备的。”

《联绵字典》，参照《字彙》、《正字通》等书的部首，分部收词。每部中的词，都按第一字的部首，以笔画多少编次；在每一个词下先用反切注音，然后分条注解不同的意义，一一引书证明。所引材料，上起三代，下终六朝，经史子集，兼收并蓄，注疏经解，亦加摘取。据凡例说，所引材料，均照原书抄录，如

有删节，即标明省略，以便读者考证。词的标音，系采《说文解字》徐铉的反切，一字只注一音；如为《说文》所无，或今读必须变音的，间采隋唐间反切或《广韵》、《集韵》的音切以补之。书中所说双声，系以古声十九纽为宗，所说叠韵，以古韵二十二部为据。

该书附索引一册，按集依文字部首分部编次各词，在正文每页所列的第一个词下注明页码，而附同页他词在下面，检查很方便。正文第一第六两册的卷首，另有部首索引，可据以查出部首所在的集称和页数。第十册卷末又附《如何检阅联绵字典》一文，可作使用这部字典的参考。

两种发生纠葛的书

中华书局的出版，一向是比较稳重的，可是也发生过纠葛。这里先谈《闲话扬州》一书的情况。

《闲话扬州》一书，在一九三四年春，由中华书局刊行。作者易君左，本名家钺，是湖南汉寿诗人易实甫的儿子。他有些才气，颇为自负。早年他反对父亲的作品；中年后，却又十分推崇他父亲的作品。他到过很多地方，对于扬州的情况相当熟悉，因此写成了《闲话扬州》一书，凡数万言。内容分三部分：一、扬州人的生活；二、扬州的风景；三、附录。关于扬州参考一斑、扬州的形势、扬州的沿革、扬州的杂话等等，都包括在附录中，并有小金山、平山幽径、万松岭、徐园一角、绿杨村、梅花岭、瘦西湖等铜版照相，可谓应有尽有。

该书内容，颇有辱及扬州人的地方，如书中说："一个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这一天就完了。"它的意思就是说扬州人懒得不事生产，上午孵在茶馆中，下午呆在澡堂里，消磨一天。实则这是扬州少数有闲阶级的情况，而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尤其辱及扬州妇女更甚，所以该书出版仅两个月，江都妇女协会就向镇江法院对发行人陆费逵提起控诉，并组织了"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书籍案联合会"，专门负责追究此事。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登报要求政府封闭中华书局。妇女代表郭坚忍延请韩国华律师，控告写作人易君左及中华书局发行人陆费逵的诽谤罪。认为"此事对

整个扬州，类多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而以毁损扬州全体妇女之名誉为尤甚。如硬指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扬州包办全国妓女，且诽谤扬州妇女，以不当妓女为耻。又如大家小姐充打手（即烧雅片泡者），及门坎内的女佣（即上坑老妈子），均专对扬州妇女存心毁谤，故特提起控诉”。这时周佛海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长，易君左任江苏教育厅编审主任，诉讼事起，周佛海就嘱易君左暂时避开。中华书局方面登报道歉，且把所有《闲话扬州》的存书以及纸型，完全付诸一炬，才把事情缓和下来。当时有人曾出上联，请对下联，如云：“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被征得的，有：“林子超主席国府，不愧国府主席，林子超哉”（其时林森为国民党政府主席，子超是林森的字）。大家作为趣谈。在旧社会中，一般写作者态度不够严肃，随笔挥写，任意渲染，往往不符事实，以致引起纠纷，而出版当局审阅稿件，也太粗枝大叶，因此造成这种不良后果，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里还要谈到《武昌革命真史》一书。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谓“出版自由”，那是根本谈不到的。当时不但和它的政策相反的刊物不能出版，有的即使符合它的政策，也由于其内部倾轧嫉妒，往往毫无理由地加以禁止，致使出版者遭到莫大的损失。

一九三〇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武昌革命真史》，精装一册，纸面平装的共三册，出于曹亚伯手笔。曹亚伯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得先介绍一下，他是湖北阳新县人，清末，他和禹之谟、黄克强、刘揆一、宋教仁、张难先、陈天华、吴兆麟等，同为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甲辰（一九〇四年）九月，黄克强、刘揆一谋在湖南起义，曹至长沙为之援助，不幸事机不密被泄，

黄克强潜避长沙吉长巷黄吉亭寓所，后黄乘一小轿，垂下轿帘，曹怀手枪，紧随轿后，得以脱险。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奔走，曹亚伯筹款助孙中山。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军起，全国响应，曹亚伯和孙中山结伴归国。此后孙中山起兵护法，及督师北伐，曹亚伯赞襄其间，具有相当功绩。孙中山逝世后，他目睹政局混乱，便在昆山购地数十亩，经营农场，植树栽花，过着隐居生活。自国民党改组后，有些知识浅薄的年轻人，往往数典忘祖，莫明是非。他认为这是不知革命历史所致。他由此产生了写作动机，努力整理他多年珍藏的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写成《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曹亚伯和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同隶日知会，该书即归中华书局发行，一九二九年交稿，至一九三〇年春间出版。

不料书甫出版，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参事吴醒亚就大为反对，借口该书抹煞起义的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欠公道，便联名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该书发行。于是伪党部强令中华书局把所有成书，不论精装平装，一律缴出，不得隐藏，且派了一大批恶徒，挟着铡刀，当场把所有成书拦腰铡毁，谑者说是《武昌革命真史》被腰斩。腰斩了的书，字迹只有一半，文义不相连属，不成其为书了。

至于该书的内容，不妨在这里谈一下，首列一叙，那是曹亚伯自己撰写的。正文分十五章：一、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二、武昌日知会之运动；三、同盟会之成立及吴樾炸五大臣；四、陈天华投海；五、孙文革命之追记；六、欧洲学生之革命潮；七、武昌日知会之破案；八、殷子衡之日记；九、被难各人略述；十、禹之谟之死难；十一、徐锡麟刺恩铭；十二、各地纷起革命

军；十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十四、杨笃生蹈海；十五、铁路国有问题与武昌起义前之准备。附录为武昌首义人名表，铜版印着很多遗像，如邹容、史坚如、黄克强、宋教仁、孙中山、陈天华、吴樾、刘敬安、季雨霖、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熊成基、温生才、蒋大同、赵声、杨卓霖、杨毓麟、杨德麟、袁礼彬等凡二十余幅。又有长沙日知会账目，刘敬安办日知会时之墨迹，孙中山遗墨，冯启钧之名片，殷子衡在狱中之肖像，黄克强、胡展堂对黄花冈一役报告书真迹，都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

丁氏兄弟创制聚珍仿宋铅字

我国的印刷，由木版而用活体铅字排印，这对文化的发展确是一大贡献。这种铅字，称为宋体。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谈到这个问题说："古书俱系能书之士，各随其字体书之，无所谓宋体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是即今日流行铅字之体也。"

由宋体发展为聚珍仿宋铅字，此中有一个小故事，不妨把它叙述一下：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弟兄二人，曾辑刊《武林金石志》、《武林掌故丛编》，又复补写《四库全书》，当时是很著名的。丁氏后人丁善之，名三在，渊源家学，精于版本目录。端午桥设江南图书馆，丁善之由缪荃荪推荐进该馆，整理图书数十万卷，无不井井有条。辛亥革命前夕，端午桥入蜀，被革命党所杀，丁善之也就回到杭州，息影三竺六桥间，辑其尊人修甫所著的《小槐簃吟稿》，裒然成集，预备排印。但觉得铅字太呆板，不很雅观，他就动脑筋广征宋版书籍，精摩字体，初拟刻以黄杨，以工料太贵，改用铅字，且出资聘刻工刻铅质活字，精制铜模，范铸铅字，其中须经过八道手续，他便把这一过程做成《考工八咏》，现将其八首诗录在下面：一辨体："北宋刊书重书法，率更字体竞临摹。元人尚解崇松雪，变到朱明更不如。"二写样："敢将写韵比唐人，仿宋须求面目真。莫笑葫芦依样画，尽多复古诩翻新。"三琢坯："祸枣灾梨世所嗤，偏教雕琢不知疲。黄杨丁卮非关闰，望重鸡林自有时。"四刻木："刀笔

昔闻黄鲁直，而今弄笔不如刀。及铎一试昆吾利，非复儿童篆刻劳。”五模铜：“指挥列缺作模范，天地洪炉万物铜，消息阴阳穷变化，始知人巧夺天工。”六铸铅：“一生二复二生三，生化源流此际探。轧轧如闻弄机杼，不须食叶听春蚕。”七排字：“二王真迹集千文，故事萧梁耳熟闻。今日聚珍传版本，个中甘苦判渊云。”八印书：“墨花楮叶作团飞，机事机心莫厚非。比如法轮常转运，本来天地一璇玑。”

不意聚珍仿宋活字版功未及半，善之忽然病死，幸其长兄辅之承其未竟事业。全部完成后，创设聚珍仿宋印书局，于一九二六年开幕，把《小槐簃吟稿》及善之的遗作《丁子居賸草》，先后刊印成书，并代客印简帖、名片等。奈丁辅之不善经营，把这全部仿宋铅字让给商务印书馆。商务无意于此，由中华书局陆费伯鸿收购。后来伯鸿曾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提到此事说：“杭县丁辅之兄弟费十余年心力，取宋版书字体仿写，制成铜模，名为聚珍仿宋版，有方体、长体、扁体三种，后归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古色古香，可与清代最精之仿宋刊比美。”后来商务看到中华的成绩，却深悔当时不收购是坐失良机，赶紧聘请韩佑之设法仿制，但已落在中华之后，始终认为是营业上的一大失着。

鲁迅嘉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民初，翻译之风很盛，数量较多的为林译小说，但林琴南不懂外文，由旁人口译，他作笔述。直接翻译而具有相当数量的，便要推中华书局所刊行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了，译者为吴门周瘦鹃。可是，这书早已绝版，如今不易看到了。周瘦鹃却有一篇回忆的文章，很有趣味，兹节录如下：

"二十岁时，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英文组聘我去专做翻译工作，除译了几种长短篇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外，还译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供给该局月刊《中华小说界》，《中华妇女界》等刊用。二十二岁时，为了筹措一笔结婚的费用，就把这些年来译成的西方各国名家短篇小说汇集拢来，又补充了好多篇，共得十四个国家的五十篇作品，定名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计英国十八篇，法国十篇，美国七篇，俄国四篇，德国二篇，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芬兰、塞尔维亚等国各一篇，并于每一篇之前，附以作者的小影和小传。这五十篇中用文言文翻译的多于语体文。

"编译完工之后，就由局中收买了去，得稿费四百元，供给了我的结婚费用。包天笑先生在卷首的序文中，还提到此事。天虚我生陈栩园先生，在序言中道出翻译西方小说的甘苦，而主编《礼拜六》周刊的王钝根先生，也作了一篇序，除了夸奖之外，也说到我艰苦笃学之况。现在包先生虽还健在，年逾八十，而远客海外，阔别多年，陈王二先生已先后作古，无从亲

炙，重读遗文，如听山阳之笛，不由得感慨系之！

“当时中华书局当局似乎还重视我这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九一七年二月初版，先出平装本三册，后又出精装本一册，我自己收藏着的，就是这样一册精装本。只因经过了四十年，书脊上的隶书金字，已淡至欲无，而浅绿色的布面也着了潮，变了色了。不意到了一九一八年二月，还再版了一次，这对于那时年青的我，是很有鼓励作用的。至于中华书局把这部书送往教育部去，申请审定登记，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两年后，我已不在局中工作，局方却突然送给我一张教育部颁发的奖状，使我莫名其妙。直到一九五〇年，周遐寿先生用‘鹤生’的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此文后收入他所著的《鲁迅故家》中），我才知道：民初，鲁迅先生正在教育部里任社会教育司科长，这部书就由他审阅，批辞甚为赞许。那奖状当然也是他老人家所颁发的了。后来周遐寿先生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鲁迅与清末文坛》那篇文章中，又提起此事。

“我推想鲁迅先生之所以重视这部书，自有其原因。周遐寿先生也说得很明白，说他对于我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

“我翻译英美名家的短篇小说，比别国多一些，这是因为我只懂得英文的原故。其实我爱法国作家的作品，远在英、美之上，如左拉、巴尔扎克、巴比斯、莫泊桑诸家，都是我崇拜的对象。东欧诸国，以俄国为首屈一指，我崇拜托尔斯泰、高尔基、安特列夫、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罗曼诺夫诸家，他们的作品我都译过。此外，欧陆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我也欢喜，经常在各种英文杂志中尽力搜罗，因为他们国家常在帝国

主义者压迫之下，作家们发为心声，每多抑塞不平之气，而文章的别有风格，犹其余事。所以我除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发表了一部分外，后来在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八十篇中，也列入了不少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

周瘦鹃后来从事园艺，抛弃了笔墨生涯，同文们都希望他重新执笔，再译一些进步作品。岂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含冤而死，这是令人悼惜的。

“红屋”——世界书局

民初，上海的书局大都集中于河南路，当时称为棋盘街。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广益书局、正中书局、审美书馆、新学会社、中原书局、锦章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馆、著易堂、文瑞楼、公民书局等等，以后渐渐移到福州路，如中华书局即在福州路河南路转角，其他如泰东书局、开明书店、群众图书公司、国华书局、崇文书局、美的书店、上海图书馆、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都集中在那里，有“文化街”之称。

世界书局，异军苍头，最初由绍兴人沈知方主持。为了引人注目，当时它欢喜在“红”字上面做文章。如把门面全部漆成红色，称为“红屋”。发行一种周刊，取名《红杂志》，由施济群负责编辑，严独鹤担任编辑主任，借以号召。该刊出满一百期，改名《红玫瑰》，由赵苕狂主编，都是环绕着“红屋”的“红”字而取名的。这两种杂志，写稿的很多，尤以向恺然、程瞻庐为台柱。向恺然的长篇，如《江湖奇侠传》，程瞻庐的长篇，如《新广陵潮》、《快活神仙传》、《葫芦》、《滑稽新史》、《情茧》、《童树的年轮》，先后有六种之多，其他还有许多诙谐小品。

世界书局的《红玫瑰》

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没有撰完，赵苕狂代续，刊印单行本，向很不高兴，几乎要和沈知方打官司。程瞻庐却和沈关系搞得很好，这时程住在苏州，沈常亲自把稿费送到苏州，并向他请教杂志的编排和内容等问题。程瞻庐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沈知方就把程的意见带到上海来，从善如流，立行改革，所以有人戏称程为该局的"局外编辑"。

世界书局最初的出版物，大多是小说一类，自从《红杂志》、《红玫瑰》刊行以来，风行一时，又请张云石、程小青、陆澹安、江红蕉编刊《快活》、《侦探世界》、《家庭杂志》。并在这些杂志中抽出许多短篇小说，分别出版了不少单行本，有《程瞻庐说集》、《王西神说集》、《范烟桥说集》、《沈禹钟说集》、《江红蕉说集》、《冯叔鸾说集》、《张枕绿说集》等等，好在稿子是现成的，不必付稿费，本轻利重，也就再版三版了。尤其是《江湖奇侠传》刊行单行本后，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电影《火烧红莲寺》，连摄了十多集，轰动一时，书的销路当然也就更好了。岂知国民党政府忽然下令，禁止武侠小说的发行，这一下直使沈知方大为懊丧，偌大的一笔利润，只得忍痛放弃。这时平襟亚在福州路一条弄堂里开设中央书店，发行《人海潮》等小说，正想图谋发展。他曾在世界书局任过编辑，和沈知方很相熟，他知道国民党政府对某些决定常朝令夕改，就和沈知方相商："你这部《江湖奇侠传》与其搁着不印，不如给我翻版。你偌大书局犯不着冒险发行，万一被认为干犯禁令，勒令封门，那不是损失太大了吗？给我翻印，不妨试试看，万一封门，我规模小，也无所谓。"沈知方考虑之后，颇以襟亚之说为然，也就乐得做人情，把《江湖奇侠传》版权无条件让给襟亚。襟亚大量翻印，廉价出售，销了十几万部，赚了很多钱，国民党政府却始终没有

问过讯。沈知方平日处处精明强干，但在这点上只好自认失着了。

由于商务、中华的教科书获利丰厚，世界书局当然眼红，也就编辑几种主要科目的教科书，先行试销。商务、中华利之所在，岂肯容人分沾，"世界"当然搞不过他们，所以它的教科书，也就销不出去。沈知方只得另想别法。他看到开明书店所出的《开明英文读本》，中学校纷纷采用，销数惊人，赚了很多钱，他就请林汉达编了一本《标准英语读本》，想取《开明英文读本》而代之。书刚出版，林语堂看到之后，认为该书形式和他所编的《开明英文读本》相同，且有几课的内容差不多，便怂恿"开明"主持人章锡琛请律师写信给"世界"，提出警告，要求立即停止该书的发行，并赔偿损失。同时在报上登着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开明英文读本》的广告。沈知方对"开明"提出诽谤罪的刑事控诉，一面请律师驳复"开明"的广告，两方纠缠了很久。同时"世界"将该书送请南京教育部审查，审查员却认为《标准英语读本》有独到之处，胜过《开明英文读本》，可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和林语堂相识，他袒护林语堂，对"世界"《标准英语读本》，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沈知方就请林汉达从速再编一部《进步英语读本》，用进步英语学社名义出版。这时蒋梦麟已下台，"世界"乘机把《标准英语读本》重新送审，结果把《标准英语读本》颠倒了两个字，为《英语标准读本》，准予发行。林汉达另编的《进步英语读本》，也被审定，两书同时发行。一笔诉讼费却归林汉达负担，在版税上扣除。

世界书局还刊行国学名著，属于经部的，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

三传》。属于史部的，正史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编年史有《资治通鉴正续》。史评有《史通通释》、《文史通义》。属于子部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论衡》、《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属于集部的，文集有《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骈体文钞》。诗歌有《楚辞》、《古诗源》、《十八家诗钞》。词曲有《词综》、《元曲选》。小说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文学批评有《文心雕龙》、《诗品》。这个国学名著，实际上就是把商务、中华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化整为零，使之小型化，便于读者购买。它还用国学整理社的名义，刊印了《柳河东全集》、《白香山诗集》、《欧阳修全集》、《陆放翁全集》、《方望溪全集》、《郑板桥全集》。又向广智书局收购了《王临川全集》和《王安石评传》，合刊成一书。印行这些书，目的是和"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相竞争。它还印行了《艺林名著丛刊》，收入《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画禅室随笔》、《画筌》、《桐阴论画》，《桐阴画诀》，附着墨迹插图。《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收入《窈闻》、《续窈闻》、《陶庵梦忆》、《影梅庵忆语》、《三侬赘人广自序》、《乔王二姬合传》、《浮生六记足本》、《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扬州梦》、《小螺庵病榻忆语》，由朱剑芒一一加以考证。又刊《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收入前人论画作品八十余种，沈子丞编，且撰《绘画概述》，自魏晋至清代，作系统的介绍。又刊蔡冠洛所辑《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世界书局看到《福尔摩斯探案》颇有销路，就请程小青主持其事，约了范烟桥、范菊高、包天笑、赵苕狂、顾明道、尤半狂、吴明霞 徐碧波、钱释云、郑逸梅等，在短期内，把所有福尔摩斯探案原文，重行用语体文翻译一过，加以新标点，刊成《福尔摩斯

探案大全集》，共十二册，又附《写真图》一册，和大东书局的《亚森罗蕨全集》竞争。又把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三十多种汇编成套。其它如张春帆的《九尾龟》，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满江红》、《落霞孤鹜》、《金粉世界》等，都很畅销。

沈知方看到街头巷尾的小书摊，总是挤满一群孩子，在那儿租看小型图画书，这种小型图画书，文字既欠通顺，图画又很粗俗，他就想办法，要把图画画得鲜明生动，以增加吸引力，于是先把《西遊记》作为题材，请章育青、陈丹旭、李澍臣、蒋润生等绘画，成为"连环图画"的创始，以后又出版了《三国志》、《水浒》、《封神传》、《岳传》、《火烧红莲寺》，共六种。每一种共若干册，外加一布套，售价低廉，销路很好。张静庐所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也提到："连环图画这个名称，是世界书局一九二一年出版大批图画书开始用的。"

后期的世界书局，由李石曾掌握全权，成为官僚资本，那是有渊源的。原来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文书籍，是由平海澜、谢福生、盛谷人、严独鹤等主编的，后来严独鹤主编《新闻报》附刊《快活林》，向该局辞职。这时林汉达计划编《英文小丛书》，建议世界书局出版，沈知方邀林汉达来谈话，一谈非常投契，便请他任该局英文编辑。林汉达和陆高谊是同学，就介绍陆进该局担任总管理处秘书，不久升任经理。陆和李石曾相熟，这时世界书局在经济周转上有些问题，陆便向李石曾借款。李石曾创办"世界社"，拟编《世界学典》，世界书局的名称，和他的"世界社"《世界学典》不谋而合，于是向世界书局大量投资，并拉了编过《四库大辞典》的杨家骆来编刊《世界学典》，并在武康路的"世界社"内设立"学典馆"，预支大批的稿费和编辑费，结果仅印成《四库全书学典》一大册。李石曾为了达到所谓文

化政治宣传的目的，又刊行《世界月刊》、《世界农村月刊》、《世界交通月刊》、《世界华侨月刊》，由林素珊、杨家骆、毕修勺等合编。林素珊本来是戏剧家焦菊隐的妻子，就在这时，林和焦离婚而与李结为夫妇，更加强了小集团的力量。同时请李鸿球主编《世界集刊》，标榜"杂志丛书化，丛书杂志化"，其中有陆丹林的《当代人物志》，屈弹山的《雉尾集》、《宋诗纪事拾遗》、《嘉兴乙酉兵事记》、《诗经韵论与韵谱》，温肇桐的《美术与美术教育》，陈邦贤的《自勉斋随笔》，刘伯远的《中国的古乐》。又杨家骆的《琉璃江旁的琉璃宫》、《雅兰亭的圣诞老人》、《真理之神》，以及《狄岱麓与李石曾》，那更是为李石曾宣传了。

据统计，世界书局先后出版图书五千五百多种。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下一年经人民政府接管，世界书局的牌子也就取销了。

三 种 伪 书

伪造的书，自古有之。就世界书局出版的书籍而言，即有三种是作伪之品。

一是《当代名人轶事大观》。这书是有光纸石印本，把每一有名的当代人物，写上二三百字的小文，记述他风趣的故事。署吴趼人著。这里面的记述，都是向壁虚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时间先后，也有问题。甚至有些事情的发生，揆诸时日，吴趼人已经逝世，决不可能有所见闻。加之笔墨也很庸俗，和吴趼人的文风相差很远。这显然是因为吴趼人在文坛上很有名望，借他的大名出书，可以多卖些钱。好在死无对证，作伪无所谓，便毅然出此了。但究属出于谁之手笔，那就无法究诘了。

二是《石达开日记》。按《石达开传》："石在大渡河为川军唐友耕所败，进至老鸦漩，势穷被缚。在狱中述其生平事迹，及天王起事以来，与清军相恃，胜败得失之由，为日记四册。"这四册日记，后来不知下落。世界书局却登着广告，托言"在四川藩库中，觅得石氏真迹日记数卷，特托友人，借以录抄，间有残蚀不全者，则参酌各家记载，略为润色，详加第次，汇辑成书。"信口开河地乱吹一通，印了出来，居然销数很不差。实则伪作《石达开日记》的，是常州人许指严。许名国英，是擅写掌故小说的，著有《南巡秘记》、《十叶野闻》、《泣路记》等书。他嗜酒成癖，每天工作完毕，总要到福州路石路东首的言茂源酒店

喝上一二斤花雕，随意叫几色菜肴下酒。因为他是老酒客，一切账款都由言茂源代付，等到节上，一并清算。这年端午节，他实在经济拮据，这笔酒菜账没法应付，倘拖欠了未免有失信用，以后不能再赊。正在踌躇，忽在某刊物上阅到有人揭发石达开那首："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吾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的诗，是金山高天梅伪作的。这就触动了他的灵机，和世界书局的经理沈知方一谈，伪造《石达开日记》若干万言，保证两个月交稿，先领稿费两百元。沈知方凭着他的生意眼，认为这本书一定有销路，于是慨然先付稿费。许获得该款，清偿了欠账，透了一口气。每天晚上根据《石达开传》所叙的行径和战绩，演衍成为日记，交世界书局，印成单行本问世。

三是《足本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有好多种版本，但所谓六记，实际上只有《闺房记乐》、《闲情纪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记，惟世界书局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所印行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收入了《足本浮生六记》，四记外增加了《中山记历》、《养生记逍》二记，这样，六记才全备无缺。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名复，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三六年），苏州人。在当时是不著名的一位寒士。这部《浮生六记》埋没了一百多年，直到清末给苏州杨醒逋（引传）在护龙街旧书摊上购得，是四记的手抄本。这时王紫诠（即天南遁叟）正为《申报》馆的附属印书机构"尊闻阁"搜罗佚书，杨和王为郎舅亲戚，便把《浮生六记》抄本和其它稿件交给王紫诠，合印为《独悟庵丛钞》，约在光绪初年印行。后来黄人（摩西）执教苏

州东吴大学，辑有《雁来红》杂志，因《独悟庵丛钞》已绝版，黄人采取其中《浮生六记》刊入《雁来红》中。过了多年，和黄人同隶南社的王均卿，在进步书局辑《说库》六大函，《浮生六记》又收入《说库》中，且称为"一部具有真性情真面目的笔记小说"，从此，就广为流传了。

由于王均卿喜爱《浮生六记》，颇以佚失二记为憾，故再三设法，才搞到所缺的二记，称为足本，印入《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王为世界书局股东）。这二记是否可靠？可以说真实性是令人怀疑的。即使编辑《美化文学名著丛刊》的赵苕狂、朱剑芒，在《浮生六记考》和《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中，也表示怀疑。赵苕狂说："这样美妙的一篇自传文，却将它的五六两卷佚去，单剩下了前面的四卷，这是凡读《浮生六记》的人们，莫不引为是一桩憾事，而为之扼腕不置的。因之，便有人努力的在搜求着是项佚稿，尤其是一般出版界中人。据公众的一种意见，沈三白生于乾隆嘉庆间，以年代而论，距离现在还不怎样的久远，是项佚稿大概尚在天地间，不致全归湮灭，定有重行发见的一日，只要搜求得法而已。同乡王均卿先生，他是一位笃学好古的君子，也是出版界中的一位老前辈；他在前清光绪末年刊印《香艳丛书》的时候，就把这《浮生六记》列入的了（《浮生六记》列入《说库》，没有列入《香艳丛书》中，这是苕狂记错了）。三十年来，无日不以搜寻是项佚稿为事。最近，他在吴中作菟裘之营，无意中忽给他在冷摊上得到了《浮生六记》的一个钞本，一翻阅其内容，竟是首尾俱全，连得这久已佚去的两记，也都赫然在内，这一来，可把他喜欢煞了。现在，我们的这本，就是根据着他的这个钞本的。所以别个本子都阙去了这五六两卷，我们这个本子却有，大可夸称一声是足

本。至于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我因为没有得到其它的证据，不敢怎样的武断。但我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诚实君子，至少在这方面，大概不致有所作伪的吧！而无论如何，这在出版界中，总要说是一个重大的发见，也可说是一种重大的贡献了！”

朱剑芒说：“《浮生六记》的五六两卷，早经佚去，所以各种本子上都标明记的名目而下注着原缺，于是空有六记的名，实在只剩四记。最近经吴兴王均卿先生搜到了这部完全的《浮生六记》，在开卷以前，已感到不少兴趣，万不料淹没已久的两卷妙文，居然一旦发见，这不要说王先生所快慰，任何一个读者所亦慰，像爱读《浮生六记》的我，当然算得快慰之中的第一个了！不过我在这首尾完整的本子上，发见两个小小疑问：一，以前所见不完全的各本，目录内第六卷是《养生记道》，现在这个足本，却改了《养生记逍》。单独用一‘逍’字，似乎觉得生硬。再《中山记历》内所记，系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年）随赵介山使琉球，于五月朔出国，十月二十五日返国，至二十九日始抵温州。按之《坎坷记愁》是年冬间芸娘抱病，作者亦贫困不堪，甚至隆冬无裘，挺身而过。继因西人登门索债，遂被老父斥逐。刚从海外壮游回国，且系出使大臣所提挈，似不应贫困至此。又《浪游记快》中游无隐庵一段，亦在是年之八月十八日，身在海外，决无分身游历之理。有这两个疑问，我总和苕狂先生的意见相同，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这真是考证方面最感困难的事。近阅俞平伯先生所编《浮生六记年表》，于卷二卷四的纪年上，亦竟发见许多错误。我从这一点上才明白到作者所作六记，第四卷既系四十六岁所作，五、六两卷写成，当更在四十六岁之后，事

后追记，于纪年方面，当然难免有错误。要说王先生搜得的足本，因纪年有不符合的地方，硬说它是靠不住，那么连卷二卷四也可说是靠不住了，那有这种道理！至于《养生记道》和《养生记道》的不同，考之最初发见残缺本《浮生六记》的杨引传，他那序上曾说是作者的手稿，现在王先生搜得的足本，也是钞写的本子，究竟那一本是作者墨迹，虽无从证明，而辗转钞写，亦不免有鲁鱼亥豕之虞。'道'和'道'的形体相像，我们可坚决承认，后者或前者总有一本出于笔误的。"苕狂和剑芒，都是世界书局的编辑，对于该二记如是云云，无非曲为之解，而怀疑的态度，已很明显的了。

该二记是否系伪作，其值得怀疑之点，已如上述。即从笔墨而言，上四记较轻灵，下补二记，比较沉着凝重，显得不相类似。且在刊印足本之前，尚有一段经过情况。王均卿是南社成员，他除从事诗文写作以外，还为《金钢钻报》写稿，经常到《钻报》社与发行人施济群和我（当时我是该报编辑）晤谈。后来他在苏州筑辛臼簃，为终老之计，但也月必一二次来沪。有一天他对我谈到在苏州一乡人处，发现《浮生六记》全稿抄本，正拟向他商购。我平素也喜读该书，颇以缺佚二记为憾，听了就怂恿均卿赶紧设法买来。过了一个月，他又来上海对我说："该抄本乡人居为奇货，不肯出让，且托言不在手边，而世界书局已预备付刊，那么想一变通办法，请你撰写二记，权以弥补这个缺憾吧！"他当时还说明：每记写二万字，二记共四万字，每千字报酬以五元计，并可先付。我自己感觉才力不够，而摹仿性的代作，更不容易，加之没有资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乃婉言辞谢。可是均卿却说："请你不要客气，你出笔秀丽轻清，和沈三白有些相像。至于资料方面，也不成问题，那《养

生记道»，随便讲些养生有关的理论和行动便可，但《中山记历»却不可不有所根据。中山，是琉球的地名，沈三白生前曾经随着赵介山出使琉球，我那儿藏有赵介山的日记，就循着日记叙述，也不致相差太远。你大胆为之，包你成功。"我当时很是谨慎，始终没有搞这玩意儿。讵料不久均卿病逝苏州，那世界书局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出版，所谓《足本浮生六记»，已搜罗在里面。究属是谁的笔墨，始终成为疑窦。后来林语堂把《浮生六记»全部译成英文时，为了考证这二记的真伪，特地向我探询了王均卿的侄子，甚至亲到苏州王均卿的家里去打听，也不得要领。总之，这二记是伪作的，不是均卿自己撰写，便是请人捉刀。

章锡琛创办"开明"的经过

开明书店为章锡琛所创办。它和中华书局一样，是由商务印书馆派生出来的。章锡琛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凡十四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深受新思潮的影响，在他所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出了《新性道德专说》，章自己也写了一篇《新道德是什么》？受到《时事新报》的附刊《青光》及《晶报》的攻击，硬说章锡琛提倡"男子多妻，女子多夫"；《现代评论》也攻击章的文章是"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因而商务总编辑王云五大不以章锡琛为然，说章有失体统，不让他再编《妇女杂志》，由杜就田继任。这时章的同事郑振铎、胡愈之等很为章抱不平，劝章另编一种月刊，经过讨论，取名《新女性杂志》，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章的朋友吴觉农住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发行所即设在他家里，并由吴觉农任主编和发行人。此事被王云五知道了，就解除了章的职务，照例送了他二千元的退职金。章锡琛心不甘休，又用"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编印《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郑振铎介绍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刊》及《文学周刊社丛书》给章编刊，销数很好，出书也愈多。但是区区资金不够周转，章锡琛就和他的弟弟锡珊相商，锡珊在沈阳商务印书馆当了多年的会计，平时有些积蓄，本想别谋出路，便毅然辞职，来到上海，和锡琛合办书店。一九二六年秋，他们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开设开明书店。那块招牌，是孙伏园写的。当时规模很小，是个兄弟书店。担任工作的，除

他们兄弟两人外，发行事务由孙怡生担任，赵景深、王蒨史任编校，钱君匋设计书的封面，还有一个名索非的，校稿又兼杂务，大家通力合作，营业蒸蒸日上。发行所房子不够，又租了一些，并添聘了几位编校人员，刊行许多文学书籍和青少年读物。他们觉得销数之广，莫过于教科书，商务、中华的赚钱，大都靠着发行教科书。开明书店也就决定在教科书上谋发展。

这时立达学会同人夏丏尊、刘叔琴等编辑的刊物《一般》，托"开明"出版，后来夏丏尊、刘叔琴也进了"开明"。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和章的小舅子吴仲盐发起把开明改组为有限公司，增资五万元，一九二九年成立正式公司，此后一再增资，至三十万元，发行所搬到望平街，再搬到福州路，和中华书局望衡对宇。他们先编小学教科书，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钱君匋编《音乐歌谱》。又出中学数理化教科书。但商务和中华的教科书畅销各地，劲敌在前，"开明"在这方面无可发展。惟有《开明英文读本》，各中学纷纷采用，销行了二十多年。这书是林语堂编的，他托孙伏园介绍给"开明"出版，讲明抽版税，该书由丰子恺绘插图，使内容更为生色，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于是林语堂先后获得的版税，达到三十万元之巨，开明书店所得的利润，也就不言可喻的了。

开明书店还出了许多文史读物和参考书。如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国民党勒令改称《母》，译者署名沈端先，改为洗瑞先。又郭沫若的《离骚今译》，内有"党人之偷乐"，被认为讽刺国民党，也遭到很多麻烦。畅销的有夏丏尊的《爱的教育》，这书是意大利人爱米契斯所著的，有日文翻译本，包天笑曾以文言翻译，取名《馨儿就学记》，当时的小学国文，采取其片段作为教材。夏丏尊用语体文重译为《爱的教育》，逐期刊载

于商务的《东方杂志》上，后来商务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可是销数不多。夏与商务相商，取消契约，把该书给"开明"重行出版。这本原来在商务销数不多的书，在"开明"却畅销十余年不衰，印数约以一百版计，夏和开明书店都获得很大的收入。此外，刊行的，有《开明文史丛刊》，凡二十种，有郭绍虞的《语文通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郑振铎的《中国文学论集》、朱东润的《史记考索》、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张须的《通鉴学》等，这些书在学术上是有相当贡献的。又叶绍钧的《十三经索引》两大册，也给学者很大的便利。《开明青年丛书》，也有好多种，有丰子恺的《艺术趣味》、《艺术概论》，朱光潜的《谈美》等；《开明文学新刊》，有钱锺书的《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李广田的《灌木集》和《诗的艺术》等。《开明文史丛刊》，以钱锺书的《谈艺录》，最受社会人士的称赏。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解放后曾重印。大部头书，有一九三四年所出的《辞通》、《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本来预备出版《章氏丛书正续编》等，因抗日战争爆发，未成事实。最可惜的是：原定出版黄季刚日记和遗著，由宋云彬向季刚后人念田处取得季刚日记原稿数十册，在抗日战争时期运往汉口，准备在汉口排印，不幸被日军劫持而去，不知所终。幸其弟子某录有副本，有一九一九年的《仰山堂日记》，一九二一年的《楚秀庵日记》及《六祝斋日记》，一九二二年的《感鞠庐日记》，一九三〇年的《寄勤闲室日记》等，惜不完全。开明书店一度移往武汉，又从武汉移往重庆，后在桂林设总办事处，范洗人任总经理，编译所仍在重庆，由叶圣陶主持。一九四六年开明书店全部迁回上海。到一九五三年，和青年出版社合并，改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开明书店所出定期刊物，除上述《新女性》及《一般》杂志外，尚有金仲华、叶圣陶、夏丏尊所编的《中学生》，寿命很长，共二百多期。又《新少年》，一度改称《开明少年》，共出四十六期。《月报》，胡愈之编，共出七期。

关于《辞通》

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五年首创《辞源》，为当时规模较大的一部工具书，继之有中华书局的《辞海》，后来，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一部《辞通》，成为鼎足而三的巨著。可是《辞通》和《辞源》、《辞海》有显著的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从声音的通假上去寻求文字训诂。它把古书中各种类型的两个字的合成词，排比整理，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部编次，而以常见的词列在前面，把和这词意义相同而形体相异的词，一一附列于下，说明某词始用于何时，见于何书，并且指出某词是某词的音近假借，某词是某词的义同通用，某词是某词的字形讹误。刘叶秋所编的《中国的字典》一书，曾附带介绍了《辞通》。

《辞通》是谁编写的？朱怿曾有《朱起凤刻苦编辞通》一文，把它录在下面："《辞通》全书三百余万字，是作者朱起凤从一八九六年起，到一九三〇年止，化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编成的。以个人的力量，编纂这样一部巨著，确实十分不易。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从事这一工作呢？其中还有个小故事。

"朱起凤的家乡是浙江海宁。他生于一八七四年，卒于一九四九年。前清时，县里有一个安澜书院，吸收生员，童生入院学习。肄业生每月要做月课二次，由山长负责批改，评定等级名次，并依等级名次发付奖金。当时书院的山长是吴浚宣，吴号紫菽，是同治辛未科进士，散馆授检讨，大家称他为吴翰林。当时吴翰林的年纪已大，虽然担任了山长，但批改课卷，

在精力上已感到不济。恰好朱起凤年纪虽轻，在乡里却小有才名。吴翰林是朱起凤的外祖父，对他比较了解，便请他代改书院的部分课卷，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了。

"那是光绪二十一年，朱起凤在一次批改课卷中，见到有引用成语'首施两端'的，他以为'施'字是'鼠'字的笔误，就把它改为'首鼠两端'，且在课卷上加了批语。课卷发下后，那位作者以为课卷是吴翰林自己改的，很不满意，便约了人一起去找吴评理，说他连《后汉书》也没有看过，把吴弄得很难堪。事后，吴把朱找来说了一通，朱起凤回去查《后汉书》，果然在《西羌传》和《邓训传》中找到了'首施两端'这一句话，而且书中的注还指明：'首施，犹首鼠也'。

"朱起凤因此感到一方面是自己的学识还不到家，一方面也由于汉字的同音通假很多，难免发生错误。于是下定决心，抄录古书中的一切双声叠韵词，并注明出处，准备编著成书，以便后人查阅。在他的长期刻苦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辞通》这一巨著。"

按朱起凤，字丹九，是前清的一位贡生，他写成这部书，初名《蠡测编》，后改称《读书通》，凡三百万言，真所谓瘁精竭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颇想公之于世，可是自己印不起，想让给书局印行，初示仓圣民智大学哈同氏及吴兴刘翰怡，议价不合，便持至商务印书馆，这时《辞源》出版才四年，商务正着手编撰《辞源续编》，无暇兼及《读书通》的编印。朱起凤又兜售于文明书局，该局经理只肯出一千八百元购其版权。朱起凤以其出价太低，不愿廉让，带回乡间，复阅古今甲乙各部，把辞类可以通假的，随手摘录，六七年来积稿三尺余，又成续编四十八卷，每条详加按语，说明其通、同、误、变之故，精审胜于初稿。

他以前人著作已有名《读书通》的，又改称《新读书通》。一九二五年，他的亲戚吴文祺供职商务印书馆，朱再携正续编来沪，托郑振铎介绍给商务。这时王云五主持编辑事宜，竟不加翻检，不及一小时就将原稿退还。一九二七年，复由胡适之携稿至商务，商务正致全力编印《万有文库》，又遭第三次的拒绝。再携至南京中央研究院，该院虽愿收购他的稿本，但说出版与否，须决定于经费之盈绌。朱起凤认为撰述该书，耗去三十余年精力，谈何容易，一旦搁置，徒饱蠹鱼，未免可惜，便即罢议。这时宋云彬写了一篇《介绍新读书通》，载在孙伏园主编的《贡献》杂志上，吴文祺也在报上写了几篇介绍文章。此事被群学社整订古籍的许啸天知道了，便怂恿群学社主人承印该书，与朱起凤订立契约，决定正续编合并，可是该社自己没有印刷机，且该书很多僻字，非摹刻制型不能办，故开始付排，即感棘手，次年夏，只得解约。可是朱起凤由于社约的敦促，竟于数月中把原书重行整理一次，颇多改正，这一点应当归功于该约。一九三〇年吴文祺选录《新读书通》若干则，作成提要，写付油印，携数十册来沪，由徐志摩取一册至中华书局，朱宇苍取一册至医学书局（丁福保主持该局，亦刊行文学作品）。医学书局无力承印，中华书局舒新城见僻字太多，排校困难，拟付石印，曾试摄照片，以字太小未能上石而作罢。舒覆信徐志摩，谓非将原稿笔画加粗，势难印行。不多久，徐调孚往访宋云彬，宋为朱起凤的高足，便以提要本给调孚一看，调孚甚为重视，携至开明书店，夏丏尊、章锡琛即有购买版权之意。宋云彬立即写信给朱起凤，把原稿携来上海，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郑振铎看后，极为赞赏，由开明书店出六千金稿费，以酬朱起凤积年之劳，把书分为二十四卷，改名《辞通》，周振甫、卢芷

芬、宋云彬细加校订，历时三年，于一九三四年八月正式出版。该书精装两大册，首冠章太炎、钱玄同、夏丏尊、程宗伊、刘大白等序文。二十四卷正文外，又有《辞通附录》，胡墨林复为之编制索引。查阅很方便，有二种分法，一从上册卷首的《检韵》中按韵去查词尾，一从下册卷末的《索引》中按四角号码检字法去查词头即得。朱起凤在《辞通》出版时这样说："十年来为此书奔走接洽，撰文介绍，则文祺之功最伟，而诸先生助我张目，始予得亲见此书出版，尤所铭感。"在旧社会中出书之难，于此也可见一斑。

刊行大量笔记的文明书局

文明书局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创办人是无锡人俞复(仲还)、廉泉(南湖)及丁宝书。俞任经理，出版新颖教科书《蒙学课本》。此后延聘了赵鸿雪进馆，赵能自制铜版，印行了许多画册，如徐熙《百花图长卷》、李龙眠《九歌图人物册》、文衡山《潇湘八景册》、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碑帖方面，如《兰亭序十二种》、《楷帖一百种》、《赵文敏书真迹八种》、《黄庭经五种》以及《碑帖大观》二十六册。不但销行于国内，且远及日本和南洋群岛，读者对其评价是很高的。

该局最大的贡献是刊行了大量的笔记，在学术上，在史料上，都有参考价值。这种笔记本子很小，携带方便，尤为旅行良伴。第一种名《说库》(由进步书局王均卿编辑，后归文明书局发行)，有光纸石印，线装本，六十册，收入笔记一百七十种。从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起，至清黄人《大狱记》止，每种都由编者撰写提要，使人对书的内容一目了然。它的例言有云："丛帙之刊，首戒割裂，明代说郛等书，恒蹈此弊，破碎遗著，古人呼冤。本编所录，务从完本，其早经散佚已无完本者，仍行甄入，以存古籍。近日仿刻古籍，都非善本，鲁鱼亥豕，讹夺迷目。本编甄录，半系秘本抄本，名家手校未经刊印本。其已刊者，则依据江浙藏书家之精本原刻本，校订之功，其详其慎。"这些说法虽未免夸张，然其优异处亦不难窥见。

别有《清代笔记丛刊》，分八函，一百六十册，其中颇多是《说库》所未收的，如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卢若腾的《岛居随录》，张尔岐的《蒿庵闲话》，徐锡麟的《熙朝新语》，王韬的《甕牖余谈》，朱翔清的《埋忧集》，叶廷琯的《鸥波渔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百一居士的《壶天录》，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邹弢的《三借庐笔谈》，乐钧的《耳食录》，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俞樾的《春在堂随笔》等都是。也有极普通习见的，如《阅微草堂笔记》、《虞初新续志》、《香祖笔记》、《两般秋雨盦随笔》、《夜雨秋灯录》等。该书既称《清代笔记丛刊》，当然非收入不可了。

《笔记小说大观》，虽由进步书局辑刊，但也归文明书局发行，共四十八函，凡五百册，为《说库》的姊妹篇，内容和《说库》所采，没有一种相同，读者购了《说库》，不得不再购该书。每种也有提要。《说库》的提要，在总的目录后。是书没有总目录，提要就登载在每篇之前，也很适当。自晋唐起，直至宋元明清，凡属名作，可谓应有尽有。最早的有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以后有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宋代黄庭坚的《宜州家乘》，元代陆友仁的《砚北杂志》，明代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清代毛祥麟的《墨余录》等。所谓笔记小说，是一种混称而已，实则都是笔记，没有小说在内。

所称进步书局，那是和文明书局二而一的，当时文明书局的门前，挂了一块进步书局的招牌，实际只是在书业商会上，有一会员资格，在开会投票时可以多得一票而已。以进步书局名义出版的书，由王均卿主持其事，姚鹓雏、曹绣君、施平阳为助理编辑。一九三二年，文明书局归并到中华书局，进步书局的名称，也就取消了。

我国自制印刷铜版的第一人赵鸿雪

前清末年，科举制度已经废掉，一般维新人士，纷纷办新的学校，提倡新的学说。无锡老名士廉南湖、俞仲还、丁宝书等，合伙来到上海，在棋盘街（今河南路）办了一个出版机构，取名文明书局。他们当时计划先从发行教科书入手，可是教科书须附图画，那就需要绘画方面的人才。廉南湖是善于精打细算的，他要以较低的工资，获得良好的成绩。他看到上海一般著名画家往往高抬身价，不易罗致，便在家乡无锡招聘绘画人员。应征合格的有三人，即吴观岱、许文熊、赵鸿雪。他们都是替人家画喜神的，画人物具有相当的基础。三个人中，尤以赵鸿雪较突出。他名印，无锡人，聪明异常，能弹弄丝竹，于琴学颇有心得，辨别音律非常精细，曾经自制琵琶和七弦琴，弹起来抑扬顿挫，动听得很。这时无锡没有人能拍照相，他第一个备了摄影机到处摄人物风景照，光线角度，都很考究。后来惠山老宝华照相馆就把他的照片放大，作为广告宣传。有一次，某校开学，校董前来演说，他能把它灌成留声片。钟表坏了，他备了个小镊子和小刀，能自己修理，凡此种种，在数十年前，都是不容易的。

赵鸿雪应聘到了上海，进入文明书局，为教科书作画，当然胜任愉快，所以廉南湖很赏识他。文明书局发行的教科书，销数很不差。他们用铜版影印名人画册，需把原件摄成网目形的纹迹，然后在光滑的铜版上，涂着化学药品，并用硝酸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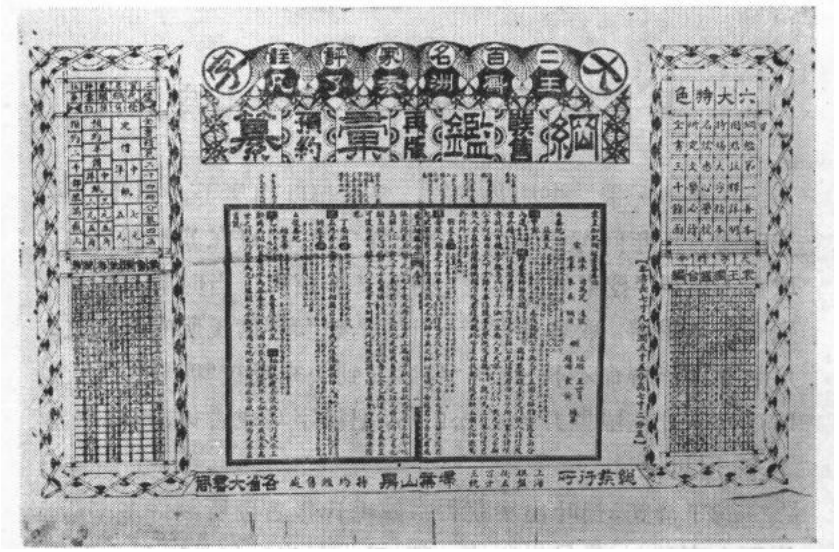
蚀露出的铜面，手续是很繁复的。当时会制铜版的，在上海只有日本技师，我们中国人还不懂得这一技术。那些日本技师傲慢自大，赵鸿雪虽虚心向他们请教，仍一无所得。日本技师非但不肯指导，还让人上当，白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赵鸿雪受到这个刺激，便下定决心，非探出这个制造方法不可。廉南湖看他有志，允许给予一切人力物力的援助，鼓励其试制。赵鸿雪经过几次试验，都失败了；有一次偶一不慎触到硝酸，他的半个指头都烂掉了，仍不灰心和害怕，照旧试制，结果终于试制成功。从此文明书局不再请日本技师制版，日本技师失去生财之道，把赵鸿雪恨得牙痒痒地。所以文明书局铜版印行的书和画册特别多，在商务、中华、有正书局之前，这不得不归功于赵鸿雪的智慧和毅力。

具有四百年历史的扫叶山房

在苏沪一带，书店最老的，要推扫叶山房了。扫叶山房是明朝万历年间苏州洞庭山席氏所开设，地点在苏州阊门内，取古人所说“校书如扫落叶”的意义作招牌。当时有人嫉妒，别开一家书店，取名卷席斋，目的是想“卷”席氏所有而代之。可是卷席斋寿命不长，原想“卷席”，到头来反被“席卷”了。当时还有人在它隔壁开设扫松山房，把松字写成古体，和叶字差不多，用以混淆。

到了清初，扫叶山房获得常熟毛氏汲古阁所刻许多书版，因而大事翻刻，最早出版的一部《二十三史》，便是用汲古阁原刻《十七史》，删去钱序，增添其它六史汇刻而成。传说清康熙皇帝南巡驻跸苏州时，扫叶山房主人进献新刻的《全唐诗》一部，获得康熙嘉奖，赐给珍品，从此声誉卓著，成为唯一的大书店。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爆发时，该店正在刊印《旧唐书》二百卷，在战争中，书版被毁，未能成书。过了数年，便在上海城内彩衣街设立扫叶山房分号，把出版重心移至沪南。后来又在棋盘街设立北号，以示区别于苏州的苏号和上海城内的南号。后北号俨然成为总店。此后又在汉口设立汉号，在松江设立松号，规模更大了。它出版经史子集等书籍，大都为石印线装本，用洁白连史纸，并延请松江名士雷君曜、君彦弟兄作注释。整部头的书，有《百子全书》八十册，分成八函，《梨洲遗



扫叶山房的石印刊物

书》汇刻三十三种，《金石萃编》三十二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四十八册，《寄青霞馆围棋谱大全》十六册，《唐人说荟》十六册，《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五十四册，《佩文韵府》二百册，《骈字类编》四十八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八十四册，《西清古鉴》三十册，《灵鹣阁丛书》四十八册，《昭代丛书》一百七十二册，《湖北丛书》一百册，《太平御览》一百册，《玉函山房辑佚书》一百册，《武林往哲遗书》九十六册，《册府元龟》二百册，《七经汇纂》一百四十二册，《碑传集》六十册，以及《佩文斋书画谱》、《随园全集》等等。也有些较近的作品，如《近人诗录》、《文艺杂志》，出了十三期。又为伊峻斋印《石琴馆法帖四种》。当时丁传靖把吴三桂和陈圆圆事，谱为传奇，命名为《沧桑艳》，斥货

刻成木版，很是精雅，用以赠送戚友，仅印数十部。隔了若干年，被该店主持者获得一部，认为这是一种“遗作”，就把它付诸石印，印数较多。岂知丁传靖尚健在，和该店交涉，且牵涉版权问题，该店深知理屈，不得已，便挽雷氏弟兄代表该店向丁氏道歉，相商和解。结果由雷氏弟兄出示该店书目册，凡书目册中所有的书，愿每种奉赠一部，作为抵偿。既而丁氏逝世，其子柏岩深幸该书得由石印流传，原来既失手稿，木刻本亦一无所存，反而感到扫叶山房此举之沾溉有功了。

民国初年，国人提倡国货，该店登广告积极响应，声言：“迩来爱国潮流，风发云涌，本号亦国民一分子，有提倡国货之天职，敢不敬随诸君子之后，稍尽国民之义务。此后新印各书，除选用纸墨等料，益加审慎外，诸凡书籍之附属用品，如书面书函等类，亦皆采用国货，以免利权外溢”。当时农商部国货展览会发给一等奖，该店引为荣誉。

五四运动后，新文艺受到社会拥护，由于该店刊印古旧文学书籍，业务日趋衰落；加之经营欠善，墨守成规，那就不免为时代所淘汰。于是奄奄一息，延至一九五四年，这开设了四百年之久的老店，也就关门大吉了。

最早编印白话教科书的彪蒙书室

编印教科书，清末已经开始，不过那时是文言的。如小学国文有一篇叫《墨》的，云："制墨之法，或用松烟，或用油烟，和之以胶，范之以型；及其乾则成墨。用时注水于砚而磨之。或以匣盛绵，注墨汁于其中，可以经久，取携尤便"，诸如此类，小学生不易了解。

这时有位钱塘人施崇恩，字锡轩，主持上海彪蒙书室。这家书室，开设在棋盘街上，一开间门面，规模并不大，却编印大量的小学白话教科书。谭彼岸的《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一文中说："这种进步的启蒙思想，对于晚清白话文运动起了推进作用。"谭氏为彪蒙所编的书，都有插图，如一九〇三年出版的《绘图识字实在易》，包括白话解说和文言解说两部分，把字分为实字和虚字两大类。他又把之、乎、者、也等虚字，集拢在一起，分门别类，编成《速通虚字法》一书，他在缘起中这样说："……那知道虚字里面，有实在道理呢？如今仔细想想，这一系列的字，都有门类可分，我现在且列出几种名目，将一切虚字，集拢在一处，每一类先用白话做几句解说，随即举例作为练习，把虚字嵌在俗语里面，要小孩子练习得熟，练习熟了，遇着文言中的虚字，也自然而然能领会了。我做这种书的主意，想把十年八载，三年五载难通的虚字，在一年半载，便得尽通……"。这部书把虚字分为二十五类，最可贵的，是把虚字用图画表示出来，使人从直观中领会虚字的使用法，真是煞费苦心。

一九〇五年，他又编辑《绘画蒙学造句实在易》，全书分十六法，每法都冠以白话解说，并加比喻，明其作用。同时有一位程佑甫，编《论说入门》，全书包括作文法十四项，每项都用白话解说。又有《四书新体速成读本》，经文和白话文对照，并有插图，销行二十余版，各地小学都采作课本，可见它的影响之大。但这种编法触犯了清政府，被认为利用白话译经书，是传播维新思想，对其统治大为不利，因此下令禁止流通。彪蒙书室经此打击，不久就停业了。

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吴友如其人

英人美查原在华贩茶为业，精通中国语言文字。某岁亏了本，颇思改业，他的买办陈莘庚鉴于《字林报》中文版的《上海新报》销行很畅，就劝美查办报，并推荐他的江西同乡吴子让为主笔，美查表示赞成，立即派钱昕伯赴香港调查报务，归来仿效，便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创刊《申报》，获利后，想进一步添设副业。这时一个法国人和华人邱子昂，在徐家汇土山湾办了一个石印印刷所，专印天主教方面的宣传品。美查即聘邱子昂为石印技师，于一八七六年开办点石斋石印书局，用轮转石印机印刷《圣谕详解》等书，印刷厂设在南京路泥城桥堍，发行所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它的告白云："本分局专办一切石印经史子集，以及中外舆图、西文书籍、名人碑帖、画谱、楹联、册页，花色齐全，价目克己。绅商赐顾，请认抛球场南首三层楼红墙洋房可也，此布。"

石印翻印的工具书，获利最厚的，当推《康熙字典》。这部书是把殿板原本分作三排缩印的，上有"光绪八年岁在壬午孟秋月上海点石斋缩印，申报馆申昌书画室发兑"字样（申昌书画室，也是美查办的）。扉页《康熙字典》四楷书，四周作龙云缭绕之状。每字音释，再加古文外，更添篆书。这篆书，便是请毛承基手写的。毛字华荪，钱塘人，候选通判，工篆书及分隶镫鼎，名重咸同间，当然他所写篆书是出色当行的了。该书初印四万部，不数月便销售一空，读者要求再版，又印了六万册。

这时一般应试士子北上会试，途经上海时每人购五六部，除自己查阅外，用以赠送亲友，所以只几个月又复售罄。这样有利可图，而《康熙字典》又没有版权的，大家可以印行，于是粤人徐裕子开设同文书局，规模更大，除石印《康熙字典》外，又印《二十四史》、《佩文斋书画谱》等，和点石斋石印书局竞争。此外，还有人办了个拜石山房，成为三家鼎立。

美查此人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他看到翻印稀世古籍，可以大大赚钱，就派人四出网罗。他知道徽州某藏书家，有珍本五千多卷，非常宝贵，不肯轻易出让，就利用一个古书掮客，到徽州巧妙地窃取一部分偷运来沪，交点石斋翻印问世。后被收藏家发觉了，向会审公堂提出控告，美查用钱贿赂公堂法官，结果不了了之。当时《北华捷报》曾刊有一则《点石斋石印局偷印古书案》的新闻，揭露了美查的卑劣行径。

美查很会动脑筋，他既有石印机器，也就利用来办《点石斋画报》，为我国画报的创始。其时为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创刊号扉页《点石斋画报》五个字，是问潮馆主沈拱之用篆书写的，附有说明："本斋所出画报，自甲申年四月起，每月印售数次。第一号则为甲一，第二号则为甲二，其余按号而下，故书缝中之数目，则亦鱼贯蝉联，将来积有成数，可以装成一本，幅式大小，统归一律，毫无参差不齐之病，赏鉴家以为然否？"这个说明也是出于沈拱之手笔。那绘画主干，便是大名鼎鼎的吴友如。

吴友如是江苏元和（苏州）人，名嘉猷，友如是他的字。他从小死了父亲，很是孤苦，由亲戚介绍在阊门城内西街云蓝阁裱画店当学徒。这云蓝阁是兼卖书画的，那些书画，大都陈腐粗俗，不堪入目，不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

蜡戗对，便是什么关圣帝君、姜太公钓鱼、张仙送子等。即使画些山水、花卉、草虫、翎毛，也是拙稚平凡，毫无艺术价值。这种作品，大家都叫它"作家货"，买的主要是老农民。在苏州，卖"作家货"的地点，一部分在城里玄妙观内，一部分在阊门西街一带，所以云蓝阁的营业是比较兴旺的。吴友如在这书画氛围中瞧得多了，也能动笔描摹。附近有位画家张志瀛，看见他的作品，认为笔致不俗，可以造就，便尽心竭力的加以指导。吴也的确聪明灵巧，只几个月，就有飞速的进步，什么都能画，人物仕女，更为擅长。渐渐的一班士大夫们也赏识了他，送润求他作画。有人还把他比喻为明代的仇十洲。仇十洲是漆工出身，后来作画，享有盛名。从此，吴友如的声名一天天的大起来，甚至清朝王室也招他绘《中兴功臣图》。他费了几个月工夫，把画完成了。因不惯束缚，急急的南还。他路过上海时，石印书局正发行《点石斋画报》，便请他担任绘画主干。该画报是用连史纸石印的，每十日出一册，每册售价五分，吴就把新鲜事物作画材，如介绍外国的风俗景物、高楼大厦、火车轮船，以及声光化电等科学的东西，都能收入尺幅。当时的画家大都是保守的，认为前人的作品已经到了最高峰，好像无可进展了。见吴搞这么一套，便群起反对，认为这样的画，失掉画的品格，直把吴骂得狗血喷头。但吴友如却置之不理，一心从事新的写真，他说："绘画当跟时代而变迁，时代有这东西，尽可取为画材。我们瞧了宋元人的画，没有个不以为古雅绝俗，岂知在宋元人当时作画，也不过画些眼前景物吧了。那么现在既有新事物和我们接触，为什么要把它拒绝呢！"经他一提倡，跟随他的有周慕桥、何元俊、田子琳、符艮心、葛尊龙、马子明、顾月洲、吴子美、沈梅坡、王钊、贾醒卿、管劬安、金蟾香等

等，画新事物成为一时风尚；且有好多作品都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民族意识，如《基隆胜利》、《会审公堂》、《大闹洋场》等，这类作品大多出于吴友如的手笔。该报为旬刊，每册新闻占八页，编目用天干、地支、八音、六艺，共出三十六卷。同时尚有《飞影阁画报》，和《点石斋画报》竞争，也是连史纸石印，月出三册。所不同的，《点石斋画报》装订成册，《飞影阁画报》为蝴蝶装，内容除了新闻外，每期添加"画粹"三页，如百兽图、闺艳汇编、新妆仕女。原来吴友如对于美查的行为，很不满意，乃借端辞职。赁屋南京路石路口公兴里，别创《飞影阁画报》。从前指导他作画的张志瀛，正潦倒海上，吴友如便请他来画报馆工作。若干年后，坊间汇集吴的作品，印成《吴友如画宝》，在绘画史上放一异彩。这许多手稿，有部分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他偶作传统画，也很工缀，但外间极少见。我的纸帐铜瓶室中，尚藏有一帧他画的翎毛花卉，秾英芳丽，别具风致，是很难得的。

从《申江名胜图说》中看到九十年前的上海风光

《点石斋画报》刊行于一八八四年，同时有所谓揉云馆印行了《申江名胜图说》，为最早的刻版图册，凡研究上海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动向，当然是很好的参考书了。书共上下两册，有图有文，图为红色，文为黑色，很是鲜明，但不知为何人所编制。

所谓名胜，那是距今九十多年的情景，从现在来看，当然今昔大不相同的了。如董家渡观潮散步、湖心亭赏月闲吟、龙华塔寻梅觅句等，无非封建文人闲情逸致的描绘。又有关于游乐的，如祝听桐申园设琴会，绘着盆花阜石，绿树荫檐，有人焚香抚琴，备极幽静，且说明祝听桐乃苏州一位金石家，那申园在静安寺旁边，当时是具泉石之胜，与西园、愚园相近的一个游憩之所。又阆苑楼啜茗评花、漱芳馆素卿歌俞调等图。那阆苑楼是一座茶楼，请青楼名妓来此清唱京剧，一班王孙公子，趋之若鹜，是非常热闹的。朱素卿是弹词女艺人，善唱委婉转折的俞调（俞秀山首创，与马如飞的马调并列），与程黛香、陈芝香等，都是一时翘楚，往往三人同时登台，两人抱琵琶，一人拨弦索，台下的长桌直置着，坐凳却左右横排，在目下新式的书场中，早已没有这种形式了。

这种图说，虽无关宏旨，但可与黄楙材的《沪游胜记》，王韬的《淞滨琐话》，同时参阅。

《申报》馆的《聚珍版丛书》及其他

《申报》馆印的《聚珍版丛书》，现在已成为稀有之本，藏书家很为重视。那时《申报》馆除发行报纸外，曾仿清乾隆用活字所排的聚珍版，用木质活字刊行《聚珍版丛书》，每种只印一二千本，不像铅质活字，可以随印随拆，且没有纸型，不易再版，所以到现在很少见到了。当时署名缕馨仙史的蔡尔康的书目序，有那么一段："迩日申江以聚珍版印书问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报》馆独为创始，六载以来，日有搜辑，计印成五十余种，皆从未刊行及原版业经毁失者，故问讯之人踵相接也。"蔡尔康便是丛书的主辑者。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七年，所印成绩斐然。一八七九年，尊闻阁主又有续书目的刊行。

丛书以笔记杂录为最多。属于地方性的，如刘世馨的《粤屑》，陈树基的《西湖拾遗》，施可齐的《闽杂记》，有关军政的，如陈昌的《霆军纪略》（霆军指鲍春霆），尹耕云的《豫军纪略》，秦湘业的《平浙纪略》，望炊的《和约汇钞》，李和叔的《使琉球记》，姚莹的《东槎纪略》，曹晟的《十三日备尝记》，这是揭露清道光间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一部信史。此外如张德明游历泰西十五国的纪录，名《航海迷奇》，那是明代人的作品。又陈庚的《笑史》，独逸窝退主的《笑笑录》，两种性质是差不多的。王昶的《春融堂杂记》，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戴莲芬的《鹂砭轩质言》，王雪香的《孪史》，朱孔阳的《历代陵寝备考》，蔡尔康的《记闻类编》，那是辑录《申报》所刊奏折、论议、时事、杂

闻、诗歌等，分为十四类，为新闻记载编印单行本的开始。用小说体裁写的，有江日昇的《台湾外记》，张南庄的《何典》，汤世滦的《东厢记》，这书根据《西厢记》的结束，另作十六出，的确是别开生面。此外，还有张敦复的《笃素堂文集》，王韬的《瓮牖余谈》，黎庶昌的《曾国藩年谱》十二卷。上述各书，十之七八与史料有关，可作学术研究的参考。

《申报》馆还经营上海图书集成局，把《古今图书集成》用活字版印行。当时外国人把这部巨著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又因为《申报》是外国人美查创办的，有人也叫这个版本为"美查版"。此外又有《申报丛书》，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大都属于国际形势以及世界知识方面的，共四十多种。《申报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是为了纪念《申报》六十周年而印行的，由俞颂华主辑，后来又改为周刊，出至四卷十二期止。月刊社同时发行《申报月刊社丛书》，共十一种，如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瞿兑之的《杶庐所闻录》，以及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的地图两种。其他出版物，有秦瘦鸥的《御香缥缈录》，王一之的《旅美观察谈》，沈有乾的《成功百诀》，谢介子的《西方格言》，项远邨的《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以及《申报评论选》、《西北视察记》、《欧战实录》、《申报上海市民手册》、《申报六十周年征求学生文选》等。

《南社丛刻》和它的蜕变

梁溪、钱基博辑《现代中国文学史》，提到以文字鼓吹革命之南社，谓："南社者，创始于清季，为东南革命诸巨子所组合，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诗尚唐音，不尚西江，文喜掞藻，亦非桐城，无一定宗派，且多叫嚣亢厉之音。又一派则喜学为龚自珍之体，徒为貌似而失其胜概。但就其铮铮者而论，亦足各自成家。其尤著者，慈利吴恭亨悔晦，醴陵傅熊湘屯艮，成都吴虞又陵，吴江陈去病佩忍、柳弃疾亚子，泾县胡蕴玉朴庵以诗文，香山苏玄瑛曼殊，山阴诸宗元贞长，顺德黄节晦闻、番禺沈宗畸太侔、潘飞声兰史以诗，淳安邵瑞彭次公、馀杭徐珂仲可，无锡王蕴章西神以词，顺德蔡守哲夫以金石书画，而吴梅以曲，各以所能，擅闻于世，称矫矫者，亦文章之渊薮，而儒者之林囿也。始发起者，陈去病、柳弃疾及松江高旭天梅，而柳弃疾主持社事。春秋佳日，必为文酒之会，其地则在上海之愚园为多。岁汇所著，出《南社丛刻》两巨帙，分诗文词迭三种，已刊至二十余集，多愤世嫉时，慷慨悲歌之作，与少陵诗史相近也。"这里，把南社的人文事物，客观地叙述出来，可资参考。

《南社丛刻》，共出二十二集，最后一集为结束号，分上下二册。第一集出版于一九〇九年。第二十二集，出版于一九二三年，这时柳亚子已退出南社，由姚石子主持了。《丛刻》用四号铅字，有光纸印，直至第二十一集始用毛边纸印。印数不

多，不久即销罄，不再添印，当时欲觅全份，已不易得。柳亚子因将《丛刻》中的诗、文、词三种分类编纂，加新标点，分为《南社诗集》、《南社文集》、《南社词集》三种，由开华书局出版。由于《南社文集》，篇幅太多，结果没有刊成。胡朴安另辑《南社丛选》，用旧式圈点，封面为朱贯成题签，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国学社印行。全书凡十二册，分《文选》、《诗选》、《词选》，每一作家之前，附有小史，为《南社丛刻》所未有。但《南社丛刻》的雅集照片及亡友遗影，《丛选》却全部删去了。此后有新南社之组织，出版《新南社社刊》，全部用白话体，趋向新文化新思潮，一期即止。南社社友中的抱残守缺者，由傅屯艮发起在湖南长沙另行组织，刊有《南社湘集》八期，体裁和《南社丛刻》相同。其它还有辽社、闽社、粤社、淮南社，都从南社蜕化出来，也有刊物。一九八一年，我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曾编刊《南社丛谈》一书，其中有《南社丛刻》的内容及其它汇刊，详纪其事。

南社社员所著的几种单行本

南社人文汇集，民初的各种刊物，几乎成为南社的世界，南社社员的著述纷纷在上海刊行，无不风行一时。爰就记忆所及，略举几种于下：

许指严熟于掌故，其精心之作，当推《南巡秘记》一书。这书分正续二集，主要记述乾隆南游事，笔墨瑰丽喬皇，不可方物。他的自序，略谓："余幼即嗜异闻，逮事王父，老人爱孙，辄以一二故事为含饴，稍长读稗乘，有与所闻相发明者。满清一代，世方普颂圣德，此忌讳秘辛，存之区区父老之唇舌，不绝如缕，以为弥可宝贵，于是疏录而藏之，凡十余种。其间南巡一种，皆高宗巡游江浙时佚事，语或离奇怪诞。按南巡始于圣祖，其时三藩甫定，物力未充，帝意在觇察民情之向背，于铺张一节，颇事兢兢。及乾隆而繁滋既久，阎阁殷富，上心悦豫，游观之乐起焉。古语云：'逸则思淫，固无庸为帝王讳也。'"书中精采之处，如《水剧场》、《幻桃》、《一夜喇嘛塔》、《青芝岫》、《西湖画稿》、《无遮大会》、《烟花三月》、《盗玉马》、《黑牡丹诗》等，写来都有声有色。指严作品很多，尚有《泣路记》、《三海秘录》、《指严余墨》等，皆清代掌故。他逝世时，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指严死，掌故小说与之俱死。"

鹿城陈莲痕，撰有《顺治演义》、《康熙演义》，先后出版。他初拟依次写至清末，不料清室遗胄，提起控诉，只得辍止。他写的《京华春梦录》，内容分掌故、冶例、雅游、香奁、丽品、谐

趣、轶事、琐记八章、笔墨风华，为《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的余绪。初刊《世界小报》，后由竞智图书馆为之刊单行本。

《摩西词》，为常熟黄摩西著，中有《无着词》、《怀人馆词选》、《影事词选》、《小奢摩词选》、《庚子词选》、《集外词》，以和龚定庵词为最多，也有和张皋文的《茗柯词》，以及和蒋剑人的《芬陀利室词》。首列摩西小影，散髮髯髻，状很落拓。这书是南社词人黄忏庵见贻的，封面上有忏庵识语："顷读先生纪黄摩西词人事略，有庞檗子为之裒辑成集，未及付梨枣，而檗子亦殁，其遗稿不知流落何在云云，按摩西著述，散佚甚多，一时不易搜集。同人曾为校刊《摩西词》一卷，仅留残本，兹呈雅鉴，可与故友结一文字缘也。"

孙仲瑛熟于晚清小说掌故，著有《小说闲谈》一书，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等同具机杼。

《苏台柳》，贡少芹著，这书和他所著的《亡国恨》、《刀环梦》都属传奇体。少芹曾主《小说新报》笔政，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和他的儿子芹孙，有"贡家父子兵"之号。

《蜕翁诗文词集》，两厚册，陈叔柔著。叔柔，清季倡言革命，主持《苏报》，几濒于危。该集首附铜版图多幅，有遗像及所画梅花。内容分《映雪轩初稿》、《烟波吟舫诗存》、《寄舫偶存》、《息庵诗》、《闲情香草诗》、《夜梵集》、《蜕僧余稿》、《卷帘集》、《残宵梵诵》、《蜕词续稿》，大都是他身后由朋好为他搜集的。

包天笑为南社小说家，作品近百种。《海上蜃楼》，初登于《申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首冠一小序："人生不能无回忆，回忆前尘，几同幻梦，梦有欣有戚，至今思之，皆归惘惘。

余居海上二十年矣，过去之事，有同蜃楼之隐现。此书自初居海上始，记忆已往。先举前载《申报》之二十回付刊，后将续述也。”书中主人祖书城，实为做书人三字的谐音，那是夫子自道。此后他在《大众杂志》上撰《拈花记》，书中主人也是祖书城，且又是回忆性质，或许与《海上蜃楼》相连系。天笑晚年寓居香港，在港出版《钏影楼回忆录正续集》。他九十八岁高龄，还写成《衣食住行百年变迁》一书，及出版，他已不及目睹，因病逝世了。

范烟桥善状侠士须眉，著《孤掌惊鸣记》一书，由大东书局出版。还有《范烟桥小说集》、《中国小说史》，那时持志大学采为教材。

《倦云忆语》，程善之作，内容分《趋庭》、《坠欢》、《师友杂记》、《梦幻》五篇，笔墨很轻灵，有人比之为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柳亚子为题一诗：“《浮生六记》沈三白，后有作者程倦云。多谢胡郎能拂拭，人间始识此奇文。”所谓胡郎，指胡寄尘为该书的整辑者。此外有《骈枝余话》，那是一种笔记。又《小说丛刊》，都是短篇小说，包括《玉犀囊》、《健儿语》、《华鬘恨》、《吹箫女》、《懊侬》等篇。善之三十岁后，皈依禅悦，结束风华，守绮语戒，不再从事写作了。

长篇小说《葡萄劫》，陆秋心译，载《民立报》，历三年之久。后由民权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分上下二册，叙述希腊志士反抗土耳其的暴政，揭竿而起，进行革命，光复故土的故事，中间纬以儿女之情，尤为缠绵悱恻，为一时所传诵。他又有《秋心说集》，是汇集《刺虎盟鸳记》、《铁血红丝》、《蛛丝冤》、《兰因》四种而成。

王蕴农的许多小品，先后刊载于《新闻报》附刊，他的高足

沈痴云，为之搜罗剪存，由我为他付印，定书名为《云外朱楼集》，正编附编凡二册。封面赵子云题签，陶冷月画朱楼一角，缭绕烟云。他有一篇自序，略云："入《新闻报》，草笔记小文，借消长日，寒虫一鸣，候鸟三叹，掷笔遗忘，漫不省记。年来鬻书自给，目力强半耗于矮戕残墨之中，渭城罢唱，无复三五少年时豪兴。乃辱朋侪过爱，或辑存拙作，或怂恿付梓，小惭小好，弥增颜汗，逊谢未遑，主臣而已。甲戌夏，郑君逸梅过访，传中孚书局主人命，愿以拙作见于报端者，汇付铅椠。仆本僇民，比为学校事，丘山丛詈，何敢再以不祥文字，复贻世人以嗤笑，重违郑君等雅意，强颜存之，所谓知非文过也。"

诲虞姚民哀，擅柳敬亭技，落拓江湖，旁及稗史，摭所作短篇，为《民哀说集》。其它所写党会长篇小说，如《四海群龙传》、《箬帽山王》等，均由世界书局出版。又辑友好作品，刊《小说之霸王》一书，凡二册。

周瘦鹃所有的著作都标有"紫兰"二字，如《紫兰芽》、《紫兰小语》、《紫罗兰集》、《紫罗兰盦小品》。而生面别开的是，他一个人编了个小杂志，名《紫兰花片》，月出一小册，内容有小说、笔记、译作、谐谈，都出于他一人之手笔，共刊两年，计二十四册。他晚年从事园艺，著有《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弄影》等。一九八一年，有人为他汇刊《苏州游踪》、《花木丛中》二书。

南社社员的著作，实在太多了，刊成书的，有马君武的《马君武诗稿》，马叙伦的《我在六十岁以前》，易大厂的《大厂词稿》，王大觉的《咒红忆语》，王无生的《恨海鹃声谱》，王瀛洲的《断虹》，叶中泠的《中泠词卷》，叶小凤的《古戍寒笳记》，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朱鸳雏的《红蚕茧

集》，李叔同的《李庐印谱》，严工上的《唱歌集》，张冥飞的《十五度中秋》，陈柱尊的《玄玄阁诗钞》，陈巢南的《浩歌堂诗钞》，陈蝶仙的《栩园丛稿》，吕碧城的《信芳集》，宋痴萍的《如此江湖》，沈东讷的《三白桃传》，陆丹林的《当代人物志》，陆澹安的《小说辞语汇释》，周越然的《书书书》，林庚白的《孑楼随笔》，庞独笑的《红脂识小录》，姚石子的《金山卫佚史》，姚鹓雏的《燕蹴筝弦录》，胡石予的《缥缃史》，胡朴安的《中国学术史》，胡寄尘的《小说革命军》，柳亚子的《怀旧集》，闻野鹤的《野鹤零墨》，夏丏尊的《文心》，徐天啸的《天啸残墨》，高吹万的《吹万楼诗文集》，黄宾虹的《宾虹诗钞》，蒋箸超的《箸超丛刊》，赵赤羽的《海沙诗钞》，赵苕狂的《赵苕狂说集》，管际安的《昆剧一得》，潘兰史的《说剑堂集》等，简直难以尽记，挂一漏万而已。

关于苏曼殊的作品

南社诗僧苏曼殊，柳亚子很称许他，说他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奢豪爱客，肝胆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绘事精妙奇特，自创新宗，不依傍他人门户。零缣断楮，非食烟火人所能及，小诗凄艳绝伦，说部及寻常笔札，都无世俗尘土气，殆所谓卻扇一顾，倾城无色者欤！"苏曼殊的作品，的确不少。一九一八年，苏曼殊客死上海以后，许多朋友，纷纷搜罗他的遗著，刊印流传。如王德钟编辑，柳亚子印行的《燕子龛遗诗》，薄薄的一册，印数不多，那是非卖品，作为赠送留念的。沈尹默亲书他的诗篇，由张氏影光室印行，名为《曼殊上人诗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寄售，也早已绝版。《燕子龛诗》，冯秋雪编辑，雪堂诗社印行，见到的人也不多。《燕子龛残稿》，周瘦鹃辑，大东书局出版。《燕子山僧集》，段庵旋编辑，湘益出版社印行。《苏曼殊诗集》，柳无忌辑，北新书局寄售。《曼殊说集》，卢冀野辑。《曼殊逸著两种》，柳无忌辑。《曼殊上人妙墨册子》，李根源、蔡哲夫为之刊行。

汇刊他各方面的作品，搜罗较广的有周瘦鹃的《曼殊遗集》，精装一册，由大东书局印行，题签者王西神，瘦鹃有弁言一篇。又附柳亚子的《苏玄瑛传》、《苏玄瑛新传》，附铜版图数幅，有遗像、遗墨。内容分七部分：一诗、二译诗、三书札、四随笔、五序跋杂文、六小说、七附录。附录是友人纪念曼殊的小文，如姚鹓雏的《曼殊上人示寂十周纪念感旧诗》，周瘦鹃的

《曼殊忆语》、顾悼秋的《年华风柳》、沈尹默的《刘三来言子穀死矣》，刘半农的《悼曼殊》，又文公直辑《曼殊大师全集》，由教育书店发行，虽自称为最完备本，可是远不及柳亚子无忌父子两人所辑的《曼殊全集》。全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共五大册，一千九百余页。由搜集，而编纂，而抄写，而校对，历时两年有半，才得完成。第一册为诗集，译诗集、文集、书札集、较为庞杂。译诗且加入原文，以便对照。第二册为杂著集，有《燕子龛随笔》、《岭海幽光录》。翻译小说集，有《惨世界》、《娑罗海滨遁迹记》。第三册为小说集，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共六篇。第四、第五册全为附录，大都由亚子搜集到的。曼殊的诗文非常丰富，且插入铜版图很多，如曼殊僧装像，中装像、西装像、西湖墓塔、诗画手札墨迹、曼殊所居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病殁的广慈医院，以及与柳亚子、朱少屏、郑桐荪、刘申叔、何志剑、江彤侯等的摄影。此外又编刊了一大册《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也由北新书局发行。萧纫秋处，藏有曼殊的画稿二十四幅、杂记四十二页，以及照片、墨迹、戒牒、袈裟等等，由亚子向萧氏借来摄影制版，编成《曼殊遗迹》一册。以上三种，合成整套。

是不是所有曼殊的作品都搜罗无遗了呢？可以说遗漏尚多，如《无题诗三百首》、《曼殊画谱》、《泰西群芳谱》、《泰西群芳名义集》、《埃及古教考》、《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英译燕子笺》、《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沙昆多逻诗剧》、《文学因缘》，这许多都是有书名而没有发现的遗著。柳无忌曾一度征求，而没有征求到。

《曼殊全集》刊行后，广益书局又有《曼殊小丛书》出版，凡七册，为袖珍本，装一锦盒，时希圣编辑，《曼殊小说》三册，《曼

殊诗文》、《曼殊笔记》、《曼殊手札》、《曼殊轶事》各一册。其中资料，《曼殊全集》大都收入，但也有未曾收入的作品，如时孟邹的序文，且校出全集所刊《断鸿零雁记》第八十八页标点的错误，及文字的颠倒。全集原文为："其句度雅丽，迥非独逸、法兰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语"，改正为："其句度雅丽独逸，迥非法兰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语"，否则把"独逸"当作国名，那就成为笑话了。又有杨鸿烈的《对于断鸿零雁记》，罗建业的《对于'断鸿零雁记'的意见》二文，也没有收入全集。其它《曼殊轶事》一册中，有《民国日报》的《曼殊上人怛化记》，陈果夫《曼殊大师轶事》，程演生《曼殊轶事》，陆灵素《曼殊上人轶事》，张卓身《曼殊上人轶事》，以及陈去病《与柳亚子书》，《太平洋报》的《文艺消息》等涉及曼殊的内容，全集中也没有刊载。《苏绍琼轶事》所记载的苏绍琼，是曼殊的侄女，因蒙不白之冤，服毒自杀而死，年仅十余岁。能诗，有一诗赠其叔曼殊云："诗人，飘零的诗人！我！你的小侄女！仿佛见着你：穿着芒鞋，托着破钵，在樱花桥畔徘徊着。诗人，飘零的诗人！我又仿佛见着你：穿着袈裟，拿着诗卷，在孤山上吟哦着。寂寞的孤山呀，只有曼殊配作你的伴侣！一八，三，三，绍琼于神山。"全书也没有收入。

解放初，文芷从海外获得曼殊上人手写诗稿十页，装裱成册，发现有两首绝句，为各集所未载，的确是珍贵的佚诗，录之如下：第一首题为："久欲南归罗浮不果，因望不二山有感，聊书所忆，寄二兄广州，兼呈晦闻、哲夫、秋枚三公沪上"，诗云："寒禽衰草伴愁颜，驻马垂杨望雪山。远远孤飞天际鹤，云峰珠海几时还。"第二首题为："游不忍池示仲兄"，诗云："白妙轻罗薄几重，石栏桥畔小池东。胡姬善解离人意，笑指芙蕖寂寞

红。”又有与人唱和之作，各集刊中也未收入。这确是一个新发现。

黄鸣岐辑有《苏曼殊评传》一书，百新书局出版。内容分《曼殊的身世》、《曼殊的思想》、《曼殊的著作》、《曼殊的生前与死后》，不啻为曼殊所有的作品作一总结，一九四九年刊行，叶圣陶题签。

曼殊逝世，距今已逾半个世纪，施蛰存教授忽又重编《燕子龛诗》，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百花洲文库》之一，收集的诗，比任何本子为多，复加入诸家投赠的唱和、题画、哀悼诗一百六十八首，内容更为充实。原来蛰存也是曼殊诗的爱好者，所以有此雅兴。他的引言这样说：“苏曼殊是辛亥革命前后最为青年热爱的诗人。他是南社社员，他的诗大多发表在《南社丛刻》上，为数不多，但每一篇都有高度的情韵。当时我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的诗，我几乎每一首都能背诵。后来，年龄逐渐长大，浪漫气氛逐渐消失，对诗歌的爱好，逐渐转变方向，苏曼殊的诗也逐渐被遗忘了。但是，一直到三十年代，苏曼殊的诗始终为青年人所热爱，当时曾印行了好几种版本的苏曼殊诗，甚至有了苏曼殊的全集。从抗日战争开始至今四十年间，没有印行过苏曼殊的诗，旧有的印本，也大都毁失，很少流传。于是，苏曼殊也被现代青年人遗忘了。一九七二年，我在很孤寂无聊的时候，忽然得到一本柳亚子印的《燕子龛遗诗》，重读一遍，好像遇到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竟使得我恢复了青春。于是开始搜觅并抄录集外的诗，编为一卷，又从其它文献中汇抄了当时许多诗人所作的有关曼殊的诗，也编为一卷，作为附录，标题仍为《燕子龛诗》。……”并有一跋，节录一段如下：“近日又有友人抄示海外所传曼殊本事诗十章，

并陈仲甫和作，曼殊诗下自注暨仲甫诗，皆未尝有刊本，复有章孤桐、包天笑题《曼殊遗墨册》诗二十五首，并有自注，述曼殊遗事，亦未尝为世人所知。……”这里所说的友人，指的便是我，我是从香港《大公报》附刊《艺林》抄给蛰存的。

记神州国光社的代表性出版物

上海神州国光社，最初是由邓秋枚和黄宾虹所组织的，它所刊行的大都是历代书画、碑帖、金石、印谱一类的书。据俞巴林的《关于神州国光社的情况》一文称：神州国光社"用珂罗版出版了二百多种，在美术界有一定的贡献。"它的代表刊物有《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美术丛书》。那《美术丛书》，尤为巨制，先后共印四版，初为线装本，经增订后改为精装本二十册，配一木箱，颇为美观。内容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各十辑。以书画为主，间有谈印刻、装璜、琉璃、鼎彝、陶瓷、杖扇、游具、茶荈、琴剑、锦绣、笺纸、文房四宝等，颇多是传抄而无刻本，或前人脱稿而未流行的，搜罗确很宏博。

一九二八年，神州国光社以四万元的代价让给陈铭枢，改出社会科学新书，发刊《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铁甲列车》，又出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四大册。该社当时较有代表性的出版物，要推《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了。这套丛书收集明清史料，后来改为《中国逸史丛书》。初版刊印，首冠蔡元培的总序，叙述该丛书的搜辑情况，兹录之如下：

"自中华民国成立，民族主义，已渐普及，凡清代所指目为违碍之书，转为有志者所偏嗜。程演生先生有鉴于是，乃与诸同志组织中国历史研究社，所研究之范围，固甚广泛，而首先注意者，则为蕴蕴已久之书，多方搜辑，已得三百余种，乃编为《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而印行之。主持印务者，仍为神州

国光社，衣钵相嬗，良非偶然。方今学者，处国难严重之期，切于民族自决之望，得是书以增其刺激，其于中国之将来，必大有影响无疑也。”

丛书出版十五册，有《庚子国变记》、《三朝野记》、《扬州十日记》、《东行三录》、《避戎夜话》、《信及录》、《东林始末》、《东南纪事》、《明武宗外记》、《崇祯长编》、《甲申传信录》、《倭变事略》、《烈皇小识》、《客滇述》、《奉使俄罗斯日记》，大都从秘本中来，确是非常珍贵的。实则每册中即包罗十多种作品，以《客滇述》一册而言，便有高斗枢的《守郧纪略》，边大绶的《虎口馀生记》，白愚的《汴围湿襟录》，顾山贞的《客滇述》，佚名的《思文大纪》和《平回纪略》，南园啸客的《平吴事略》，康范生的《仿指南录》，江之春的《安龙纪事》，徐如珂的《攻渝纪事》，文震孟的《定蜀纪》，虞山遗民的《平蜀纪事》等，依此类推，则十五册丛书，所收作品便有数百种了。

该书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在那时来讲，编者的批判和思想分析，是比较独特的，如《客滇述》的序文，批判了边大绶的颠倒历史因果，而说明末的流寇，只是当时的乱象，而不是乱源。乱源乃是那时的统治者——新地主阶层之无情的剥削与残酷的压迫，而边氏偏说闯不生，天下不乱；闯不死，天下不平。我们应该牢记着，边氏这种说法，不止是他的社会分析的错误，并且是那上层社会的利害冲突的成见，限制了他的鉴空衡平的良心。因为没有明朝地主阶层将近三百年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则农民不会穷而无告，四野兴嗟，人心思乱，李自成、张献忠的反叛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能象那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竟然颠覆了明朝的政权。又说：凡历史上的农民叛乱队伍之屠杀，大都是政府军队和统治阶层的压迫激成的。李

自成和张献忠的屠杀正是如此。并且从这些史料中，更显出当时统治者的屠杀手段比之张献忠还要残酷，还要厉害。编者这样的说法，在当时的确是高出于那些庸碌懦怯的一般操笔政者。

天主教学校的教科书与邹翰飞之死

上海天主教司铎，创办了好几所男子和女子中学，其中徐汇公学办得最早，这时尚在前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马相伯就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后来又办了徐汇女中、启明女中，都在上海徐家汇一带。沪南也办了好几所。当时这些学校都是用法文课本，惟有国文用中国课本，如四书五经之类。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文教科书，天主教主持学校的司铎们开了个会议，讨论是否采用国文教科书来代替四书五经，结果大家一致赞成用国文教科书，但认为商务印书馆能编辑一套，我们也可以编辑一套。于是决计自行编著，规定凡天主教系统的各中学统一采用，卖书的利润大家分摊。后来，就请无锡名士邹翰飞担任编辑，着手编写教科书。

邹翰飞擅长词章，江建霞太史很赏识他，著有《三借庐集》。他喜欢饮酒，所以自署"梁溪酒丐"。他很早就在上海担任报馆编辑。后来受聘于徐家汇启明女子中学，教高级班国文。校方要他编国文教科书一全套，他乐于从事，且每课加以评注。编成了，用铅字排印，有光纸本，封面是蓝色的，式样和《南社丛刻》差不多，采用者认为选材非常精当。实则这种课本，和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国文教科书，没有多大区别，无非取材于《论语》、《孟子》及史汉文章，把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心，增加一些篇幅而已。

这时高太痴、王紫铨、陆野衲辈组织希社，邹翰飞也加入

希社。他诗酒留连，兴致很高。有一年，希社词翁舒问梅七十寿辰，大家去庆祝。舒问梅在苏州为抱关吏，侨寓葑门。翰飞和问梅不但同社，而且又通谱为异姓兄弟，当然非去不可。他乘早班火车到苏州，再雇人力车前往，不料拉到中途，因路途高低不平，车一倾侧，顿时翻倒，伤了胫骨，疼极不堪。问梅知道了，连忙把他送入医院，给他医治。经过相当时期的治疗，创伤虽愈，然足跛不便行动。但为了生活，不得不返回启明女中销假，岂知外国校长刻薄得很，认为他已经残废无用，拒绝继续聘用。他没有办法，想到为校方所编的教科书，当时未取丝毫报酬，现在解职了，请校方酌给一些编辑费，校方却以"事早过去，毋庸重提"为辞，给予拒绝。他对于这事，非常气愤，因此影响身体健康，真所谓贫病交迫，结果返回无锡，把他的寓所标着"待死楼"，不久也就逝世。舒问梅的《问梅山馆诗集》中，有《翻车行》一首古风，就是记翰飞的不幸遭遇。

推销革命禁书的徐敬吾

徐敬吾，广东香山人，流寓上海。他思想比较进步，在前清末年，大家都穿长袍短褂，背后拖着大辫子，他却早已剪发易服。他初服务于棋盘街鸿文石印书局，后在福州路中市青莲阁茶馆底下开一小书铺，不雇伙计。他的女儿名宝妣，作男子打扮，帮他父亲做生意。他的书铺所贩卖的大多是革命禁书，如《自由血》、《女界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苏报案纪事》、《革命军》、《孙逸仙》、《三十三年落花梦》、《黄帝魂》、《二十世纪大舞台》、《猛回头》、《驳康有为政见书》、《俄罗斯大风潮》、《孔孟心肝》、《沈荩》、《江苏杂志》、《浙江潮》和留日学生发行的《民报》，以及他自己写的《革命问答》等。他为了推销禁书，有时巧妙地把禁书混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秋水轩尺牍》、《阅微草堂笔记》中，到各家茶馆中暗地出售。这许多书，大都出于章太炎、金松岑、邹容、陈巢南、马君武、陈天华、黄中黄一班人的手笔。这班人常往来于爱国公学，徐敬吾当时兼任爱国公学庶务，与他们声气相通，因而得到了这种禁书。由于当时福州路青莲阁茶馆附近为下等妓女丛集之处，徐敬吾恰巧在那里开设书铺，所以被某小报戏称为"野鸡大王"。人们对此称惯了，忘掉了他的真姓名，但"野鸡大王"却个个知道。徐敬吾也就乐得借此掩护，以推销禁书。

有一年，清政府为慈禧太后庆寿，强令全国挂灯结彩，并悬挂"万寿无疆"的横幅。徐敬吾也故意凑热闹，在他的小书

铺门前挂着红布条儿，他把“万寿无疆”改动了一个字，成为“万寿失疆”，再加两条标语：“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逢到星期天，一般知识分子喜欢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味莼园（俗称张家花园）的茶厅安凯第喝茶谈天，往往挤得座无虚席。徐敬吾就乘此机会到那里推销革命书籍。有一回，他竟站在人丛中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听者为之动容。结果触犯了统治阶级，把他骗到南京，监禁起来，想办他重罪。但某官僚却认为他取名怪诞，恐有精神病，而把他释放了。他为了留个纪念，特地拍了两张照片，一是反手被绑，一是镣铐加身，配了镜框张挂着。

《海上繁华梦》揭发骗局

《海上繁华梦》是一部很负盛名的谴责小说，出于孙玉声手笔。玉声别号海上漱石生。当时他写小说不用真名实姓，而署名"警梦痴仙"，大约书中写的大多是真实事情，难免有所忌讳吧！

孙玉声是老上海，懂得旧社会的种种情形，记忆力又好，他把上海所有的风俗习尚、遗闻轶事，写成《沪壖话旧录》，在《金钢钻报》上排日登载，连续有两年之久。倘汇集起来，确是很好的上海参考资料。他写的小说很多，以《海上繁华梦》篇幅为最长。凡妓院的黑幕，赌场的弊害，都被一一的揭发出来。由于是他的亲身经历，所以越发生动真切。

他少年时交游不慎，和一班赌棍相识，时常作雀战；他逢赌必输，赌牌九输得更多。后来赌棍中一个叫周四的，因其它案件被人告发，他才知自己上当受骗，便拟附诉控追。周四托人竭力调解，愿还洋五百元了事。这时他正在写《海上繁华梦》，需要揭发赌场弊害，姑且允许周四，嘱其把"黄牌九"的种种作伪方法，以及手术切口，尽情倾吐。周四倾筐倒箧一一讲了，他就把这些谈话资料写入书中。至于妓院的黑幕，他也十分熟悉，一切忌讳，一切规例，外间无从知道的，他都知道。所以他曾告诉人说："我手挥万金，作为这书的代价，和它书截然不同"。《海上繁华梦》共三集，初集三十回，二集又三十回，三集四十回，成书在我佛山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前，和

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同时撰写。但《海上花列传》的销数远不及《海上繁华梦》。

继《海上繁华梦》之后，孙玉声又写了一本《续海上繁华梦》，一九一五年由民权出版社刊行，分三集出版。这书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海上繁华梦》先后都一百回，成于光绪戊戌、己亥年间（公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初为一时游戏之作。乃出版后，颇蒙阅者青睐，谓全书不特起迄一线，且摹写社会上交际一切，凡人心之狡险，世态之炎凉，荡子之痴迷，妓女之诈骗，类皆深入浅出，足使阅者增无限阅历，发无限感触，启无限觉悟，实为有功世道之书。以是遐迩风行，著者文字因缘，不知几生修到，诚非意料所及。惟是流光弹指，迄今倏已十年，风气微有不同，景物因之亦异，而此十年来，社会上尽多可诧、可惊、可笑、可怜、可愤、可悲、可讽、可嘲之事，为前所未及。痴仙不揣谫陋，因又戏拟续集百回"。据作者见告，这《续海上繁华梦》，是由文明书局排印的，不意印刷所的近邻不慎起火，印刷所致遭殃及，该稿已排的制成纸版，没有排的，原稿具在，当时由手民于烈焰中抢出，但正在发排的五回抢救不及，成为灰烬。由于作者没有底本，未留一字，该局主持者沈骏声立奉笔资百元，请他补写。他索回全书，审阅一过，然后下笔，融会前后意思，贯通起讫线索，很费一番周折，尽半个月之力，终于补成，尚喜没有斧凿痕，初版于一九一六年二月刊行，至五月间即已再版，足见其销路之广。

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脍炙人口，是吴趼人手撰。和《孽海花》、《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为清季四大小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评论它说："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锺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

吴趼人和李怀霜交谊颇深，他死后，怀霜在《天铎报》上给他作《吴趼人传》，评述他的生平很是详细，说他"本为一救世思想者，历遭打击，终至厌世，小说遂呈伤感思想，盖非偶然"。魏绍昌曾到上海市宝山县大场广肇山庄（十年内乱中被毁无存），亲访吴氏坟墓，摄了影片，又搜罗了许多有关吴氏的纪录，辑成《吴趼人研究资料》一书，把《怪现状》一书的先后版本，也历述一下，略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〇八回，标社会小说，署我佛山人撰，原载《新小说》，仅四十五回，广智书局为出单行本，分八册。直至宣统年间，始出一百〇八回本。此后翻印本，有新小说社石印本四册，世界书局本四册，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二册。"

吴趼人还撰写了《近十年之怪现状》，一名《最近社会龌龊史》，由《时务报》馆印行，但印数不多，且仅二十回，没有完篇，阿英把它收入"晚清文学丛钞"中，以广流传。

包天笑和吴趼人时相往还，据天笑告诉我说："趼人原名

沃尧，他的父亲字允吉，因字小允，趼人是他的号，亦作茧人。广东南海人，先世居佛山镇，故他所做的小说，常把'我佛山人'作为笔名。不知道的，往往把'我'、'佛'两字连读，实则'我'字之下应加逗点，佛山人三字可连读。"这好比小说家陈栩园的别署天虚我生，天字当加逗点，虚我生三字可连读，同一机杼。吴趼人岸然道貌，虽生长粤中，因在上海住得久了，便能操沪语。他在所居的门上，标着茧闇二字的梅红纸幅，他所作的诗集，封面上草书《茧闇诗草》。茧字的繁体为繭，看来好象兰闺诗钞，令人误认为出于女子手笔。后来他迁居，门上榜着趼廛二字，作八分体，一个过路的人见了笑道："上海的行业真太多了，还有代人研墨为生的。"原来此人识字不多，把"趼廛"误为"研墨"了。一天，天笑曾经问他："您老人家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里来这许多资料？所谓目睹，是否都是亲眼看到？"他一笑，便在箧中翻出手抄册子给天笑看，说："这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蓝本。"册子中所写的，大都是朋友叙谈时所述及的，也有从笔记中抄录下来的，也剪裁了报纸所载的文章，日积月累，便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不觉成为若干册。资料具备了，可是贯串演衍，却很费心思呢。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世界书局翻印了，销路很好，沈知方动了脑筋，请吴虞公其人撰《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居然胡乱凑成数万言，印行问世。实则吴虞公执笔的时候，年龄尚未超过二十岁。

这里还得补一句，吴氏对于近代说部，最推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他所作大都得《外史》的神髓。所以清末民初写社会小说的，几乎成为《外史》型，无非出于他的倡导。

《官场现形记》颇多真人真事

解放以后，出版界对清末谴责小说加以选辑，久已绝版的有好多种重印了。这也包括了李伯元的有价值的作品。李伯元，江苏常州人，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一八六七年四月十八日生于山东。三岁父死，由其堂伯父李念之（曾任济南知府）抚养成人。一八九二年，念之自山东辞官，伯元也随之回乡，卜居常州青果巷。一八九六年，伯元在上海创办《指南报》，继办《游戏报》，他自己的作品，常以游戏笔名发表，后改办《繁华报》。一九〇三年受商务印书馆的聘请，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这个半月刊载有署名讴歌变俗人的《醒世缘弹词》，宣传破除迷信，反对缠足和吸雅片等恶习，也是出于伯元的手笔。

伯元的名著，有《文明小史》，它反映了清朝末年，在维新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旧中国的形形色色，讽刺了封建头脑的知识分子对于文明的误解，揭发了外国传教士的横行霸道，更痛斥了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暴压迫的统治阶级。所以有人这样评价李伯元："他的描写，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冲突与转变"。他还写了《活地狱》，但写至三十九回即病卒。由吴趼人续两回，欧阳巨源续一回，共四十二回。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二十回，描写青楼生活，揭发特殊悲惨的社会阴影。《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完全写实。这时陕西臬司冯仲梓，于赵舒翘赐死事，亲睹赵宛转难死之状，后冯看到了这部弹词记着赵事，也深赞他描写的真实。有《中国

现在记》十二回，没有写完。他的作品，最受读者欢迎的，要算那六十回的《官场现形记》了。该书对封建官僚的昏庸、卑鄙、贪污、残酷，痛加谴责，把他们比为仇人、强盗、畜生，笔触是很尖锐而辛辣的。他所写的多为实事，如第三十八回的《丫姑爷乘龙充快婿》，是影射湖北协统张彪。第四十三回的《八座荒唐起居无节》，那是指张之洞而言。四十四回中提到的太监黑大叔，指的就是李莲英。若细心阅读，更能发掘出许多真人真事来。

伯元和楚园主人刘聚卿（公鲁的父亲）是老朋友，两人常通书札，有一札致聚卿，说到《官场现形记》，确是小说考证的大好资料。札中这样说："拙著《官场现形记》，随手拈来，绝无成见，不料督幕赵君（疑即书中的西席周大爷或赵大架子），竟因此辞馆，殊出意外。刻三编已付排印，约七月中旬出版，当将赵君原书，附刊书后，以代表白。洁身远嫌，弟转深佩其人。此书第一、二编，皆承公代售若干部，三编既有此嫌，不敢复托。我辈文字交无所不可，官场疑忌最多，不能不为我公计耳。兹将历年所积谈丛，时事嬉谈、滑稽新语等稍加编辑，得书二十本，拟改版精印二千部，竟非千金不办，平昔文字交已得数百金，颇望公为筹两三数，能借我毛诗（按即三百元）尤感。九月出版，后一月，即可归楚。此举颇觉冒昧，知公提倡风雅，或不致绝我也。"又一札："拙著《官场现形记》初编续编各一部，祈赐教为幸。另初续编各十五部，《夺嫡奇冤》十册，寄存尊处，倘同人中有欲购阅者，便乞销去。琐事奉渎，不安之至。"

李伯元在上海先后共十年，所著除小说外，尚有《南亭笔记》、《南亭四话》（即诗话、词话、联话、曲话）、《芋香室印存》、

《艺苑丛话》、《尘海妙品》、《奇书快睹》等。他写《官场现形记》时，住在南京路附近的劳合路（今六合路），那里当时是雉妓丛集的大本营，他在大门上贴着一副梅红笺的春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上一句可见他的满腹牢骚，下一句却又风趣得很，这位老人的心情，不难在这一联中体会出来。他能刻印，又能绘画，但不多见。

伯元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三月十四日逝世。有署名白眼的写了八回《后官场现形记》，原载《月月小说》，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群学社印行单行本，是继《官场现形记》第五编而写的。笔墨也相当的辛辣。（按白眼，乃杭州许伏民的化名，又署冷泉亭长，他主编《月月小说》。）

魏绍昌于一九六六年春，特地赴常州市郊茶山公社群力大队李家村，吊李伯元夫妇墓，摄了远景近景二帧照片（该墓在十年内乱中被毁无存）。又搜罗了李伯元像、手迹，《游戏报》、《繁华报》的报影，《官场现形记》的插图，以及其它有关文字，辑成《李伯元研究资料》一厚册。更稀见的，有李伯元所绘的梅花绶带鸟图，和李伯元的《芋香室印存》的拓片，都制了铜锌版印入。一九八〇年，增加内容，再行出版。

《庚子国变弹词》的资料从何而来

李伯元的长篇弹词，凡两种，一是《醒世缘弹词》，二是《庚子国变弹词》，后者尤胜于前者。

《庚子国变弹词》共四十回，写于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间。最初在《繁华报》上逐期发表。全书比较完整地反映庚子事变的过程，情节生动，语言通俗精炼，它突破了历来弹词只写才子佳人的框子，成为第一部表现政治事件的弹词。在李伯元的改良派立场来看问题，当然把义和团称为"拳匪"，维护统治集团的清政府。但也揭露了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奸淫掠夺，清廷官员的腐败怯懦，同时反映了人民的英勇抵抗，自有它的历史价值。

《庚子国变弹词》，共四十回，所以作者有诗："眼前无限兴亡感，付与盲词四十篇。"载《繁华报》。一九〇二年由《繁华报》馆印行线装巾箱本六册。伯元逝世后，书商盗印，书名改为《绘图秘本小说义和团》，石印大本两册，只收前二十回，将原书所载序文、例言、题词一概删去，伪造潭溪生一序。这书不全，流传不广。一九三五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阿英编校的袖珍本一册，首载阿英《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序》，书末附印《辛丑条约》全文，这是从《杭州白话报》所刊的《救劫传》里转录的。后又收入阿英编的《庚子事变文学集》，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出版。书的内容，始于清平县武举与教民的冲突，官吏左袒教民，酿成武举复仇，率五百弟子，杀死两教民全家起，终于

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辛丑条约》完成，两宫返跸，旁及中俄战争，黑省沦亡的全部战争经过。

《庚子国变弹词》的资料，是从那里来的呢？原来李伯元是常州世代簪缨的巨家。他的父亲在北京做京官，他的哥哥宝章，是一位孝廉公，官直隶候补道。当义和团起事，延及直隶（今河北省）、山东、山西各省，帝国主义者组织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圆明园，任意抢掠，杀戮人民，顿使京津一带，成为恐怖之窟，灾害之区。那时，李伯元的父亲年已七十二岁，和他的哥哥宝章惊惶失措，便放弃了许多财物，只携了一个仆人逃难。奈社会秩序已乱，雇不到车辆，只能徒步而行，昼行夜宿，走了数百里，非常狼狈，好不容易到了山东贯市，那儿有一镖局，镖师某看到李父衰羸疲惫，动了恻隐之心，为他主仆三人备了一辆骡车，才得喘一口气。一路上目睹颠沛流离的情状，家破人亡的惨事，为之心伤不已。而所经过的官署，都空空如也，负责的官员逃之夭夭，仅有怀来县的知县吴永（渔川）却留守着，主仆三人就在县署内暂时借宿，不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也在该署内驻跸。这时王文韶中堂听到两宫出狩，便挟着重要印信，徒步追访，直追了三天三夜，才到怀来县，抵署天已昏晚，拟明晨叩见两宫，可是县署屋舍狭隘，所有上房及办公地方，满坑满谷都住了人，文韶中堂一到，两宫那有不知之理，于是立即召见。慈禧站在上房的庭除间，向文韶垂泪说："深悔当时没有听信卿言，以致肇成巨祸。"原来"义和团"事起，文韶很反对，曾密折上奏，又听到徐用仪、许景澄、袁爽秋以反对义和团行将正法，他更急迫地营救，触忤慈禧，慈禧大怒，也拟把文韶严行惩办，被军机大臣荣禄知道了，荣禄和王文韶私交很厚，便竭力在慈禧面前为之缓颊，文韶才得以保全，所以慈

禧所云，并非无端之言。宝章父子在怀来县署，和文韶朝夕相见，当时朝野情况，宝章父子也就耳熟能详，可是伯元幼遭父丧，宝章也早卒，那庚子国变，伯元当然也听得一些，但不够详尽。那资料主要是从王文韶那儿辗转得来的。

谈到这个线索，就不得不提到上海文史馆馆员姚寒秀（桐生）老先生，他是王文韶的孙婿，文韶的儿子国桢，字稚揆，官太常寺卿，寒秀老人平素留心掌故，而在岳家所得更多，尤其庚子故事，印象很深。李伯元和寒秀老人一见如故，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伯元办《繁华报》，写小说缺乏资料，老人就把庚子国变掌故，原原本本的贡献给他。伯元脑中本来有些底子，经老人一讲，他就把资料贯串起来，写成了这部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庚子国变弹词》。

同时，李伯元和沈卫（淇泉）太史也很相契。沈卫在前清时官陕西学台和甘肃主考，与荣禄也有私交，他们时常谈到庚子国变事。所以沈卫一谈起它，就历历如数家珍。伯元写弹词，有些地方也请沈卫补述，因此内容就更充实了。

《小说林》和《孽海花》

一九〇三年起，小说杂志的出版有如雨后春笋，如《绣像小说》、《新新小说》、《二十世纪大舞台》、《雁来红丛报》、《小说七日报》、《游戏世界》、《月月小说》、《著作林》等。直至一九〇七年，《小说林》尤为异军苍头，大有后来居上之概，共出十二期，徐念慈任主编、黄摩西撰《小说小话》，当时征求短篇小说，包公毅写《三勇士》应征，内容是父亲对三个儿子的训话，有一首诗"白发无能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结果评选为第一名，奖品为一新式时计。这一年，秋瑾因反清被害，该刊物上登载《秋女士瑾遗稿》，凡二十多篇。徐寄尘为撰《秋女士历史》、《秋女士逸事》。啸庐作《轩亭秋传奇》，龙禅居士有《碧血碑杂剧》，吴癯安有《轩亭秋杂剧》等。译稿较多，有东海觉我的《新舞台》，陈鸿璧的《第一百十三案》，张瑛的《黑蛇奇谈》。东亚病夫曾孟朴是该刊的主人，也译了嚣俄的《马哥王后佚史》。最负盛名的是《孽海花》说部，最初登于日本留学生所办的《江苏杂志》上，后来在《小说林》刊登，再由《小说林》出单行本。

据包公毅见告：曾孟朴由常熟来到上海办《小说林》出版社。曾住居楼上，楼下为排字房及印刷所。但曾名士气很重，不善理财，不谙营业，他从未踏进排字房、印刷所去看看，也不过问发行会计上的事。《小说林》亏了本，他就到常熟家里去取款，但家中财产由他的母亲掌握，母亲恐他办《小说林》把家

产搞光，不肯给他大批的钱，《小说林》没有经济上的接济，也就办不下去，只好关门。当时有人走进他们的排字房去看看，旧铅字就堆满了一屋子。原来印过书后，都倒在屋角里了。

《小说林》出版的曾孟朴的《孽海花》，鲁迅先生称它为晚清四种主要谴责小说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稿》说它："不论思想内容，或是艺术价值，都要超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首先，小说以主要力量对上层封建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卑躬屈膝的卑劣行为，作了有力的暴露和尖锐的批判。"对它评价是较高的。该书最初出版于一九〇五年春，为二十回本，平装两册。封面上标明历史小说，题签是亚兰女史。到一九二八年，归真美善书店出版，封面为一自由神，已成为三册了。此后翻印了几次，解放后重印，加入了《人物索引表》。

《孽海花》的最初创作者，实则是化名爱自由者的金松岑。金松岑对他的弟子范烟桥谈到他写该书的经过说："这书是我为江苏留日学生所编的《江苏》而作。当时各省留日学生差不多都有刊物，如浙江留日学生就刊《浙江潮》，江苏留日学生就刊《江苏》，而《江苏》需要我的作品，是论著和小说。我以中国方注意于俄罗斯的外交，各地有对俄同志会的组织，因此把使俄的洪文卿作为主角，以赛金花为配角，都有时代背景，不是随意拉凑的。我写了六回便停止了。常熟丁芝孙、徐念慈、曾孟朴创《小说林》书社，和我商量，我就请曾续下去，第一、第二两回原文保存的较多，所预定的六十回目，那是我与曾共同酌定的。"

魏绍昌辑《孽海花资料》一书，曾见《孽海花》的底稿，在第一册的前面几页中，附有曾孟朴手拟的一份人物名单。分旧

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共列一百十人，并用括号注明书中的化名。其中有章太炎、邹容，蔡元培、乌目山僧、哈同、罗迦陵、白浪滔天、吴敬恒等，但这许多人却没有写进去，因曾孟朴没有把《孽海花》写完，故事叙述到甲午战争后便骤然而止了。后来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也只写到缔结辛丑和约就告结束。可是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作者当初是打算写到戊戌变法及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的，而且还将出现白浪滔天、哈同等人。

林琴南很推崇《孽海花》，在他所译的《红礁画桨录》的《译余剩语》中说："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而自为小说者特鲜。纾日困于教务，无暇博览，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这时林琴南尚不知《孽海花》作者是谁。后来曾孟朴在《孽海花》修改本卷首写了一篇序，写了如下一段话："非小说也一语，意在极力推许，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囚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绝的天才，是我一向倾服的，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吃亏也就在此。其实我这书的成功，称它做小说，还有些自惭形秽呢！他说到这书的内容，也只提出了鼓荡民气和描写名士狂态两点，这两点，在这书里固然曾注意到，然不过附带的意义，并不是它的主干。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这书写政

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写雅叙园，含英社、谈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全书叙写的精神里，都自勉的含着这两种意义。我的才力太不够，能否达到这个目的，我也不敢自诩，只好待读者的评判了。”

《孽海花》作者曾孟朴不但把金松岑的原文大事改削，即使他自己所写的，也是常常修改。据说其原因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内在的，是他自己看得不惬意，非改不可；外在的，常有人迫使他不得不改。譬如书中的钱唐卿，就是他的岳父汪柳门，有些材料便从汪处得来，甚至涉及汪的同僚，同僚看了不高兴，未免向汪啧有烦言，汪不得已，只好嘱孟朴掉转笔头，改变写法。当初《孽海花》是先拟回目，然后按步就班的写下去，回目中，有“传电信留辫费千金”，那是记述端方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挥霍无度，钱用完了，向老子要，端方不肯给他，他就写信给父亲说：“再不寄钱接济，就要把辫子剪掉了”，这一下吓坏了端方，连忙汇钱去。端方和曾孟朴的父亲君表交谊很深，见了这个回目，便找孟朴谈话，一方面称赞他《孽海花》写得精采，一方面对他提出意见，并且说：“老世侄！不要把我们老一辈人开玩笑啊！”端方更玩其政治手腕，要请他作幕宾，又要送他干薪俸。这样一来，曾孟朴就不好意思这样写，所以现在的通行本，没有这个回目和故事了。

《孽海花》曾孟朴前成二十四回，后续十一回，共三十五回，合印本三十回。书还没有写完，可是他精力不济，懒于续写了。有一次他晤见老友张鸿，张鸿颇以该书没有结束为憾，请他续下去。曾孟朴却怆然手拈须髯叹道：“你看我身体精神，

还能够续下去么？我的病相续不断，加以心境不佳，烦恼日积，那里有心想做下去呢！我看你年纪虽比我稍大，精神却比我好得多。《孽海花》的宗旨，在记述清末民初的轶史，你的见闻，与我相等，那时候许多局中的人，你也大半熟悉，现在能续此书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虽是小说，将来可以矫正许多传闻异辞的"。张鸿却答道："我哪里有你的华美的文笔，哪里有你的熟练的技术！这是万万不敢的。"当时一笑而罢。后来曾孟朴逝世，朋好一致怂恿张鸿续下去，曾孟朴的书至三十回止，张就从三十一回续起，回目是"送丧车神龙惊破壁，开赈会彩凤悔随鸦"，至六十回"克林德恤典建牌坊，赛金花妙语结和局"止，结束处这样说："庚子以后时局，及赛金花身世结局，只好待后人再续的了。"也是不了而了的。

曾孟朴生前，已有陆士谔的续本，当然没有得到曾氏的同意，续本出版了，给曾氏知道，大不赞成，向法院控诉，陆以所续由陆士谔具名，并未冒用曾孟朴之名，故不认咎，但陆的续本销数不多，影响也不大。

张鸿初名澂，字师曾，别署隐南，晚年自称燕谷老人，《续孽海花》即以燕谷老人署名。他是江苏常熟人，生于一八六七年，卒于一九四一年，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与李文田、文廷式、曾孟朴经常往来，所以曾孟朴之所见所闻，张鸿也很熟悉。这部《续孽海花》，最早是抗战期间在北平《中和月刊》上连载的。张鸿死后，《中和月刊》编辑人瞿兑之校订了原稿，于一九四三年冬，由上海真美善书店刊行单行本。距今已近四十年，原本已不易看到。我友吴德铎却获得了这书，残破不堪，约我一同做校订工作。我又搜得有关文献加以考证，和张鸿的照相及亲笔手迹，提供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出版问世。

王韬的《蘅华馆日记》手稿

报界前辈王韬，字仲弢，号紫铨，江苏长洲人（今苏州市）。他流寓香港时，曾办《循环日报》，别署天南遁叟。英国人理雅谷慕他的大名，请他到伦敦翻译中国经书，他又署欧西经师。后游日本，和日本名士竹添、渐卿、重野、成斋、黾谷、省轩、冈鹿门等唱和，有日东诗祖之称。他在上海住的时间很长，曾主讲格致书院（格致中学的前身），又任《申报》馆编辑，署名淞北逸民。他的一纸名片，东南西北，四者兼全，是非常有趣的。

他的著作很多，有《洪杨纪事》、《遁窟谰言》、《普法战纪》、《瓮牖余谈》、《弢园文集》、《蘅华馆诗录》、《瀛壖杂志》、《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后面三种反映本地风光的书，是他寓居上海时写的。中国旅行社刊行的《上海导游》一书，不少内容系采自王韬的《漫录》和《琐话》。五十年前，陆澹安在沪南旧书摊上买得一抄本，标题《蘅华馆日记》，没有署名，却钤着紫铨王韬的图章，知道是王韬日记的手稿，澹安把它珍藏起来。这时施济群办《新声杂志》，正需要文艺名作，便向澹安索去，逐期登载在杂志上。澹安当时很忙，没有时间录一副本，济群也没有抄录，便把手稿交给印刷所，不料排印该杂志的印刷所突遭火灾，手稿完全烧掉，这种损失是无可抵偿的了。

我友陈左高，他对于名人日记文献，有若干年的研究和搜采，其中颇多孤本和未刊的手稿本。他看到我写过一篇《王韬蘅华馆日记手稿本的被毁》，特地来访，告诉我《蘅华馆日记》

手稿本不仅一册，尚有未毁的至今保存着。他给我看了一部分，那是咸丰八年冬到十年夏的日记。我欣喜得很，仔细阅了一遍，特摘录数则在这儿：

“十二月三日甲辰，天晴而颇有寒意。薄暮，孙次公来，泊舟洋泾桥畔，特来告别。乃同小异、壬叔，往黄公炉侧小饮三爵”。“夜，小异饭于余舍，村酿甚甘，堪以御冷”。“六日丁未，清晨入城，遇阎斋于途，约作消寒会。偶过酒炉，见有蛤蜊甚巨，因酤酒独酌。午后，小异、吉父、春甫俱集，同阎斋登鸿顺楼大嚼，酒倾数壶。顷之，壬叔亦来，洗盏更酌，酒兴勃发。”“二十日壬戌，雨。天极寒冷，因命价酤酒至，聊以浇愁。”由此可知王韬有酒癖，在抑郁牢愁中，借此遣闷。

从他日记中，又得悉他的朋从交往。他和宝山诗人蒋剑人过从很密。剑人的妹妹是削发为尼的，如云：“饭罢，着屐入城，往竹林禅院，访蒋剑人不值，晤其妹昙隐大师，坐谈片时，即别。闻是庵为昙隐出己资建造，以作清修习静之所。昙隐本系俗家，嫁夫早卒，薙发入空门，颇识字，建庵后尚有余蓄，癸丑城陷，将金埋于庵后山石下，事平无恙，惟庵中器皿窗櫺，皆析作薪矣。复出余资葺理，焕然重新。剑人为题额曰‘海上潮音’。”这也是可珍的掌故。他流寓海上，常在窘乡。如云：“余在沪暂假西人数椽，可以栖息，聊蔽风雨。郁氏遣人馈吕宋银饼六枚，却之不获。余得此金，稍售鸡鱼肉脯，以为甘旨之奉，可以度残腊矣。”又云：“余欲采辑海上轶事，以备修志之用。”这些海上轶事，是否辑刊成书，却不得而知了。

《鞠部丛刊》博采众长

《鞠部丛刊》，是一部充满文艺性的、有代表性的戏剧刊物。十六开本厚厚两大册，一九一八年秋，由上海交通图书馆出版，主编为周剑云。封面《鞠部丛刊》四个楷书，出于书家何诗孙手笔。内有恽铁樵、陈蝶仙、蒋兆鑾、叶小凤、王钝根、严独鹤、郑正秋、许指严、杨雪筠、李定夷、顾曲叟、俞无言、周瘦鹃、范烟桥、陈琦、陈祚昌、孙漱石、朱鸿富，施济群、张丹斧、宋痴萍等作序，廉南湖、朱大可、闻野鹤、奚燕子、吴绮缘、范君博、刘豁公、费隽园、欧阳予倩、天台山农等题诗，文艺气息极为浓厚。铜版图有钱病鹤所绘之《周郎顾曲图》，撰述同人二十余人照片。其它剧照，如净角名宿何桂山之锺馗，伶界二杰汪桂芬、谭鑫培，青衣泰斗陈德霖及其弟子，梅兰芳之千金一笑，昆曲名旦韩世昌，以上且用珂罗版精印。又有汪笑侬之家庭、春柳新剧同志照、辛亥殉难新剧名人王钟声、十年前之王克琴、十三岁之梅兰芳、票友袁寒云之天官、欧阳予倩之晴雯补裘、钱化佛化装六种，刘豁公之三娘教子、新剧家徐半梅、谭鑫培之定军山，杨小楼之青石山、尚小云之樊江关、黄润卿之天女散花，以及贾璧云、时慧宝、刘永春、李吉瑞、高福安、芙蓉草、许黑珍、管海峰、郑正秋、刘艺舟、陆子美、苏石痴、碧云霞、张文艳等本来面目，可谓洋洋大观。

内容有十二栏，一、霓裳幻影，便是上面所提的许多剧照。二、剧学论坛，主要有武樗癯的《三国剧论》，周剑云的《戏剧改

良论》、冯小隐的《菊选刍议》、马二先生的《票友学戏之程序》、郑正秋的《新剧经验谈》、尤半狂的《昆弋辨》、秋星的《说脚本》，凡数十篇。三、歌台新史，载有汪切肤的《南丹桂与广潮帮之大决斗》、姚民哀的《南北梨园略史》、胡寄尘的《民兴社始末记》、宋痴萍的《春柳始末记》、管义华的《上海票房二十年记》及《上海票友调查录》等，颇多历史性的作品。四、戏曲源流，如马二先生的《三国演义之京戏考》、小隐的《八大锤溯源》，姚民哀的《歌场野获录》，樗癯的《一捧雪考》、《洛阳桥考》、《百花亭考》、《杨家将考》、《泗州城考》，都是些戏剧考证。五、梨园掌故，如小隐的《梨痕菊影录》、脉脉的《歌台怀旧录》、诗樵的《谭鑫培的家乘》等，都是值得回忆的。六、伶工小传、均近世伶工事略，凡一百数十人，虽不能全备，但著名的却已十有八九了。七、粉墨月旦，如小隐的《谭鑫培之空城计》，《杨瑞亭之安天会》、《尚小云之玉堂春》、周剑云的《三麻子之走麦城》、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樗癯的《筱桂红之晴雯撕扇》等，或褒或贬，但还是贬少于褒。八、旧谱新声，如汪桂芬之文昭关、汪笑侬之博浪椎、谭鑫培之黄金台、盘关、刘宝全之长板坡等，都是很珍秘的。九、艺苑选萃，那又是些铜版图，印著红豆馆主之五言联、时智农之指画兰花、欧阳予倩之诗牍、钱化佛所绘之观音，王瑶卿所绘之残荷、贾璧云所绘之山水、朱素云之书画等。十、骚人雅韵，都是些投赠的诗词。十一、俳优轶事，如冯春航之豪兴、易哭庵与黄润卿、孙春恒与大奎官、孙菊仙之解见等，也有数十则，以趣闻为多。十二、品菊余话，载着各家的评剧文章，如小隐的《尊谭室戏言》、杨尘因的《春雨梨花馆剧话》，郑鹧鸪的《半椽室剧话》、舒舍予的《斧风室剧话》、马二先生的《啸红轩剧话》、管义华的《霁庵剧话》，尤半狂

的《瘦影楼剧话》，周剑云的《剑气凌云庐剧话》，刘豁公的《哀梨室剧话》，秋星的《秋雨梧桐室剧话》，睦公的《小织帘馆剧话》，各抒见解，各志见闻，也是足资研究的。且每一栏都有扉页和报头，由当时名人作题签与绘画，如徐悲鸿、罗瘿公、徐枕亚、徐天啸、王钝根、杨了公、刘山农、蒋箸超、但杜宇、丁悚、熊松泉、孙雪泥、张砚孙、朱蓉庄、恽冰盦等，都曾执笔。

该书校勘欠精，误字很多，例言有云："本书尚拟继出续集，博采众论，不限于南方评剧家，门类依旧。"可是续集之刊，未成事实。

鸳鸯蝴蝶派典型作品《玉梨魂》

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风靡一时，其中当以徐枕亚所著的哀情小说《玉梨魂》为典型。

徐氏名觉，别署枕亚，又署东海三郎、青陵一蝶等。他是江苏常熟人，初在乡校执教鞭，后来上海，在《民权报》社编辑新闻，由于该报注重文艺小说，他见猎心喜，便撰《玉梨魂》逐日刊登该报，一年多才登载完毕。全文共三十章：有葬花、夜哭、课儿、诗媒、芳讯、挥血、惊鸿、鹃化、隐痛、凭吊等目。当在报端刊载时，便有读者致书枕亚，亟欲窥其全豹。他即在报端发表一文，函答读者云："辱书征《玉梨魂》全书，并嘱于报端披露，雅意殷拳，足征同调。奈此书并无成本，逐日发刊，事迹甚长，且多离奇曲折，全书脱稿，尚需时两月余。三字品题，早贮胸中之竹；一枝秃管，续开腕底之花，徐徐而来，源源不绝。枕亚文思迟钝，固不能一时急就。大凡小说家言，其动人者每令人不忍释手，已略得其端倪，便急欲窥其究竟，而作小说者，洞悉阅者之心理，往往故示以迷离徜恍，施其狡狯伎俩，时留有余未尽之意，引人入胜，耐人寻思，如十三四好女儿，姗姗来迟，欲前仍却，不肯遽以正面向人也。故作报章小说者，与阅报章小说者，其性之缓急，适成一反比例，无怪君之读《玉梨魂》而欲向枕亚征其全豹也……至其事之原委，第一章中，规模已具，明眼人自能辨之。尧夫诗曰：'美酒饮当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窃谓阅小说者，亦当存如是想。"

该书于一九二三年出单行本，为十六开本，封面由沈泊尘作画，绘书中主人梨娘，在夜月朦胧中，倚树饮泣。《真相画报》社为制玻璃版，同益图书公司代印，由民权出版社发行。首冠吴双热序，张含兰、唐左侬、陶采畴、张荇青、翟楚材、何警秋、吴听猿、李沅芷、陈惜誓等题词。全书十余万言，词藻雅赡，文胜于质。这一派，动辄以"一双蝴蝶，卅六鸳鸯"来比拟书中的才子佳人，于是贻讥一般进步作家，称之为鸳鸯蝴蝶派，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玉梨魂》一书中的人物，仅何梦霞、白梨影，以及梨影子鹏郎、小姑筠倩寥寥数人而已，且非出于虚构，确有其人其事。当时刘铁冷、沈东讷和枕亚同办《小说丛报》，铁冷的《镂冰室碎墨》曾作如是说："梨娘之子鹏郎，名鹏，蔡其姓，似为无锡荡口人。曾至《丛报》社视其师枕亚，时已成人，体瘦而长，面白皙，极文雅。梨娘确能诗，亦仅三四十首，不甚老炼，经枕亚点窜始工，此为东讷亲见。当《民权报》初刊此说部时，梨娘曾拟出面交涉，嗣为人所阻始已。书中谓以小姑嫁梦霞，实非小姑而为侄女。曾住申江多年，人亦温和敦厚。"至于梦霞，当然是作者夫子自道。

徐枕亚在《民权报》写《玉梨魂》，没有得到稿费，后来刊行单行本，销数甚广，也没有获得丝毫利润，他愤而收回版权，且作《雪鸿泪史》的赠品，在《小说丛报》十六期上登一广告，题为《敬赠〈玉梨魂〉》云："枕亚新著《雪鸿泪史》一书，与《玉梨魂》深有关系，书已付印，准一月出版。凡购《泪史》一册者，概赠《玉梨魂》一册。"又附枕亚启事云："鄙人前服务《民权报》时，系编辑新闻，初不担任小说。《玉梨魂》登载该报，纯属义务，未尝卖与该报，亦未卖与该报有关系之个人，版权应归著作人

所有，毫无疑义。嗣假陈马两君出版，两年以还，行销达两万以上，鄙人未沾利益，至前日始有收回版权之议，几费唇舌，才得解决，一方面交涉甫了，一方面翻印又来，视耽欲逐，竟欲饮尽鄙人之心血而甘心。深恨前著此书，实自多事，今特牺牲金钱，将此书印行赠送，以息争端而保版权，此布。”

《雪鸿泪史》和《玉梨魂》为姊妹篇，托言为《玉梨魂》主人何梦霞的日记，首冠识语，有云：“《玉梨魂》出世后，余乃得识一人，其人非他，即书中主人翁梦霞之兄剑青也。剑青宝其亡弟遗墨，愿以重金易《雪鸿泪草》一册，余慨然与之曰：‘此君家物也，余乌得而有之。’剑青喜，更出《雪鸿泪史》一巨册示余，余受而读之，乃梦霞亲笔日记。其中事迹，与《玉梨魂》多所牴牾，其最谬之点，何崔两姓，并非旧戚。梨娘之死，为庚戌年六月二十四日，非己酉除夕也。石痴之书，略焉不详。余乃加以装点，遂失真相。然石痴固得之于梦霞之口，或当时梦霞尚不欲将个中秘密尽情宣示也。据剑青言，梦霞东渡时，仅携诗稿去（即《雪鸿泪草》），日记稿留遗于家，故未散佚，然则石痴必未见此稿无疑。今石痴浪游欧美，行踪无定，恨未能一讯之。余既读毕，乃请于剑青，为抄副本付刊，以正余书之误。剑青曰：‘恐非死者之志’。余曰：‘君母太迂，令弟殉情殉国，其人其事，固在可传之列，即梨娘、筠倩之柔肠侠骨，于近日女界中，亦何可多得。余书已唐突西施，有此真迹，不以示人，将何以赎我过，且恐转非死者之志也’。忿愚者再，始允余代为诠次。原稿自己酉正月起，至庚戌六月止，记月不记日，今为之细分章节，每节缀以评语，以清眉目。凡与《玉梨魂》不同之点，无不指出。此后《玉梨魂》可以尽毁，而余于言情小说，亦未免有崔颢上头之感。江郎才尽，从此搁笔矣。”实则梦霞亲笔日记云

云，无非作者故弄狡狯，后来《泪史》在《丛报》上登至十四章，预备刊印单行本，当征求序跋及题词时，却又自行揭布此谜。如云："《玉梨魂》一书出版后，猥蒙海内人士欢迎，惟此书成于仓卒，命意遣词，均欠斟酌，且书中情节及诗札，脱落者甚多，与事实不符之处亦复不少。当时冒昧出版，未遑痛加增削，暇时复阅一过，辄抱不安，书已出版，无可为讳，思所以补救之，爰复有《雪鸿泪史》之辑，托名梦霞日记，是真是假，无足深考，编者之意，在矫正前书之误，另翻新样文章，所脱落之情节及诗札，一一加入，较前书似形完善，今将付印，若蒙海内文豪，赐以题序，无任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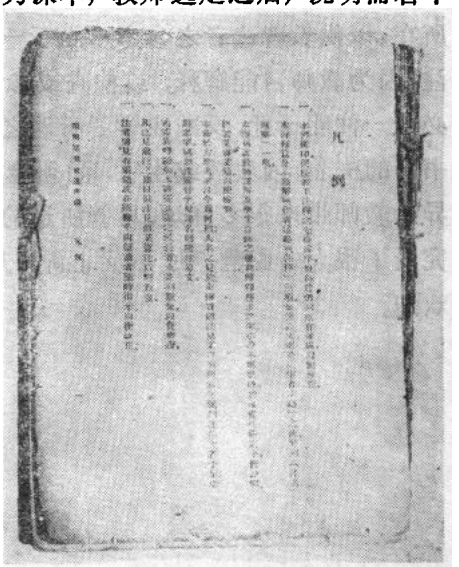
《玉梨魂》先后重版三十余次，在民初小说中是突出的，当时曾演新剧，一九二四年，明星影片公司摄了电影，搬上银幕，由郑正秋改编，张石川、徐琥导演，汪煦昌摄影。王献斋饰何梦霞，王汉伦饰梨娘，杨耐梅饰筠倩，结果是梦霞与筠倩结婚，把矛盾调和了起来，和原作有所不同。当时民兴社又把《玉梨魂》搬上舞台，演出新剧，邀枕亚往观。枕亚观后有感，写了六首《情天劫后诗》，忏悔供实，兼而有之，如云："不是著书空造孽，误人误己自疑猜。忽然再见如花影，泪眼双枯不敢开。""我生长戴奈何天，死别悠悠已四年。毕竟殉情浑说谎，只今无以慰重泉。""今朝都到眼前来，不会泉台会舞台，人世凄凉犹有我，可怜玉骨早成灰。""一番惨剧又开场，痛忆当年合断肠。如听马嵬坡下鬼，一声声骂李三郎。""电光一瞥可怜春，雾鬓风鬟幻似真。仔细认来犹仿佛，不知身是剧中人。""旧境当前若可寻，层层节节痛余心。梦圆一幕能如愿，我愧偷生直到今。"

枕亚的妻，姓蔡，名蕊珠，被恶姑虐待而死，枕亚很是痛

悼，因此别署“泣珠生”，以寄哀思之意。不料悼亡不久，却因这部《玉梨魂》小说，结成意外姻缘，真是奇哉怪也。原来末代状元刘春霖为京华寓公，他的女儿沅颖待字闺中，无意中看到这部《玉梨魂》，似乎着了迷，为之废寝忘食，并作书附诗，投寄枕亚，欲从之为师。于是他俩就此诗简往还，时相唱和。枕亚的诗，如云：“却从蕊，碎珠沉后，又遇花愁玉怨人”，“瞥眼华年销绿鬓，铭心知己拜红裙”，“鹃啼已是无声血，蚕蜕终多不了缘”。“尺书碧血缄身世，小印红钤识姓名”。经过许多曲折，枕亚拜老诗人樊樊山为师，樊山和春霖交谊很深，由樊山作伐，也就结成秦晋。可是沅颖是娇生贵养的，枕亚一介书生，寒素得很。她下嫁之后，生活不惯，加之姑媳相处又不融洽，不久一病缠绵，也就不治而死。枕亚亦于一九三七年逝世。

关于活叶文选

活叶文选，不是现在才有出版。早在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即出过《商务活叶文选》，所选的无非是以秦汉及唐宋八大家为中心的前人名作，略加注释。但由于当时一般读者认为活叶容易散佚，大都不喜欢采用，也就停止不出了。后来，上海北新书局继之发行《北新活叶文选》，有文言，有语体，有古人范作，有时人名篇。体裁方面，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应有尽有，约有二千篇左右，后面附有注释，隙页加以补白。大都供学校教师的选择，作为课本，教师选定之后，说明需若干份，可由该书局迅速代为装订成册，发给学校。另有细释详解本，印成一套，作为教师的教授书，给教师备课，很是方便。因此各校教师乐于采用，销路很广。这时开明书店，看得眼红，也出《开明活叶文选》，它的注释即在词句下面，不必检查后页，以省翻检之劳，这是章锡琛和他的弟弟锡珊规划的，



开明活叶文选凡例

抗战前，已印出一千多篇。货栈中有一间楼屋，专堆《文选》，有人称之为“文选楼”。及抗战爆发，全部纸型被毁，以致无从再印。

广益书局也起而仿效，其时南社胡寄尘在该局担任编辑，便约了同社柳亚子、胡朴安、潘兰史等一同编辑，刊行《中国活叶文选》，凡二百篇，后来装成四册。它的编辑大意：“一、专作初高中或大学中国文学读本之补充材料。每篇独立，教师选取极其自由。二、此种文选，选辑之标准如下：1.中国文学中之名著，为一般人所必读者。2.不经见之文而有特殊之价值者。3.清浅明白，便于初学阅读者。三、所选各文，注重实质方面，抒情的，以发于至情至性者，始采取之。记事的，或记特异之事，或描写日常生活，两者并取。发挥思想的，以能开拓读者之胸襟，并增高其见识为目的。四、每篇必注明其佳处之所在，以供教者读者之参考。至于一般典故，或生字，概不多注，因为教师自能解释，或检查或参考坊间有注解之选本，不必一一注明于此，反减少学者听课之兴趣。”这第四条，实是该书局的失着，因典故或生字，尚须检查参考其它注释本，这无异给教师带来很多麻烦，尽管所选的范文非常精当，但推销终究受了很大的影响，远不及北新和开明的文选那样受大众的欢迎。

记述上海史实的几种书

研究上海史实的组织，已往当推上海市通志馆较为健全。该馆创始于一九三二年。柳亚子主其事，朱少屏任副馆长。编刊《上海市年鉴》，一年刊行一大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它的内容包括特载、大事概要、土地人口、天时气象、行政、司法、外交、财政、金融、教育、交通、工业、商业、农林、渔牧、学艺、宗教、社会事业、时事日志等。全书各编，除详述一年间的经过外，并略举其过去历史，使源流沿革，了如指掌。同时刊有统计表格，便于查考。此外还有《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可是印数不多，为非卖品，只送赠学术机关及专门研究者。但由于外界需要者多，纷纷函请公开发售，不得已选择期刊中自成段落而又比较重要的抽印十种，它们是：《吴淞江》、《上海的风雨》、《上海的银行》、《上海的日报》、《上海图书馆史》、《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在太平天国时代》、《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这十种书各自成册，公开发售。其他的《大闹公堂案》、《上海的铜元》、《上海公共租界的发端》、《上海金融在袁世凯帝制时期》、《吴淞铁路交涉》、《小刀会与太平天国时代的上海外交》、《上海法租界的多事时期》、《上海外交在日俄战争时代》、《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交涉》等，都没有公开刊行，不免引为遗憾。这时担任编辑的，除徐蔚南、吴静山外，尚有胡怀琛、胡道静、席涤尘、董枢、李纯康、乐嗣柄、锺贵扬等共十余人。

徐蔚南、吴静山等还发起组织上海通社，所有通志馆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完全加入。当时柳亚子便把上海通社和市通志馆比作孪生的姊妹，打成一片，编成《上海研究资料》，由中华书局印行，这时为一九三六年五月。一九三九年八月又出续集，每集约四十万言，其中珍贵的史料有《苏报案始末》、《洋泾访古记》、《上海四明公所研究》、《近代名人在上海》、《张园掌故》、《上海博物院史略》、《上海学校溯源》、《上海学艺老话》、《上海物产丛谈》、《上海新闻纸的变迁》、《上海四明公所研究》、《百年前的上海》、《上海电影院的发展》等。以上这许多资料，都是上海通社在《大晚报》、《上海通周刊》及各报陆续发表的，经过取舍、修订、汇印而成，且附铜版图数十幅。此外，他们还把《上海通》分类汇编成《上海通丛书》，共三集，称为上海历史之有力的发掘者。

上海通社校刊《上海掌故丛书》，线装十册，称为第一集，也由中华书局出版。可是第二集始终没有出。丛书十四种，元人作品，有陈椿的《熬波图》一卷，明人作品，有张鼐的《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其它全是清人的作品，如叶梦珠的《阅世编》十卷，杨光辅的《淞南乐府》一卷，褚华的《沪城备考》、《木棉谱》、《水蜜桃谱》，共八卷，张春华的《沪城岁事衢歌》一卷，曹晟的《夷难备尝记》、《红乱纪事草》、《觉梦录》共四卷，黄本铨的《枭林小史》一卷，王萃元的《星周纪事》二卷，曹骧的《上海曹氏书存目录》不分卷。有黄任之、柳亚子、胡朴庵、陈陶遗等题序。这些书，有的从未刊行过，有的散佚已久，当时搜集确实不易，甚至有些旧钞本，错讹很多，都经过柳亚子校勘。

平湖陈左高有《晚清二十五种日记辑录》，其中颇多有关上海故实，如林则徐《乙未日记》，记述他赴嘉定、宝山、青浦、

金山一带勘察水利简况以及下榻大东门敬业书院，曾课书院生员，这是一百四十多年前有关上海水利、教育的史料。李石梧《李星沅日记》，记及道光年间的上海港口情况，雅片战争时，崇明、金山的防守，南汇、松江的治安问题，上海火药局被炸，近郊各县禀报英军的动态，特别是所叙陈化龙坚守吴淞炮台，直至牺牲的几段，颇有参考价值。曹晟《十三日夷难备尝记》，纪述雅片战争，英军蹂躏上海，进占南市，分据各通衢要道，不断搜索等情况。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有关上海船商事，是清咸丰间上海航运史料。陆嵩《意苕山馆日记》，记及咸丰五年春初，上海城中太平军小刀会撤退的原因。王韬《蘅华馆日记》，记述上海市郊桥阁寺观有关情况。涉及三洋泾桥、三茅阁桥等处，当时乃一河道，为英法租界交界处。而三茅阁桥旧址，在今车辆辐辏的延安路河南路口。瞿元霖《苏常日记》，记一八五八年期间上海近郊松江、奉贤等人物、古迹、航运、盐场，及黄浦、吴淞江两岸景物。附有歌咏上海地理诗。吴大澂《憨斋日记》，那是吴氏应吴平斋之招，客居上海，所记有上海所见的历代器物，特别是内府珍藏之希世瓌宝流落至上海者。又咸丰年间，上海旧书店、骨董铺集中于南市四牌楼。冯芳缉《冯申之先生日记》，所记咸丰年间城隍庙、关帝庙、竹林庵、一粟庵、青龙庵、陈忠愍祠等寺院古迹，及也是园的景色，实是上海寺观园林史料。张德彝《航海述奇》，记同治五年途经上海．凡洋场见闻，书馆及印刷情况，外国侵略者入城后开新北门的故事，及全国省分命名马路等等，都是近代上海地方史料。宜垕《初使泰西记》，记同治七年，在上海和美国使臣蒲安臣洽谈外交事务。无名氏《绛芸馆日记》，颇多上海戏剧曲艺掌故，以及豫园登高，船舫厅兰花会，大东门的地藏灯会，

三茅阁的三茅会等，都是百年前上海的乡土习俗。王之春《东游日记》，是赴日本经上海途中所作。对未园之胜，虹口停放机器船的构造，以及往来上海与日本之间的东洋船的设备，记述甚详。姚觐元《弓斋日记》，记光绪五年，客居上海的见闻，如晤杨守敬，鲍廷博托销《图书集成》，赴虹口同文书局，参观用西法印书画，均系上海文化史料。何荫楠《钮月馆日记》，记述清末光宣间，上海静安寺之申园、愚园、张园、西园等处景物，其中所写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早晚状况，具体逼真。又及迎贵园、天仙园、丹桂园、凤舞台、大舞台、群仙园等顾曲之所。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载及在沪经常往还的人士，如赵仲宣、严信厚、宋恕、汪康年、谭嗣同、孙多森、姚文倬、汤寿潜、胡仲逊等，又记述了戊戌变法前后的种种传闻。

这许多日记，大都为稿本，外间无从看到，经左高汇抄问世，厥功是很大的。

一折八扣书是怎么回事

一九三四年左右，上海有所谓一折八扣书出售，即定价一元的，一折成为一角，再加八扣，八分钱就能购买一书。首创此举的，是上海福州路望平街口的新文化书店，主持者范某，他把《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旧小说，加标点，分段落翻印出版。且一折八扣，登报宣传。不明真相的读者认为他们这样做一定大蚀其本。岂知范某非但不蚀本，而且在一年内赚了二十万元，成了富翁。原来那时加拿大报纸在我国大量倾销，每一令只卖三元，旧小说既不要付稿费，也不涉及版权问题，初版只算成本，不计赚钱，这种畅销书再版三版，越销越广，那就大大地有利可图，各地书店也认为这种书很便宜，易于脱手，都现批现卖，于是经济周转得很快，用来再印其它笔记杂书，以及《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热门书，当然赚钱更多。

这时开设中央书店的平衡（襟亚）看得眼红，也就如法泡制，且加以改进，一方面用仿宋字印，刊了许多明清著作，如谢肇淛的《五杂俎》，李璒的《群芳清玩》，朱元亮的《青楼韵语》，周漫士的《金陵琐事》，李日华的《紫桃轩杂缀》，氷华生的《雪涛小书》，徐懋学的《说颐》，陈眉公的《小窗幽记》等，其中颇多流传极少的明季珍本。这些明刻本，线装木雕，很是精雅。排字时，为了避免沾染污迹，平衡把原书拆散，每页夹着玻璃纸，污迹沾在玻璃纸上，校勘过后，重复装订，精雅如故。如此可

以避免誊抄，减少错字。所以当时在一折八扣书中是很突出的。他还把袁中郎、袁小修、徐文长的诗文集，平江不肖生（即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等，都列入一折八扣书中，大受读者欢迎。与此同时，广益书局也用大达书局名义刊行一折八扣书，把许多通俗小说刊印了数十百种，外加彩色封面，灿然炫目，以吸引读者。这样一来，一折八扣书，充溢市间，于是同行嫉妒，在外面散布谣言，说“一折八扣书，纸张含有毒素，展阅时毒气散溢，有碍卫生”。新文化书店、中央书店、大达书局便联合登报辟谣，并在广告上登了医生证明报纸无毒的文字，号召大家放心购读。这本身也是一种出奇制胜的业务宣传，结果销路更好。从此，仿效者越来越多，甚至由一折八扣而为一折六扣、一折五扣。这样一来，许多书粗制滥造，错字百出，文字节佚不全，引起读者大为不满，结果无人问津，成为废纸。旧社会出版商唯利是图之行径，于此可见一斑。

从《中国美术》一书看流入英国的文物

我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文物的瑰丽多珍，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及。但历经战役，文物纷纷散失。加上军阀的盗窃，奸商的偷运，以及帝国主义者用种种手段巧取豪夺，外流的东西，难以数计。从《中国美术》一书就可以窥见一斑。

《中国美术》，是英国白谢尔氏(S. W. Bushell)所著，由戴岳译为中文。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编刊的《世界丛书》二十种，《中国美术》便是其中之一。该书凡古今石刻、建筑、雕刻、瓷器、织物，以及书画等等无不应有尽有。首冠白谢尔氏的序文，曰："余著述是书，当其初，恐不能有成，兢兢焉不敢以告人，有问者，则应之曰：吾姑研究斯术耳。及出使中国，居北京者三十余年，余乃幸得搜罗中国之美术品，及关于美术品之书籍。涉猎泛览，见闻日广，乃叹中国美术艺文之富。其难者，则在人之慎取而已。今为读此书者便于参考标本起见，所举之例，皆中国物之现存吾英博物院中者，每篇之首，略述其源流变迁，及其物之制作人物及地点，然后相当篇幅之长短，择数种优善标本，而图解释明之"。从这一序文中，可以知道白谢尔氏是个中国通，对于我国的铜瓷玉石，法书名画，都有相当的研究。

现在翻检这本书，可以看到在英国博物院中，有那些我国的珍贵东西，姑略述一二如下：

石刻方面，有汉代山东孝堂山的碑版，圆明园琉璃塔的琉璃瓦，雕绘极精。有清怡王府所藏的周盘，刻铭文凡数百字。有商代的饕餮觚和汉代的海马蒲桃镜，以及建安年制的诸葛鼓。有广东某名手所刻的象牙佛寺，其中亭榭楼阁，浮屠桥梁，随山坡的高下转折，处处具有诗情画意。且曲径通幽，两旁点缀卉木，以珊瑚为花，珍珠为果，翡翠为叶，禽鸟昆虫，或飞或止，都以金银丝缠成。下有池沼，沼水荡漾，杂生荷芰，鸭浮其上，鱼游其下，人物种种，有的弈棋，有的垂钓，有的展卷，有的品茶，栩栩如生，其艺术技巧不在王叔明所雕赤壁夜游之下。又有一座畅怀楼，建于层峦叠嶂之间，共二层，阶三级，四周回廊环抱，又有花墙，备极精细。前面二亭对立，檐角悬着金铃，风飘作响。正中有一匾额，题"畅怀"二字，楼下有莲池，池旁栽着松竹梅及兰草，素羽丹冠的仙鹤啄息着，这也是一件稀世之物，又犀角杯一，下有雕座，有似云朵，灵芝苍松，异常秀逸，树下有达摩，作隻履渡江之状，对面麋鹿成群，状态不一，木座上端，也雕成松竹及蟠桃灵芝，交缠纠结，却又罗罗清疏，那犀角矫然挺出在上面，巧镂花纹，也为松枝芝草，且饶光泽，见之者几疑出于神工鬼斧。他如玳瑁箱，四周雕作竹节纹，又交互着花枝棕榈叶，内刻官家的仪卫，旗旛骏马，前呼后拥。雕漆器皿等，都是玲珑透剔的奇品。还有琥珀朝珠，雕玉花瓶，笔筒。至于颐和园的陶器，且有葛明祥的款识。瓷器有汝窑观音一尊，定窑瓶，建窑关云长像。那首饰、织物、刺绣，更是不可计数。书画方面，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韩幹的画马，黄筌的芍药家鸽图，赵孟頫的仿王右丞山水巨幅，宋徽宗的白鹰图，林良的芦中野鸭图，仇英的汉宫春图，僧穆庵的达摩乘苇渡江图，都是画苑希世之宝。

这本书的插图甚为清晰，可惜书早绝版，现在不易见到了。据说除《中国美术》一书外，尚有计耳斯（L. Giles）所作的《大英博物院中之中国物品录》，可资参考。

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

一八七二年，美查办了《申报》后，为推广销路，吸引读者，发行了每月一册的《瀛寰琐记》，随报附送。这可称为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了。

《瀛寰琐记》，顾名思义，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所以该刊有海上蠡勺居士的序文，如云："尊闻阁主人慨然有远志焉，思穷薄海内外，寰宇上下，惊奇骇怪之谈，沈博绝丽之作，或可以助测星度地之方，或可以参济世安民之务，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开吟风弄月之趣。博搜广采，冀成巨观。"说得很夸大，实则还是所谓"开吟风弄月之趣"这一类的作品为多。如卢先骆的《红楼梦竹枝词》，沅湘词人的《哀江南赋》，滇南香海词人的《吟秋偶集》，黄钧宰的《比玉楼词》，瓯东山樵的《碧浪湖櫂歌序和櫂歌八十首》，抱真子的《珠江纪游竹枝词》，西佘山樵的《观剧杂咏》等，大都是封建文人消闲遣兴之作。其它虽有些《记禁烟原委》、《老庄论》、《内地轮船进止议》、《论互市事宜》等，分量是占得不多的。又连载西洋译本小说《昕夕闲谈》，计五十二回，很受读者欢迎。

一八七五年，该刊出至二十八卷，改称《四溟琐记》，原为二十四开线装本，每册二十四页，这次改为巾箱本，增加至三十二页。刊登了钮经书舍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孙熙的《续见闻杂志》，章鸣鹤的《谷水旧闻》，钱征的《默识录》等笔记，还登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诗文。出至十二卷停刊，再改为《寰

宇琐记》，内容每下愈况，十二卷后，不再继续出版了。《申报馆书目著录》说："以上三种书皆近时诸同人惠投本馆嘱刊之作，本馆延请名人详加选择。其中崇论闳议，层出不穷，骈体诸作，亦可与古作者并驾齐驱。各体诗词，则浓淡清奇，不拘一格。间附杂著，亦簇簇生新。《寰宇琐记》后四卷，又得缕馨仙史精心评骘。其《尊闻阁诗选》，皆诸君先后三、四年中所投寄者也。至《瀛寰琐记》中，又将《昕夕闲谈》一书，逐卷分刊，此五十二卷，真所谓分之则明珠成颗，合之则美玉无瑕者也。"按《琐记》称为卷，实则每卷即一期。

期刊风气一开，此后仿行的接踵而起，如沈饱山所编的《侯鲭新录》，花也怜侬所编的《海上奇书》等，很受读者欢迎，内容以诗文为主的，也就侧重于小说，成为小说期刊了。

在《瀛寰琐记》发行时，尚没有石印和铜锌版插图，只是简单的用铅字排印，印在毛边纸上。至于《海上奇书》和《绣像小说》，那就图文并重了。

晚清小说的宝库《绣像小说》

张元济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之后，看到广智书局刊行的《新小说》杂志，刊载了梁启超、吴趼人写的《侠情记传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把老学究们严禁子弟阅读的所谓不正经的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他对此非常赞同。恰巧这时那位南亭亭长李伯元寓居沪上，他办过许多小型报纸，如《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世界繁华报》等，刊登了《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等，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因此他的声望很高，张元济便聘他编辑一种小说杂志，双方同意，取名《绣像小说》。原来一些旧小说，凡插入人物图像的，统称绣像。取这个名称，无非引人注意而已。每月出版两期，由李伯元主编且兼主撰，第一期创刊于一九〇三年五月，首冠《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启》一文，即出于李的手笔。该文云："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樽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痛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而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

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之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忻慕焉。”

该刊为半月刊，线装本，双页折订，第一期封面是一枝牡丹花，第二期起，为开屏的孔雀，内容分小说、翻译、传奇、弹词、杂著等，其中多长篇小说，编者李伯元所作的有《文明小史》六十回，《活地狱》三十九回，吴趼人续三回，惜秋生续一回，其它如洪都百炼生的《老残遊记》，蘧园的《负曝闲谈》，惺庵的《世界进化史》，洗红厂主的《泰西历史演义》，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姬文的《市声》，忧患余生的《邻女语》，吴趼人的《瞎骗奇闻》，壮者的《扫迷帚》，嘿生的《玉佛缘》，血泪余生的《花神梦》，吴蒙的《学究新谈》，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旅生的《痴人说梦记》，佚名的《苦学生》，有吴梼、威士等所译的西洋小说，如《山家奇遇》、《天方夜谈》、《卖国奴》、《小仙源》、《三疑案》、《生生袋》、《理想美人》、《斥堠美谈》、《僬侥国》、《幻想翼》、《梦游二十一世纪》、《珊瑚美人》、《灯台卒》、《瀛寰志险》、《华生包探案》、《俄国包探案》等，很多没有刊完。还有弹词、传奇和剧本等。该刊出至一九〇六年停刊。所有作品，后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单行本。解放后，阿英编的《晚清文学丛钞》一书，从该刊中选入了一些作品，使早已绝版的书得以流传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文明小史》、《活地狱》、《负曝闲谈》，数年前刊印了单行本，一般爱读小说者，引为眼福。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几种期刊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杂志，种类很多，同时为各团体、学会、机关、代理发行的杂志，每月最多时刊行二十种以上，兹把它自己编印的简述如下：

《外交报》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创刊，每月三期。专载我国的外交及列强对我的政策。内容分论说、谕旨、文牍、译论、外交大事记、世界大事记、国际法、专件等。一九一〇年停刊，共出二百〇三期。

《绣像小说》 一九〇三年创刊，一九〇六年停刊。共出七十二期。

《东方杂志》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封面为一龙，嘘气幻成《东方杂志》四字。初为月刊，一九二一年后改为半月刊。一九二四年出《二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五年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被租界工部局提起控诉。一九四八年底休刊，前后经历四十四年，实为国内创刊最早、时间最长的定期刊物。虽其间叠遭国难，却能克服困难，坚持继续出版。如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沪战休刊，即于是年十月复刊。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沪战休刊，即于是年十月在香港复刊。又出了《东方杂志》的附刊《东方画刊》，用影写版印。民国三十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再度停刊，民国三十二年在重庆复刊。在前清宣统二年时，每期销数已达一万五千份。共出八百十七期。撰稿的有钱智修、甘永龙、章锡琛、高劳、许家庆等。长篇

有俞天游的《新飞艇》，孤桐的《绿波传》，谷虚的《清宫琐记》，冷汰贻先合译的《清宫二年记》，何诹的《碎琴楼》，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东吴旧孙的《五十故事》，况蕙风的《餐樱庑随笔》，赵叔雍的《重臣倾国记》，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等。前后主编人有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陈寅恪、苏继庼、吴泽炎等。此后曾把其中重要著作，出版《东方文库》，全部八十二种，一百册。如《辛亥革命史》、《戊戌政变记》、《枯叶杂记》、《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神髓》、《近代戏剧家论》等，每册可以零售，又有《东方文库续编》四十六种，五十册，也可零售，如《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史》、《妇女风俗史话》、《王静安的贡献》、《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国画面面观》、《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行路难》等。

《教育杂志》　一九〇九年一月创刊，每月一册，一年为一卷，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内容分图画、言论、学术、实验、修养、教材、调查、法令、记事、杂纂、附录，并刊包天笑的教育小说《苦儿流浪记》，抗父的《黑伟人》。"一二八"沪战休刊，一九三四年九月复刊。"八一三"沪战又休刊，是年十月在香港复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便停止发行。共出三十卷。周予同曾任后期编辑。

《小说月报》　一九一〇年七月创刊，封面为蝶恋花画幅。每月一册，内容分图画、小说、译丛、笔记、文苑、新知识、改良新戏。最后为零星小札，称为《雨丝风片》。长篇有林纾的《双雄较剑录》、《蝉曳残声录》、《罗刹雌风》、《薄倖郎》，沈敏的《鸳莲债券》，苍园的《戏迷梦》、《栲栳鉴》，林万里的《离鸾》，诗庐的《孤士影》，王逸兰的《暗香媒》，程瞻庐的《蔡蕙弹词》，龙禅居士的《碧血碑》，吴梅的《双泪碑》，笔香词客的《赪绡恨》，宛

君的《山人扇》，悲秋散人的《秋海棠》，王蕴章的《碧血花》和《玉鱼缘》、《霜华影》，陆恩煦的《血手印》等，其他如赵绂章、朱树人、庄俞、徐枕亚、徐仲可，夏敬观，徐卓呆、许指严、胡寄尘、东吴旧孙、泖东一蟹等都有作品。主编为王蕴章、恽铁樵。五四运动后，由沈雁冰主编，内容革新，放大版本，用四号字不分栏，直排到底。以后由郑振铎、徐调孚继任编辑。"一二八"沪战停刊，共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的新年号，早已编就，脱期延误，直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才印毕，内容扩充，增加页数，有四百页左右，立即送交装订部装订成书。编辑徐调孚获得一样本，其它在下一天二十八日战事发生，全部被毁。老舍的《大明湖》，茅盾的《新生》，以及化名逃墨馆主的《夕阳》，都烧掉了。幸而《新生》留有底稿，后来重印单行本，更名《子夜》。其后又把所刊的小说杂著，另编《小说月报丛刊》五集，共六十册。

"商务"的《小说月报》

《少年杂志》　一九一一年创刊。每月一册，内容除故事之外，还有时事评论、人物传记，博物资料、德育模范，以及游记、寓言、美术、游戏、卫生等，"一二八"沪战停刊，共出二十一

卷(满一年为一卷)。前后主编人有朱天民、殷佩斯等。

《法政杂志》 一九一一年创刊，每月一册。研究法律和政治，介绍中外名法家学说，分图画、论说、译丛、杂录、专件、记事、附录等。撰稿者有陶保霖、姚成瀚、王倬等。

《学生杂志》 一九一四年一月创刊，每月一册，为中等学校学生的读物，介绍各种学科知识。一九四八年停刊，(中经战乱，短期休刊三次)。前后主编人有朱天民、杨贤江、陈功甫等。

《妇女杂志》 一九一五年一月创刊，每月一册，内容分图画、论说、学艺、家政、小说、译海、文苑、美术、杂俎、传记、通讯、余兴等栏。初由王蕴章编辑，蕴章为南社社员，因而登了许多南社人士的作品。继蕴章主辑的，有胡彬夏、杜就田、杨润馀、章锡琛等，共出十七卷。

《英文杂志》 一九一五年一月创刊，每月一册，内容包括作文、文法、翻译、会话，注释清楚，容易领悟，适合中学以上学生补习之用。平海澜主编，执笔的有邝富灼、周越然、吴献书等。

《儿童世界》 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原为周刊，每年五十册，后因"一二八"沪战，休刊数月，复刊时改为半月刊。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沪战休刊。这年十月，在香港复刊，香港沦陷后停刊。主编者郑振铎、徐应昶。绘图者为许地山的弟弟敦谷，叶圣陶的著名童话《稻草人》，即发表在该刊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有《新儿童世界》出版。不久即停。

《儿童画报》 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月出二期。"八一三"后，在香港复刊。改用四色精印，香港沦陷才停刊。主编人朱天民。

《小说世界》 一九二三年创刊，每周一期，全年五十册。取材以小说为主，杂作为副。刊载的长篇有：林纾的《情天补恨录》、《妖髡缨首记》，南海冯大的《空针》，姚鹓雏的《红薇记传奇》，徐卓呆的《万能术》，俞天游的《荒服鸿飞记》，胡宪生的《野人记》等。由叶劲风主编，随刊附赠《童话》或《民众文学》一小本。胡寄尘继任编辑后，缩小本子，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十八卷第四期停刊。刊有《小说世界丛刊》，计二十九种、五十三册。除上述几种长篇外，尚有黄宾虹的《古画微》、胡寄尘的《文艺丛说》，及《今镜花缘》，叶劲风的《午夜角声》，俞天游的《月球历险记》，唐仲陶的《布云作障》，止室的《重逢》等。

《出版周刊》 创刊于一九二四年，载商务出版消息。自一九三四年起，内容大加扩充，增添读书指导、读物介绍、读书札记、书评、现代作家、世界名著、解题、印刷常识，及其它与读书修养有关的文章。"一二八"、"八一三"两度沪战休刊。一九三七年十月在香港复刊，并改为每月出版。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才停刊。

《自然界》 周建人主编，创刊于一九二七年，全年十册。介绍自然科学。"一二八"沪战停刊。

《少年画报》 一九三六年创刊，每月二册，用影写版印，"八一三"沪战休刊。是年十一月在香港复刊，直至香港沦陷停刊。

《文学杂志》 一九三七年创刊，每月一册。主编朱光潜。仅出数册，"八一三"沪战即停刊。

此外尚有内部刊物，记之如下：

《同舟》 初为油印小本，月出一期。继改铅印大本。一

九三二年九月创刊，每满十二期为一卷，“八一三”沪战停刊，出到第五卷第十一期为止。内容有关出版和发行的知识，及同人动态、馆务小新闻，上自经理，下至学徒，均为写稿。

《同行月刊》　一九三三年一月创刊，每年十二期为一卷，内容多载出版消息、同行消息，以及有关营业情况，用以增进书业知识，联络同行感情，出至五卷第七期，“八一三”沪战停刊。

《通信录》　一九一八年一月创刊，至一九四〇年停刊。除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战争，每次停刊了几个月外，其它总是按期出版，具有二十二年的历史。自创刊至一〇三期为月刊，一〇四期至三七五期为周刊，三七六期至四三六期复改为月刊，四三七期至四四四期改为季刊。形式初为四开线装本，后改为平装本。最后八期，在香港发行。内容包括行政、人事、出版、营业，凡一切章程、通告、职工进退，移调病亡，以及书刊名称、版次定价、各项统计、重大事故等等，都有较详的纪录，可称商务印书馆发展时期的一部完整史料。当时印数不多，总馆每一部门，每期仅发一册，分支馆厂，每期也只发一册，对外不公开。迭经战事和人事变动，馆中只秘书科保存一全部，但“一二八”战役中被焚毁，事后由各分支馆凑来补充，复告齐全。一九五四年，该馆公私合营，这部《通信录》，移交公家。

《馆务通讯》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创刊，至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止，共出九期，可以说是《通信录》的复刊，但旨趣却与《通信录》不同。

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中华书局发行的杂志很多，民初发行而比较有名的号称“八大杂志”，即《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其中以《中华教育界》发行最早，创刊于一九一三年一月，而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当时尤为风行，发刊词题为《中国之前途，国民之自觉心，本报之天职》。陆费逵卷首宣言云：“《大中华》杂志之目的有三：一曰养成世界知识，二曰增进国民人格，三曰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欲达第一项目的，故多论述各国大势，绍介最新之学说。欲达第二项目的，故多叙述个人修养之方法及关于道德之学说。欲达第三项目的，故多研究国家政策与社会事业之方针，不拘乎成见，不限于一家之言，一以研究为宗，即有抵触冲突之言论，亦并存之”。梁启超在该杂志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抨击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这对社会舆论起了鼓动的作用。据传说，当时袁氏曾托人向梁氏

《中华小说界》创刊号

说项，愿致送巨款收买这篇文稿，被梁拒绝。直至一九一八年左右，除《中华教育界》外，其它七种杂志，均已停刊。此后有《小朋友》周刊，先后由黎锦晖、吴翰云、赵伯衡、黄衣青编。重庆版的《小朋友》，为月刊，陈伯吹编。《小朋友画报》，王人路、吴启瑞、许达年、沈子丞编。继《大中华》后为《新中华》半月刊，周宪文、钱歌川、张健甫、倪文宙编。当时写稿的，均为一时名流，如巴金、郁达夫、傅雷、胡乔木、薛暮桥、王光远、王宠惠、丰子恺、王亚南、杨宪益等。重庆版的《新中华》，由金兆梓、钱歌川、章丹枫、姚绍华编。《少年周报》，潘予旦编。《中华少年》重庆版，张梦麟编。《中华英语》，重庆版半月刊，钱歌川编。又《中华英文周报》，发表葛传槼与英国《简明牛津词典》主编福勒（H.G. Fowlei)的通讯，葛指出该词典的错误，福勒和他反复辩论，最后福勒不得不以"年老不能和你再作论争"为辞而结束，这分明福勒树了降旛，葛氏宣告胜利，此事颇为当时英语研究者所注目。

竞立社的《小说月报》和亚东破佛

竞立社的《小说月报》，与一九一〇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和一九四〇年联华广告公司的《小说月报》是不同的。该报出版于一九〇七年。内容分图画、社论、时评、小说、介绍新著、文艺、杂志等栏，创刊号刊载了《竞立社刊行小说月报宗旨说》，略云："本社之刊行月报也，乃立言之例也。而所以竞于立言者，又贵出言有则而可以为法，言之有文而可以行远。或以为区区说部，何足以当立言之任！不知范言庄论，断难家喻而户晓，传布不广，乌能收时雨普及之效哉！则本社且将恃此说部，而为立德之始基，为立功之啇导焉矣，而于立言乎何有？"主持者亚东破佛，他所著的小说很多，如《闺中剑》、《泡影录》、《双灵魂》、《慧珠传》、《歼鲸记》、《空桐国史》等。《空桐国史》写清朝历史，泛指"虎为大人，豹称君子，豺獍当道，狼狈为奸，"对清廷统治者极尽讽刺讥笑之能事。又有《竹泉生异闻录》，也出于他的手笔。

破佛姓彭，名俞，字逊之，别号竹泉生、盲道人、儒冠和尚、闲邪斋主人，江苏溧阳人。曾任某院秘书，既而失业，生活很困难。他除治稗官小说外，还致力于易学，花了好多年的精力，写成《周易明义》一书，书成，没有书局收稿，他自己更没有资力印行。他和马一浮为莫逆交，马知道了愿出资代印。马又把他介绍给浙江水利局局长林同庄，在水利局谋得一职务，聊以糊口。一天，天很冷，彭衣单寒颤，林看到了很可怜他，说

拟制一皮袍给他御寒。可是林事情很忙，这些小事说过也就忘怀了。过了几天，风雪交加，寒威更甚，彭拥衾不能起床，恰巧两个当差的，却在那里相互开着玩笑说："老天爷和我们穷小子为难，哪里找些油水，搞件皮袍来穿穿才好过冬哩！"不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彭认为林既食前言，复嘱当差的故意冷嘲热讽，不觉大为忿怒，便不顾严寒，立赴钱塘江自沉，幸遇救援，有人问他姓名和有无亲戚。彭答："只有友人马一浮在此。"于是便请马来，马劝他还到局里去，彭不肯，邀他到自己寓里，彭也拒绝。结果暂住大慈山定慧寺中，彭就此披薙出家。

彭和李叔同、夏丏尊都相当熟悉，彭既出家为僧，所有文物，由夏丏尊暂为保存。据说李叔同（即弘一法师）的出家，尚在彭后，是受了彭的影响。

早期的金石书画刊《鼎脔》

《鼎脔》是专谈金石书画的刊物，它在当时有如雨后春笋般的杂志和画报中是别树一帜的。由于印得不多，所以现在旧书铺中很难看到这个刊物了。该刊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创刊，每逢星期一出版一张，至一九二七年停刊，共六十期，是浙东王季欢主办的。馆址即设在他的寓所晏芝路二百六十四号。出于王的手笔的创刊号弁言云："本刊付印，同人嘱余一言，爰辞而序之曰：是刊也，凡碑碣砖瓦书画绣织彝鼎印玺钱镜兵器等，堪供赏玩，悉在网罗，尽量刊登，供之同好。念宋元以来，究讨艺术，代不乏人，专门名家，类有撰述，考之经籍，充栋汗牛。好之者捧金入市，千缃万帙，何难顷刻偕来，则何须求半爪一鳞于是哉！然豪者一饭千金，八珍罗列，五侯之鲭、咄嗟可办，习焉反觉其烦。则本刊也，譬诸伊蒲常供，偶尔尝鼎一脔，或转觉厥味之隽永乎！特一纸播传，篇幅有限，七日付刊，窘于时艰，终不免愿抱宏奢，事归简陋，则厚望于同好者之勖勉焉矣。"

该刊为了影印书画及金石拓本，所以用道林纸。报头题签，时常更易，如张一廖、寿石工、林白水、王杨弇、金息侯、狄平子、康有为、顾燮光、姚茫父、齐白石、邹寿祺、徐贯恂、俞剑华、吴昌硕、张小楼、萧谦中、黄蔼农、许徵白、项乃登、谢复园、袁寒云、郑午昌、邓尔雅都曾为之执笔。该刊曾刊载话山所辑的《惺堂印谈》，郑大鹤的《瑶谈》，孙诒让的《温州古甓记》，冷

庵的《绘事答问》，缪荃孙的《艺风堂尺牍》，乌以锋的《石涛画语录解》，顾燮光的《遁世无闷楼画评》，温訇的《京华忆语》，寿石工的《铸梦庐篆刻学》，陈师曾的《摹印浅说》，松小梦的《颐园论画》，王井陶的《清代释氏山水画家述略》，俞剑华的《中国画写生与西洋画写生不同之点》，王履斋的《读醉苏斋画诀》，郑午昌的《鹿胎仙馆杂录》，陆丹林的《红树室琐记》，毛凤枝的《关中金石古逸考》。从四十四期起，又刊登《分宜清玩籍》，那和明长洲文承休所记《钤山堂书画品目》叙次，互有异同，是另一旧抄本，可供鉴赏家的参考。图画拓本方面较珍贵的有《吴越刻经残石》、《汉建安弩机》、《蜀汉虎步司马印》、《方于鲁墨》、《岳武穆遗印》、《吕晚村砚》、《杨叔峤书房》、《元王若水山水卷》、《张之洞电稿》、《黄莘田砚》，《梅瞿山山水》、《蓝田叔山水》等。

王季欢名士气很重，善书法，游戏三昧，常常把纸幅自下而上倒写，写成了，不误一字。他办《鼎斋》，不给作者稿费，但如果你有急用，他知道了，就送你数十元，甚至数百元，毫不吝惜。刊物本托有正书局代印，可是有正书局印刷脱期，他大发脾气，结果自己办了一个王家印刷所，除印该刊外，又印行《画筌丛谈》、《牌谱》、《铁云藏龟拾遗》、《长兴诗存》、《胡佩衡画存》、《抱蜀老人山水册》、《箬溪艺人征略》、《大涤子山水精册》等。如果还有余力，就接印外界的印件。一九二七年接印了一批上海地下工作者反对军阀的传单，给孙传芳的爪牙发现了，一个印刷工人被捕遇难，还扬言要查究印刷所老板。王季欢这一惊非同小可，就丢了印刷所，逃亡日本，《鼎斋》也就被迫停刊。北伐军克复江南后，王才返国，寓居西湖。抗战期中，病殁于杭州。

当《鼎裔》发刊数期，各方来稿很多，特增刊《鼎裔副墨》，曾闹过一个笑话。原来刊名请鹤山词人易大庵手书，大庵喜写古体字，副字右边不从刀，而是左边从衣，把"副"字写成古体的"福"。先施公司的职员谭亦庄，误认为"福墨"，且以为福应从"示"旁，不应作"衣"旁，特写鼎裔福墨四字，并附一信寄去，略说"贵社报头福字写错，特义务代写两张，请为制版登出，以免文字堕落，贻笑大方"等语。该信寄到《鼎裔》时，恰值王季欢、俞剑华、陆自在等正在聊天。王说："这位老谭在先施做事，想是广东人，就请我们这里的广东同乡陆自在主稿覆他一信，连同题字，下期一并发表，作为公开答复。"实际是把谭亦庄嘲笑了一番。

关于《礼拜六》周刊

民初旧派作者，凡写趣味性作品的，不是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就是被称为“礼拜六派”，也有说“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的。实则“鸳鸯蝴蝶派”以词藻是尚，往往骈四俪六出之；“礼拜六派”大多用通俗散文，也有用语体的。

“礼拜六派”的典型刊物《礼拜六》，是什么样的刊物呢？《近代文学史》上虽然提到，但语焉不详。这儿把当时编辑《礼拜六》的周瘦鹃那篇夫子自道式的《闲话礼拜六》一文，录在下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省委文教部长俞铭璜同志谈起了我和四十年前的刊物《礼拜六》，说是当时我们所写的作品，到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趣味的。我于受宠若惊之余，不由得对于久已忘怀了的《礼拜六》，也引起了好感。不错，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的。所以我年青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个周刊，由我和老友王钝根分任编辑，规定每周六出版，因为美国有一本周刊，叫做《礼拜六晚邮报》，还是创刊于富兰克林之手，历史最长，销数最广，是欧美读者最喜爱的读物。所以我们的周刊，也就定名为《礼拜六》。民初刊

《礼拜六》周刊

物不多，《礼拜六》曾经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在河南路广东路口、旧时扫叶山房的左隔壁）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着。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象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

“《礼拜六》前后一共出了二百期，有不少老一辈的作家，都是《礼拜六》的投稿人。前几天我就接到中等教育部叶圣陶副部长的信，问我有没有《礼拜六》收藏着？他当时曾用‘叶匋’和‘允倩’两个笔名，给《礼拜六》写过许多小说和散文，要我替他检出来，让他抄存一份，作为纪念。又如名剧作家曹禺同志，去夏来苏州访问我，也问起我有没有全份《礼拜六》，大概他也曾投过稿的，可惜我经过了抗日战争，连一本也没有了。这两位名作家，对《礼拜六》忽发思古之幽情，作为一个‘礼拜六派’的我，倒是与有荣焉的。

“至于《礼拜六》的评价，可以引用陈毅副总理前二年对我说的话：‘这是时代的关系，并不是技术问题’。

“现在让我来说说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前后二百期中所刊登的创作小说和杂文等等，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都是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并且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例如法国大作家巴比斯的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其中

一部分曾经收入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意外地获得了鲁迅先生的赞许。总之，《礼拜六》虽不曾高谈革命，但也并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

"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作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为代表，'礼拜六派'却是写不来的。当然，在二百期《礼拜六》中，未始捉不出几对鸳鸯几只蝴蝶来，但还不至于满天乱飞，遍地皆是吧！

"当年的《礼拜六》作者，包括我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旧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譬如一个医生，只会开脉案，而不会开药方一样。所以在文艺领域中，就得不到较高的评价了。"

以上云云，未免主观一些，但作为参考资料而言，想也无妨吧！该刊共出二百期，第一期出版于一九一四年六月，至一九一六年四月出满百期停刊。隔了五年，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又出一百期，寿命告终。较长的小说，有天虚我生的《孽海疑云》，姜杏痴的《剑胆箫心》，常觉、小蝶合译的《恐怖窟》，吴双热的《蘸着些儿麻上来》，程小青的《长春妓》和《断指党》，江红蕉的《大千世界》，程瞻庐的《写真箱》等。前一百期完全为小说，后一百期，则兼登杂作，如林琴南的《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张缪子的《读书小记》，王钝根的《拈花微笑录》，陈灨一的《睇向斋秘录》，余空我的《锁空楼忆语》，缪贼菌的《蛰庵捧腹谈》，沈禹钟的《绵蛮录》，刘豁公的《哀梨室戏谈》，范君博的《小明月龛笔剩》，姚赓夔的《静香楼笔记》等。封面画，大都出于丁悚手笔，袁寒云题签。

《新生周刊》的《闲话皇帝》引起狱讼

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奴颜婢膝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残害爱国分子。七君子入狱的前一年，《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记得当时的《立报》首先登载了杜重远的照片，下面印了十个字："虽在缧绁之中的杜重远"，含有歇后的意义"非其罪也"。这种隐晦的抗议，说明群众在当时是敢怒而不敢言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邹韬奋所办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之后，很快又办了一个刊物，名为《新生周刊》，由杜重远接编。它继承了《生活周刊》的战斗精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销数达十万份。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刊载了艾寒松（化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从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谈到日本皇帝，说："现在的皇帝呢，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实的了。这就是说，他们虽拥有皇帝之名，却没有皇帝的实权。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

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日本驻沪领事看到此文后，便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结果媚敌的国民党政府居然把杜重远下狱，该文作者易水住址不明，无从传讯，也就作罢了。

当时执行律师事务的汝保彝，很熟悉该案内幕，曾在其所著的《上海公共租界最后十五年内的几桩丑事》一文中，谈到杜重远《闲话皇帝》案件云：“高二分院检察处起诉的少数政治案件中，以杜重远《闲话皇帝》一案较为重要，特别激起了当时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作家的愤慨。杜是《新生周刊》总编辑，登载了一篇《闲话皇帝》短评，以内容而言，也只不过是一般性的对日本皇帝说几句闲话而已，要成立罪名，就是在当时的刑法上，也很有问题。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厉行其所谓‘睦邻政策’，日本总领事就借此大动干戈，分别向上海市政府和工部局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把一件小事变成大事，政治气氛被搞得十分严重。工部局当时曾考虑到那个时期日英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而且如果由它出面起诉，又怕引起别的闲话，使自身受到严正的指责，因此，就决定把起诉责任推卸给高二分院检察处；同时也考虑到检察处或者不肯背上这个包袱，那就得由日本人自己从别的方面来对高院施加压力。法律部的书面意见里曾指出：(1)领事团和工部局的基本政策，就在于坚决否认南京方面的各种特别法令，睦邻命令也是特别法令之一种，工部局不便依此起诉；如果仅依违章违警起

诉，结果只是拘役罚金，似非日本总领事所能满意；(2)既然日总领事已经向上海市政府进行交涉，预料市府一定能够同高院取得联系，并行使它们的职权来采取较为有效的措施，并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在工部局这样一种暗示之下，日方就向市府加重压力；最后在市府和高院的连系及合作下，杜被传审，当庭判罪收押。工部局方面也由法律部主任到庭列席，对日方作了站在一条阵线上的表示。”这种内幕情况，局外人不得而知；读了此文，也就昭然若揭了。

文史性刊物中的突出者《逸经》

《逸经》是文史性半月刊，一九三六年由简又文出资创办。编辑室就设在简家，不需要开支，当时是试办性质。出版年余，收支相抵，准备继续办下去时，"八一三"战事发生，只得停刊，共出三十六期。

该刊自创刊号至二十一期，主编为谢兴尧。谢因体弱多病，辞去主编之职。自二十二期起，由陆丹林继任主编。他们分工负责编辑：谢兴尧编史实、游记、书评，陆丹林编人物志、诗歌、秘闻，胡肇椿编考古，李应林编纪事，明耀五编特写，大华烈士（即简又文）编小说。

创办《逸经》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简又文在一九三三年曾和徐讦、陶亢德、林语堂等合办《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中间因编辑与营业方面时有矛盾，勉强维持至契约期满，便不续办。林和简商定另起炉灶，别办期刊。没有多久，他们果然办了《宇宙风》。简因事到北京，晤见谢兴尧，谈到办期刊事，谢很赞同，便辞去北方教务，来到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逸经》也就问世了。其创刊宗旨是这样说的："供给一般读者们以高尚雅洁而兴趣浓厚，同时既可消闲复能益智的读品，并图贡献于研究史学及社会科学者以翔实可靠的参考资料，务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文体长短不拘，语文并用，庄谐杂出，雅俗共赏。取材中西并集，今古尽收，译作皆有，小大悉备。"

主要连载的特稿有：冯自由写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

命逸史》，刘成禺写述袁世凯叛国称帝时期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后来均刊单行本。大华烈士所译的《摩登伽女》，也连载了好多期。简又文、谢兴尧编写的太平天国史事资料，更占相当的篇幅。《死虎余腥录》，揭发军阀的祸国殃民史实，如诛杀郑汝成、郭坚、张宗昌等纪载，都由亲历其事者执笔或口述。又瞿秋白烈士的《多余的话》，最早发表在该刊上，引起读者的注意。

该刊也曾发生过一些文字上的纠纷和争端，如幽谷所写的《李太白的种族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吴宗慈评论《清史稿的失当》，与金梁作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客家的祖先》一文发表后，旅居国内外的部分广东客家人表示反对，一时聚讼纷纭，后由客家史学工作者罗香林等根据事实，作了正确评论，误会才告消释。它还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一万多字，且插图照，堪称为当时较详细的报告文学。可是它触犯了反动派，企图借此大兴文字狱，幸而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与《逸经》负责人简、陆二人相识，邵认为《逸经》发表该稿，没有其它作用，便用公函照例的通知该社，"此后发表文稿，务望审慎"云云，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该刊发表的其它作品还有：徐彬彬的《凌霄汉阁笔记》，叶恭绰的《诸葛武侯八阵图》，柳亚子的《我和言论界之因缘》，陆丹林的《黄花岗凭吊记》，徐一士的《清史稿与赵尔巽》，胡仪曾的《近代书家亲炙记》，俞友清的《红豆与文学》，冯玉祥的《近代第一流廉吏王铁珊先生》，王个簃的《吴昌硕先生绘事丛录》，瞿兑之的《读史零拾》，陈寥士的《从全唐诗说到天一阁秘籍》等。还有，洪仁玕遗著《钦定军次实录》，更属珍贵。

该刊有好几个特大号，如《创刊特大号》，第九期的《二集

开始特大号»(每八期为一集)，第十七期的«纪念中山先生诞辰特大号»，二十一期的«新年特大号»，二十五期的«周年纪念特大号»，二十九期的«春季特大号»，三十三期的«夏季特大号»。另外，还出了«太平军在上海专辑»和其他特辑数种，如«近代六诗人»、«苏曼殊»、«庆祝中山先生»、«光绪皇帝»等。三十七期稿已排就，预备付印，不料"八一三"沪战爆发，排就的也就拆去不出版了。这一期的稿子，除«洪宪纪事本事注»及«革命逸史»续稿外，还有柳亚子的«成了历史名词的南社»，镜如的«王道乐土的东北»，陆丹林、陈蒙庵合撰的«沈痒叟诗词书画»，魏兆铭的«颤抖的古城»，周味山的«宋人文学中的国难词»，胡寄尘的«与陆丹林谈民国前的革命派文学»，少陵的«雅片战争定海抗英经过»，枫园的«围绕废帝的狐鼠»，自在的«黑龙会及其首领头山满»，另有关于太平天国纪事诗«山中草»孤本，及«太平军余众流徙逻罗»等稿件，当排就后，校阅完毕，只留大样一份，陆丹林装之成册。丹林逝世后，稿本不知下落了。

过了一个时期，«逸经»和«宇宙风»、«西风»三刊物出«联合旬刊»，由«宇宙风»负责集稿，«逸经»负责编辑，«西风»负责发行。所有文稿，先与撰稿人联系，不发稿费，部分文稿，由三刊物原有存稿中择其有代表性者加以选辑，除三刊物原有编辑人按期执笔外，并有郭沫若、老向、丰子恺、华君武、谢冰莹、施蛰存、陆筱丹等写稿。共出了七期，因为«宇宙风»、«逸经»两社移往香港合办«大风»十日刊，于是«联合旬刊»停办了。综计收支，尚有盈余，乃将该款平均分发社外撰稿人，约合千字三元，作为笔墨津贴。

《古今》与《文史》两种同类刊物

《古今》杂志创刊于一九四二年三月，第一期至第八期为月刊，第九期起改为半月刊。主持者朱朴，主编和主撰者为周黎庵、冒广生、瞿兑之、徐一士、周作人。一九四四年十月停刊，共五十七期，最后一期为《休刊特大号》。一般的杂志，到结束时，总是草草了事，该刊却是例外。

该刊十六开本，封面大多是书画，有前人的，也有今人的。发刊辞说明这个刊物的宗旨："自古至今，不论英雄豪杰也好，名士佳人也好，甚至贩夫走卒也好，只要其生平事迹有异乎寻常，不很平凡之处，我们都极愿尽量搜罗献诸今日及日后的读者之前。我们的目的在乎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所以不独人物一门而已，它如天文地理，禽兽草木、金石书画、诗词歌赋诸类，凡是有其特殊的价值可以记述的，本刊也将兼收并蓄，乐为刊登。总之，本刊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容的。"当时上海的杂志有三个型式，一是《万象》型，二是《杂志》型（《杂志》是一种月刊的刊名），三是《古今》型。那《古今》的形式和取材，竟成为一时的风尚。除第一期为《创刊特大号》，五十七期为《休刊特大号》外，尚有十九期的《周年纪念特大号》，第四十三、四十四合刊的《两周纪念号》，第二十七、二十八合刊的《夏季特大号》。

该刊刊载的文章，较长的有冒广生的《孽海花闲话》、《孽海花人名索引表》，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知堂的《旧书

回想记》，赵叔雍的《人往风微录》，纪果庵的《孽海花人物漫谈》，龙沐勋的《苜蓿生涯过廿年》，罗振玉的《雪堂自传》，楮冠的《蠹鱼篇》，何挹彭的《读缘督庐日记》，张江裁的《崇效寺楸阴感旧图考》，吴昌绶的《甘遁郁居日札》，陈寥士的《海藏楼诗的全貌》，庾持的《四库琐话》，吴咏的《朱竹垞的恋爱事迹》，杨鸿烈的《记郭嵩焘出使英法》，尧公的《书林逸话》，袁殊的《拙政园记》，谢刚主的《三吴回忆录》，谢兴尧的《水浒传作者考》，文载道的《京海篇》，沈志远的《袁世凯与张謇》，徐一瓢的《记通州范伯子》，五知的《堪隐随笔》，吴湖帆的《梅景书屋杂记》，郑秉珊的《八大与石涛》等。其它如曼昭的《南社诗话》，瞿兑之的《宾虹论画》，拙鸠的《记吴北山先生》。刊成单行本的有好多种，称为《古今丛书》，如《蠹鱼篇》、《往矣集》、《一士类稿》都是。

《古今》停刊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文史》创刊，由文载道主辑，风格和《古今》相仿。封面为汉武梁祠画象，弥饶古泽。内容有纪果庵的《卧读琐记》，陈旭轮的《关于黄摩西》，何挹彭的《读涧于日记随笔》，何梅岑的《读书曝谈》，傅芸子的《读东京梦华录随笔之一》，包天笑的《钏影楼日记》，听禅的《谭良赍臣及其它》，颜不违的《垂虹桥史话》，瞿兑之的《铢庵札记》等。可是，只出三期，又复以折耗停刊。

《社会日报》和《社会月报》

《社会日报》，在小型报中算得是佼佼者，创刊于一九三〇年。最初由胡雄飞、姚吉光、陈灵犀、吴农花、黄转陶、冯若梅等十人合办，后归胡雄飞独办，陈灵犀任编辑。陈名听潮，广东潮州人，每天撰一短隽的散文，标题为《猫双栖庵随笔》。排日连载的，有合肥李鸿章后人李伯琦的《瓮牖杂缀》，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配了许晓霞的画，颇生动有趣。那时风行的社会小说，描写的背景，大都是中层社会，汪仲贤熟悉下层社会，所作的确别开生面。他艺名汪优游，是演新剧跑五湖四海的。其它尚有潘勤孟的《佩弦随笔》，唐云旌的《高唐散记》，都很精采。

《社会日报》既拥有大量读者，又蜕化出了一个《社会月报》，由陈灵犀主编，江栋良任图画编辑，胡雄飞负责发行。每期十余万言，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开场白称为《第一句话》，略云："社会上有值得讴歌的，我们把它写出来；社会上有应该诅咒的，我们也把它赤裸裸一丝不挂的写出来。在这里有用怜悯与恐怖去涤清人的灵性的悲剧；有用理智或取笑去惩劝人的道德的喜剧。我们正好比唱戏的伶人，在戏台上当着观众的面，将人生表现摹仿出来，让观众自己去认识，自己去判断，自己去讴歌，自己去诅咒，自己去作结论。俗语说得好：'做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我们诚然是个疯子，但不知道诸位也愿意做傻子，来听我们说疯话吗？"报的内

容和风格，于此可见一斑。

卷首有风景照及滑稽讽刺画，这种画，大都出于胡考手笔。铜版图，有王瑶卿十五龄造像，旁有李释堪题诗。还有齐白石所绘的苍鹰，高奇峰所绘的花桥烟雨，以及社会动态照。每篇文字后面的空白，也用插画填补，执笔者，有丁悚、丁聪、江栋良、胡同光、张英超、陈静生、程柳桑等。

该刊没有长篇小说，仅有较长的散文，如洪深的《浙东寻画记》，汪优游的《我的俳优生活》，阿英的《现代小品作家论》及《二修尺牍》、《跋王百穀全集残本》，徐行的《民歌中的恋爱故事》，张六畴的《龚定庵诗词中的恋爱故事及其它》，杨霁云的《一部大众语写成的小说〈金瓶梅〉》，曹聚仁的《文心雕龙幽默的表现》，徐仲年的《十年如梦忆巴黎》，李青匪的《一络头发》，圣旦的《清代的几位农民诗人》，杨邨人的《白日之梦》。其它短作有姚苏凤的《第一次导演》及《银坛述旧》，大风的《萧伯纳的情人》，陆丹林的《革新鼎故的广州》，了因的《沧桑杂话》，沈端先的《外国话与本国话》，黎锦晖的《壁上观》，史东山的《日游杂感》，郑正秋的《姊妹花的自我批评》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停刊，共出六期。

上海最早的报纸——《上海新报》

上海发行的中文报纸，如《申报》、《汇报》，一般认为是办得很早的了。实际上还有比它们更早的报纸，这就是《上海新报》。《上海新报》创刊于前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申报》的发行，是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汇报》更在《申报》之后。

《上海新报》，是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由英美传教士伍德、林乐知主编。每二日出一纸，星期日停刊。新闻大半译自《字林西报》，余则转录《京报》及香港报纸，当时有些销路。《申报》一出版，该报亦改为日刊，且减低报价，刷新内容，与《申报》竞争。报首画黄浦江风景，以代表地方特色。此后《申报》挽人和该报相商，说两报同系英人所办，何苦相煎，字林洋行亦以经营外文报纸，事务很繁，即自动停刊，然已有十年报史了。现在上海图书馆尚珍藏了国内仅存的一份。该报年久纸脆，不耐翻检，故已摄成显微胶卷，以便读者阅览。报上除广告新闻外，也登载些论说、随笔之类的文章，且经常登着征文启事，如云："华人如有切要时事，或得之传闻，或得之目击，无论何事，但取其有益于华人有益于同好者，均可携至本馆刻登，分文不取。"有时编者还特别声明："华友如有切要时事及有维持风化之篇者，务请送来，即当代印，专此鸣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到所谓稿酬了。

该报创刊号，刊登了字林主人的启事，阐述了办报的目

的:“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因而印此《新报》。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它把商情船期放在重要地位,国政军情放在次要地位。表面看来,它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报纸,但它的真正用意,是利用报纸为外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服务。这时恰巧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所率领的太平军,从浙江直趋上海。如果上海失守,帝国主义就将失去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因此该报在言论上力助清廷,反对太平天国革命,污蔑它为“发逆”、“贼匪”。而且勾结外国传教士,利用他们深入太平天国占领地区,以传教为名,行侦察之实,探得很多消息,在报上作歪曲的、恶意的报道。这种报道,从反面来看,也不失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份参考资料。

《上海新报》是小型的,高四十厘米,阔二十九厘米,用瑞典纸两面印,和早期的报纸都用油光纸或毛太纸单面印的不同。那时印刷机技术还很落后,该报是用手摇印刷机印的,印数不多,每期只印数百份。

陈撷芬创办的中国第一张女子报——《女学报》

清末，一些进步女子提倡女权，因此刊行了女子报。女子报中有名的是《女学报》和《中国女报》。有人把这两张报纸误为一张，那是不对的，因为《女学报》创办在前，《中国女报》刊行在后。《女学报》是中国第一张女报，那是陈撷芬创办的。《中国女报》乃秋瑾所创办，年份较后。

亡友张静庐考证说："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应该是《女学报》。它创刊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系当时《苏报》主办人陈梦坡（范）之女陈撷芬所创办，自设女学报馆编辑所，每月发行一期。初出版时用薄纸单面印，随《苏报》发行，所以又有人称它《女苏报》。第一年的《女学报》，原报已不易看到。第二年开始用报纸两面印，改装封面，添印图画，每期约六十页。内容分插画、论说、演说、女界近史、译件、尺素、词翰等栏。这个改订本，目前国内也只有南京图书馆和四川图书馆有藏本。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说："其时提倡女学与女权者，乃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之《女报》，为《苏报》主人陈范之女撷芬所创办。"据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的回忆："那时随《苏报》发行的，是《女学报》，未闻有《女报》。"所以戈氏这里所称《女报》，想即系《女学报》之误。项士元在《新闻史》一书中说："上海之有女子报，始于一九〇三年（恐系一九〇二年之误）陈撷芬女士之《女

学报》。女士为《苏报》经理陈梦坡之女，社址设派克路第七百〇三号。但据第二年第一期《女学报》载，该报编辑所（即女学报馆）设上海新马路华安里，发行所（即苏报馆）设上海三马路”。

《女学报》的言论是很激烈的，如《独立篇》中说：“呜呼！吾再思之，吾三思之，殆非独立不可。所谓独立者，脱压力，抗阻挠，犹浅也，其要在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涉。……吾视男子亦徒能骄其妻妾耳。大官则受制于朝廷，小吏则受制于大吏。今且举朝廷大官小吏百姓而悉受制于外人。”又如刊载一位日本妇女福田英子给中国妇女薛锦琴的一封信说：“考欧人之东侵，以千四百九十八年发斯科达加马之到达印度为嚆矢，自是而后，或建设社会以督殖民，或调遣远征，以略土地，始占岛屿，继夺港湾，终窥大陆。今则骎骎齐向贵邦遄征矣。彼等自维也纳会议以后，而武式平和之政策出，遂以权术易干戈，以狡谋代弹剑。角逐凌轹，继昼以夜。今则万马骈蹄，万众齐视，以直冲我东亚大陆，充其贪婪无餍之欲。……呜呼！欧人之骄横暴厉，岂可不痛心切齿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至于秋瑾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编辑为马伯平，只出两三期即停刊。

关于《苏报》案

《上海近代历史故事》刊行了若干册，其中有《苏报案故事》一书，尤为喜谈当时革命史者所争购。为反对清政府而酿成文字狱的《苏报》案，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中占据重要的一页。现就我所知，为《苏报案故事》所未及的，把它写在下面：

《苏报》本是胡铁梅所创办，用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出面的，在前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出版，戊戌政变后才让给陈范主持。该报是用有光纸印的，每天发行一张，有时加一附刊。报端横列着从右而左的《苏报》两隶书。馆址本在棋盘街中（今河南路），后来由于业务发展了，便搬到汉口路二十号。

陈范是湖南衡山人，做过江西铅山县知县，因办教案削了职，才住居上海。他痛恨官场的腐败，很想用清议来警惕官吏，挽救中国。他原本是保皇党，但后来思想逐渐转变，由保皇而反对清政府。他接办《苏报》之后，报上充满革命色彩，如云："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快心"。"辫发左衽之丑类"（左衽是衣襟在左面的服装）。"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主人翁，而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大耻奇辱，孰过于斯"。"杀尽胡儿方罢手"。"驱除满族，光复中国"。当时邹容出版了《革命军》单行本，《苏报》大事宣传，谓"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又称该书为"今日国民教育

之第一教科书”。诸如此类的激烈辞句，使清廷大为震怒，即令上海道袁海观查禁密拿，并委俞明震和袁一同向租界领事交涉。结果巡捕房出了拘票，到报馆去抓人，那拘票上所要抓的七人是陈范、陈梦坡、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其实陈范字梦坡，巡捕房误为两人。程吉甫、章炳麟、钱宝仁、龙积之都被逮捕，邹容旋亦入狱。章炳麟监禁三年，期满后被逐出租界，邹容病死狱中。陈范的儿子仲彝也吃了官司。陈范早已跑掉，过着亡命生活，妻离妾嫁，子夭孙殇，抑郁成病，且时常有断炊之虞。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六日，他就去世了。

陈范生前名号很多，除梦坡外，还有梦逋、忆云、叔柔、锡畴、瑶天、老蜕、蜕僧、蜕庵等等。某年他病危时，住在同乡友人史采厓的西山蕨园中，他关照史采厓说：他死后把遗体葬在红拂墓旁，所著《夜梵集》残稿亦交给采厓保存。可是他那次没有死。后来逝世以后，他的许多遗稿，由采厓和陈范的妹婿汪兰皋重行整理，柳亚子、傅屯艮出钱助刊，名《蜕庵诗词刊存》。但由于印得不多，又为非卖品，外间很难找到。他能画几笔梅花，画了题诗，随意给人，是十足的文人画，没有章法可言的。在南社中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社友。

《苏报》不但反对清政权，而且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文，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如一八九八年刊载了一篇白话文运动的积极鼓吹者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洋洋洒洒，凡二千五百余言。裘文说：“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廑廑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汶汶如斯矣！”又云：“愚天下之

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又提出白话文的益处说：“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科学问之崖略，视今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又“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这些言论，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章炳麟当时反对清政府的言论是相当激烈的。他被逮捕之前，已先有风声，有人劝他出走，章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第七次了，还怕什么！”后来巡捕来捉，他激昂地说：“他们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说时自指其鼻。下一天，邹容自己投案，由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共同宣布，章炳麟判刑三年，邹容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邹容积愤成病，狱中印警虐待他，他与之角斗，因此虐待更甚，加之体弱，在监禁期满前两个月瘐死狱中。也有人说是被毒死的。章炳麟罚作缝工，于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并摄一囚服照以留纪念，即日东渡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继续斗争。

自炳麟、邹容等被捕后，《苏报》也被封，章行严、陈巢南等续办《国民日日报》，蔡元培等办《俄事警闻》，不久扩展为《警钟日报》，江苏、浙江的留日学生，办《江苏》、《浙江潮》，继续鼓吹革命，大大地削弱了妥协性的改良主义思潮。

两位老报人谈《申报》

《申报》具有七十七年的历史。该报老报人徐忍寒，曾写过《申报七十七年大事记》，它只是概括性的一个轮廓。已故的《申报》老报人黄式权所写的《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和张蕴和的《六十年来之申报》，这两篇虽不全面，而且凭旧观点旧立场来论人衡事，但作为资料，还是很有一些参考价值的。兹把黄式权的一篇，节录在下面：

“民国纪元前四十年，上海始有《申报》。《申报》创自英人美查，而延华人蒋君芷湘主笔政。其始间日出一纸，印以中国毛太纸，篇幅固甚狭小。所载多诗文之类，间及中外近事，类皆信笔点缀，如传奇小说然，人皆不甚重视之。四阅月后，改为日出一纸，而销路仍未扩充。越年，台湾生番戕杀高丽人，日本兴师问罪，美查竭其精力，四出采访，务得真情，载之报章，无隐无饰，由是人知新闻之有益，争先购阅，日销数千张，而美查之精力亦已竭尽无余矣。旋见销数日增，声誉亦日盛，乃易毛太纸为赛连史纸，冀得多载新闻，而朝廷谕旨及新闻之紧要者，皆用电报飞传。斯时蒋君已高捷南宫，继其任者，为钱君昕伯，举信笔点缀之有类传奇小说者，一一淘而汰之，美查亦能用其言，事事听其裁夺，而《申报》之事业益振兴。洎越南用兵，与法开战，他报皆讳败为胜，以掩一时之耳目。美查则雇一俄人随法营探报，既详且确，备录无遗，而无识者反谓偏袒法人，几以《申报》为集矢之鹄矣。是时与之相角者有《沪

报》，《沪报》专用笼络阅者之法，《申报》独守正不阿，自石浦沉船，基隆失地，华军之懦弱不任事，几于道路皆知，而《申报》之冤乃得大白于天下。是时《申报》销数益畅旺，求登广告者，户限几为之穿，篇幅有限，则扩增附张，以载邸抄及广告之常登者，而易赛连史纸为外洋机器纸，盖以赛连史纸来路常中断也。阅岁，美查欣然曰：'我之心力已瘁矣！我之名誉已扬矣！我以《申报》所获之利，添设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燧昌火柴厂、江苏药水厂，已次第告厥成功矣。急流勇退，正在此时。'乃将《申报》馆改为公司，已则航海归故国。公司诸务委芬利及阿拍拿二君代之，二人皆英国籍，美查同乡也。厥后继《申报》而起者，有《新闻报》、《苏报》、《中外日报》、《华报》、《指南报》、《苏沪汇报》，或随起随仆，或若有若无，其足步《申报》后尘历久不敝者，独《新闻报》一家，然亦数易其主矣。中间所经大事凡三，曰中日互战、曰康梁变政、曰日俄交讧，每经过一事，则见识必高一层，生涯必旺一倍。计馆中先后主笔政者，为蒋君芷湘、钱君昕伯，昕伯谢事，以不才承其乏。襄理笔政者为蔡君宠九、蔡君友佛、胡君桂笙、姚君竹君、沈君饱山、张君筱轩、钱君明略、赖君慧生、刘君鹤伯、金君剑花、雷君君曜、赵君孟遴、潘君正卿、黄君宪生、沈君宾价。总理译务者，为毕君礼纳，副之以董君筠孙。总司会计者，为赵君逸如、席君子眉，子眉死，其弟子佩继之，此皆西人为馆主时事。及清光绪乙巳春（一九〇五年），不才以病废，辞出。越一年，即由华人为馆主，而余以局外人不复知此后事矣。"

张蕴和的《六十年来之申报》一文，对于美查更有显著的袒护，而美查当时的笼络人心，蒙蔽手段，于此亦可见一斑。兹节录该文于下："余为便于叙述计，援古人三十年为一世之说，

即划六十年之《申报》为两世，而余之入馆服务，则已届一世，故《申报》前一世中所经过之事实，余得之耳闻，而后一世所经过之事实，则多目见。余姑先述所闻于人者。

"当前清同治之末……资本主义之先进国，见我国内民生渐安，秩序渐定，以为发展其工商业之机会已至，各挟其长袖善舞之手段，来华竞觅市场，于是有英人美查者，在沪创办公司，经营江苏药水厂、火柴厂、集成图书公司、点石斋等，而《申报》即其所营事业中之一部分也。美查办报，在我人今日观察，必谓其有何种野心，或欲借以操纵舆论，或欲借以侵略文化，然在当时之美查，确未有此种深意，不过视为营业上之宣传而已。故自创办《申报》以后，一切俱委华人经理，初执笔政者，为蒋芷湘，继为胡桂笙、钱昕伯等，其时我国民虽经极大之内乱，外力之渐加压迫，而初未稍悟，喘息稍定，即以此为可以太平无事。政界中人，奔走仕途，雍容揄扬，以博取富若贵，莘莘学子，则仍迷溺于科举，除毕生致力于帖括外，无他事业，举世以粉饰升平润色鸿业为事。其时所谓知识之士，怀才不遇者，既无他途可入，复不敢议论朝政，则往往借风月笔墨，游戏文章，以抒写其抑郁无聊之意，《申报》在此时代下产生，执笔者自不能不以迎合社会心理，为编辑标准。故当时报纸所载，略可纪述者，一为谕旨宫门抄等，以备官场之浏览，一为大小考试之文章题目，以备学子之揣摩，一为诗词歌曲，以备名流文士之推敲，一为盗命火警及一切狐怪异闻，以备一般人茶余酒后之谈助。此种报纸，当时社会上颇认为适合需要，而乐于购阅，于是《申报》之声誉日广，营业亦蒸蒸日上。办报者既以此为满足，故绵延历若干年而绝鲜进步，然而其时之国政，冥冥中已日非矣！文耽逸乐，武习游嬉，纪纲不举，已达极点，外祸压

迫，亦日渐加甚，至甲午中日开战，我国大败而后，全国人心始为一震，戊戌政变，大杀党人而后，人心又为一震，庚子义和团乱，联军入京而后，人心又为一震。国人经此三次激刺，革命思潮，勃然而兴，人心趋向，为之一变。在此新潮酝酿之中，报纸之应运而起者，若《时报》占学界一部分势力，《中外日报》占政界一部分势力，《新闻报》则占商界一部分势力，以与《申报》竞争。而《申报》斯时之执笔政者，为黄君式权，黄君昧于时势，犹牢守其往昔成见，对于戊戌政变，则斥康梁为叛徒，对于甲午战败，庚子拳乱，亦未敢直揭其责任所在，于是《申报》渐为阅者所不满。时襄助黄君笔政者，为青浦金剑花、松江雷君曜，两君见形势渐非，必须迎合新潮，改变主张，争于黄，黄不允，乃言于报馆当局，当局曰：'报纸销路虽略减，然广告之收入犹是也，何亟亟焉！'然不数月而广告之收入，亦即一落千丈。于是报馆当局始大惊，亟谋于金、雷，商所以改革之法，乃由金、雷两君为之切实筹画，论说如何改变态度，电报通讯如何整理，本埠访员如何搜罗，编辑人才如何选聘，报纸形式如何刷新。拟议既定，第一步即由报馆当局辞退黄君，委金君继任，总持笔政。时余甫游日本返，金、雷两君，坚邀入馆撰论，余允之。金君将内外事一一布置既毕，遂于乙巳年春，宣布实行改革，社会对《申报》之观念，顿为一变。故自庚子拳乱后之数年（即余所谓第一世之末年），为《申报》最危险之时期。至第二世初年，而《申报》始入坦途。

"当康梁变法之际，新学说新政论，杂然并起，新旧斗争，愈益剧烈，斯时之《申报》，虽渐为人不满，然政府方面及一部分人，犹认《申报》为老成持重，不为邪说所蔽。及《申报》论调，亦突然改变，于是此一部分人，皆相错愕，谓诚非变法自强不

可矣！故自《申报》改革而后，其言论纪载，益为世人所重视。昔之厌弃《申报》者，今皆争相购阅，销路亦顿改旧观。在此第二世之初期，第一大事即为日俄大战，俄为日败而后，日人益复不可一世。余适此时游日，亲见其国内，一方注重革新政治，一方注意整军强武，故入馆而后，即连日著论，陈述日本政治教育工商等种种发展之原因，与此次所以胜俄之故，虽所撰述，并非有精深独到之处，文字亦无足观，但此区区警惕国人之心，亦颇为世人所同情。此为余入馆后最初工作之大概情形也。

"斯时《申报》于编辑部方面，既已逐渐整理就绪，惟报馆主权，尚操于外人之手。金、雷两君以现在公司大班，虽于中国政情隔膜，不大干涉，然以一国之舆论机关，而为外人所左右，不能自由独立，则甚危险，乃力促华经理席子佩君，向西人交涉收回。(时公司大班美查早已回国，继任者为英人阿拍拿，翻译为葡人毕礼纳)，公司大班商之于各董事，允以七万五千元之代价，将《申报》馆全部产业让于华人，即由席君与之订约，时为西历一九〇八年，即光绪末年。《申报》至是，始完全入于我华人之手。同人见交涉成功，益自奋励，而金、雷两君，则功成身退，飘然远引，由余代主笔政，勉为维持。翌年余暂离《申报》，席君旋复邀余入馆，甫加部署，而辛亥革命之役，突然发动矣！当时清廷尚欲以预备立宪设立资政院等，敷衍国民之耳目，但人心已去，无可挽救，故自武昌义旗一举，而全国响应，报告各省独立之电，纷如雪片，报纸全部几皆为革命消息所占满。时沪上各报之内地消息，尚不如外报之灵通，故各报除将自得之电讯揭载外，复尽量翻译西报，以资宣传。一日，本报偶译载一汉阳失守电，民众见而大哗，疑为捏造，声势汹

汹，几与本报为难，时适本馆之专电亦至，乃将原电出示始已。可见当时仇满民气之激昂，已达极点，而又加以报纸之尽力鼓吹，故革命成功，得以如此之速，《申报》追随各报之后，亦甚努力也。

"翌年，民国成立，全国充满革新之气象，人民欣欣然翘首企望于前途之发展者无穷，而《申报》亦适于此时易主，史量才入馆为总理，聘陈景韩君为总主笔。史君入馆后，筹画一切行政事务，并罗致尽心办事者数人为助，将馆务次第扩充。陈君则将编辑部事，逐渐整理，故斯时之《申报》，更有欣欣向荣，大踏步向上发展之势。然不料民国成立之后，政局不定，困难问题纷起，始终未能实现统一。其间因袁世凯称帝，而有云南起义之役，因督军团专横，张勋乘机复辟，而有马厂誓师之役。段阁秉政，南北意见愈深，衡阳发难，西南揭护法之旗，徐氏继起，日谋武力统一，拚命借债，民怨沸腾，因有直皖之役。未几，因徐氏运用阴谋，欲借武人政客之挑拨离间，以坐收渔人之利，因是又有奉直之役。国内分裂愈甚，政治愈非。至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几已成南北统一之局矣，然而不旋踵国民党又自起内讧，互相攻击，连年战乱，以迄于今。计自民元以来，南与北战，南北又各自为战，党与非党战，党与党又互相为战，年年继续不断，已不能举其次数，由是国内商业凋敝，金融枯竭，民不聊生。且报纸之所借以推行者，铁路之交通，然每战一次，交通即断绝一次。报纸之所赖以发展者，电讯之灵敏，然每战一次，电讯即被检查一次。试问我报馆处于此种状况之下，如何能谋发展？况自近数年来，因政治不上轨道之故，党与非党，凡占有一部分势力者，无不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苟不如意，则叫嚣狂跳，声势汹汹，应付尤为困难。从前

之压迫报纸者，不过政府军阀而已，今则压迫方面正多。惟幸陈君景韩，思想精细，判断敏速，遇事负责任，不稍屈挠，故其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机消弭，安然而过。史君量才常谓陈君把舵稳健，在此狂风骇浪中，能使我舟不受颠簸，不虞倾危，甚不易也。”

按黄式权与张蕴和两人之言，颇有出入，黄工作在前，张在后，张所听到的，决不及黄目睹的更为可靠。此外尚有陈景韩的《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史咏赓的《申报二万五千号感言》等等，都是《申报》过去情况的纪载，这儿不再赘录了。

《申报》为什么宣传杨乃武案？

最近在友人处借得前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所发行的《申报》若干纸，距今已逾百年。当时所谓"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案，连篇累牍的载在该报上。其中有一篇题为《审余杭谋夫案出奏》一文，说："胡侍郎承审葛毕氏案，本报历将各情登报，兹因地保邻右及药店钱宝生，均已各照前情，招认画供，惟杨乃武总称冤枉，葛毕氏总谓夫因债逼自死，并未谋害。侍郎业经设尽各法，进行测探，总莫得其风息，以不敢严刑拷问，至有冤枉莫白，故在辕如此之久，然录遗不能再迟，侍郎当于十八日返署，十九日开考，恭具奏覆。折内约言，各犯并照前供，招认不讳。正犯狡诈异常，翻覆不一，惟此案历经控诉，承命提审，不敢不秉公研问确情，若用刑讯，恐仍陷于冤屈，若依正犯供词，而余犯何又照前具结，揆其情理，显系惧罪改供。然正犯究未画供，亦难就此拟结，尚求圣裁。由此观之，或另简大员会讯，或仍派侍郎严讯，将来必期水落石出也。"另一篇《杨氏案略》云："昨有浙省人来，谓余杭杨氏一案，已经绍兴府龚太守，会同湖州府锡太守及陈许二明府审问，计共十五次矣。其所问口供，仍照初讯时各人分写藏诸袖内。现闻此案似已审结，盖锡太守已赴本任也。但此案之翻与不翻，外人无从得悉，大约事关重大，须两太守密禀上宪，然后覆核而出奏耳。"

案情揭载，不胜备录。为什么该报对于杨乃武案要这样

大事宣传呢？这是创办该报的英国人美查别有用意的。原来领事裁判权，为外国人在华享受的特种权利，美、英、法等国强迫我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如中美条约云："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此后除平常领事法庭以外，尚有特设正式法院，或由公使或使馆馆员组织法庭，以为行使裁判权之机关。外国人在我国而有特殊审判之权，这是对我国国家主权的破坏，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国人民的反对。于是他们就抓住杨乃武案件，说中国司法是怎样的黑暗，刑罚是怎样的残酷，非外国人所能忍受，云云，弦外之音，就是非推行领事裁判权不可。美查所办的《申报》自然不遗余力地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它用特大的篇幅，连续刊载，接着又登了两篇污蔑我国法律的文章，其用意所在，也就昭然若揭了。

现将《论中西礼刑不同》一文摘录如下："中西各邦，国家之事，其彼此大相径庭者，莫如礼刑二事。中国失之太繁，西国则失之太简，不能苟为同，亦非故为异，实相习既久，遂积成为俗也。中国见西人之简于礼刑也，常欲西人从其繁，西人不愿也。常欲中国效其简，而中国亦不愿也。此皆囿于一偏之见，而不能归于至当之理，故至于彼此纷纷议论，几如聚讼也。……昔者中西未通，彼此之礼刑，均无由知，今则中西通问矣，彼此之礼刑，均能悉其梗概。前者东西两洋遣使来贺，因议跪拜之礼，迁延日久，后蒙穆庙大度包容，俯允所请，东西之臣，无不感悦。今闻英公使与李伯相约，彼此交接，宜减仪文，伯相亦许之，可见圣君贤相，无不体恤人情，并不强人以从己，盖亦深知中国之礼繁而难行，故就西国以从简，庶免彼此有失

礼之处也。至于中国繁刑之处，亦西人所未经见也。故常有西人往观中国演戏，皆笑谈曰：一案犯初不招则批其颊，再不招则杖其臀，复不招，男则夹其腿，女则拶其指，而犯人招矣，而重案定矣，竟已习为故事。其中之得实者，何尝不有，然冤抑者亦未尝无也。初则谓此不过演戏耳，不料后见官场讯案，亦复如此，始知中国今亦不异于古所云也。虽然，此特西人就其所得见者而言耳，尚有所未见者。……惟有圣君贤相，尚能舍己以从人，其他则不能也。然不能强人以共行，亦不能禁人以不言也。若欲强人以共行，更欲禁人以不言，岂非难事哉！故致纷纷议论，几如聚讼而不已也。……”

以上云云，很明显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讲话，授意华人编辑而狡诡出之，目的是为推广领事裁判权制造借口。（按：文中所云穆庙，指同治帝而言。李伯相，指李鸿章而言。）

《申报》随报附送的画刊

民国初年，上海《民立》、《民权》等报，都附有画刊，随报赠送，《申报》也不例外。这种画刊，是用有光纸单色石印的，每星期赠送一张，概不零售。担任绘画的，有张聿光、钱病鹤、汪绮云等，大都为人物、仕女、花卉、翎毛，以及时事讽刺、戏剧速写、西洋风景胜迹等等。日子久了，读者觉得单调，不感兴趣，报馆方面徒然多一笔开支，索性把它停掉。

直到民国六年，英国人把影写版印刷物带来我国，在上海发行一种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作宣传的刊物，名为《诚报》，并附影写版画报，非常清晰，又很美观。我国印刷界看到了，很觉新奇，颇以未能仿制为憾。民国十二年，日本发生地震，东京一家规模很大的影写版印刷公司被灾遭焚，该公司一德国籍技师海尼格(F. Heinicker)想回国。这个消息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知道了，立即电招来华，便开始办影写版印刷。先行试印《东方杂志》的插图，效果很好。后来海尼格和人合股，另设中国照相版公司。民国二十一年，《申报》的史量才刻意经营，与该公司订立合同，发行《申报图画周刊》，完全用影写版，共出八十一期，适值"一二八"事变发生，《图画周刊》暂行停止。到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画刊》又复继续发行，改为每周两次，星期一星期四随报附送。正面为褐色，反面为蓝色，很觉新颖。它征稿分为两种："(甲)时事照片、突然发生之事件、群众运动、集会结社、名人行动、各地新建设、农工状况、

学校生活、社交界、妇女儿童与家庭、华侨与留学生、有关中国之国际活动。(乙)学艺照片、考察旅行、研究发掘之有系统介绍者、图画雕塑建筑服饰之有时间性或艺术价值者、其它凡是足以引起大多数人之注意或观感者。"下面附有一项:"本市或附近交通便利之处,遇有特种事件,如因地位机件或其它原因不便摄取者,来函或电话通知本部,非常感盼。"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它的取材和资料发掘的一斑。

那时的所谓画刊,实际上称为照相刊较为确切。因为除吴湖帆、程瑶笙、徐悲鸿、贺天健、俞剑华、张充仁、许士骐、张聿光、陶冷月、张小楼、高剑父、楼辛壶、赵俊民、李秋君等几幅山水、花卉、人物、走兽外,其它都是照相。三分之一是国民党宣传反动政治的照相,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其余大多数则是具有历史性、文物性、艺术性的作品,值得回忆和欣赏。如《续范亭忧国自杀及绝命诗》、《梅兰芳赴苏俄演剧》、《旧时之洛阳桥》、《张善子所蓄虎》、《天目山之九抱松》、《山东蓬莱阁之庙会》、《嵊县王右军墓》、《赛金花六十时寓居北京小巷中》、《藏人欢迎班禅回藏》、《广州瓶花盆栽比赛》、《西安轩辕黄帝陵墓》、《高尔基及章太炎逝世》、《苏联版画展览》、《最近由港来沪之革命耆宿尤烈》、《马相伯之徐家汇寓所》、《上海文化界协会欢迎离国十年之郭沫若及救国会七君子》、《史量才被刺在沪殡仪及遇害处》、《莫斯科中国画展》、《刘半农逝世》、《祭孔之干羽舞》、《历代钱币展览会》、《蒙古成吉思汗陵寝》、《湖北古物博览会》、《唐绍仪北上》等,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又《北平学生之救国运动》、《新华门前请愿》,以及《抗战开始上海华界居民纷纷迁入租界以避日军暴行》、《日人在绥之特殊机关松田公馆》、《广州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前之纪

念铜像»，使人看了为之触目惊心。鲁迅先生逝世时刊登了好几帧照片，如鲁迅遗容、各界人士在万国殡仪馆、鲁迅夫人许广平在万国殡仪馆接见新闻记者。此外有广西龙州七十七岁老人韩六叔手持大刀所留之影，据说，韩六叔是前清冯子材的部属，曾用这把大刀斫杀外敌。又岳阳楼遥望洞庭湖，水波杳渺，远帆出没，对此也就令人缅怀唐代诗人杜少陵咏"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情景。

该刊的篇幅，是全张的二分之一，逢到元旦及有关节日，那就扩大为全张。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侵占上海后停刊。该刊共出二百六十五期，主编为戈公振。

《申 报》的 收 藏

据石鸣同志《记一套较完整的申报的收藏经过》一文，对《申报》的收藏，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兹把该文录存于下：

“《申报》是一份在旧中国创办的历史最久的报纸。它从一八七二年四月创刊起，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停刊止，前后七十七年。这份报纸是一个英国商人创办的。几十年间辗转易手，最后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喉舌。它经历了大半个旧民主主义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记载了有关这个历史时期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保存了大量史料，对研究我国近百年史，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反动统治时期，不注意图书资料的保存，现在要找到全份《申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国内收藏比较完整的《申报》，大约有四份，其中三份在上海。比较最完整的一份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这一份所以能够完整保存，是有一段过程的。这种年代较长的报纸，要使它尽量保住完整，先要知道它不完整到什么程度。缺年缺月是很容易了解的，但要知道缺哪一天哪一张，就得把七十七年的报纸逐日翻遍。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上海图书馆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协助下，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查清了这份《申报》共缺三百四十六天，其中缺全天的二十四天，缺张或缺附张的三百二十二天。他们摸到了底，下一步就千方百计地去搜残补缺。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各种旧报纸达一千三百种，要从这大量的报

纸中搜残补缺，不知道要花多少心血，图书馆员潜心搜寻，发现一张所缺的《申报》，就把它抽出来配上去。有一次，上海图书馆收购到一批名人书简，书简原稿一张张粘贴在《申报》上，仔细揭下来，发现其中有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二日（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的《申报》附张，正是该馆所缺少的。这时，图书馆员欣然色喜，不禁也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说是不费工夫，实际上这种工夫是日积月累，费了很多的。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来的搜集补充，这份《申报》到现在为止，原缺三百四十六天，已补齐了二百四十七天，尚缺九十九天，其中缺全天的仅四天，其余仅是缺正张或附张。它和其它几份比较起来，是目前国内最完整的一份。可以预料，通过图书馆员们的辛勤劳动，它就会逐渐达到一张不缺的境地。

“现在，这份《申报》妥善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由于这套报纸历时很长，年代较前的一部分，纸质逐渐发黄变脆，因此更要好生保护，原来图书馆把它放在楼下书库，但地较潮湿，以后移到二楼，又发现通风有毛病，四楼干燥，可惜光线太强，都对保护报纸不利。最后才又搬到三楼一间光线、温度较适宜的房间内。七十七年的报纸，按月合订成本，每本用特制的纸盒装好，整整齐齐地摆在报架上，占据了满满一房间。在这个藏书楼上，书库里每天开关窗户，都很有讲究。晴天，上午十点开窗，下午四时关窗；北风开南窗，南风开北窗；大风不开窗，阴雨不开窗，黄梅天不开窗。这是为了把这些有用的图书资料保存得更长久，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科学工作人员明了这一点，来徐家汇藏书楼借阅各种报纸时，总是极为当心，避免有丝毫的损坏；但有时候，也碰到个别读者比较粗心，飞快地翻动着报纸，或者把两肘紧压在报纸上，天

热时，肘上的汗水就把报纸浸湿，图书馆员看见这些情况，真是心疼，禁不住要上去和这位读者啰嗦一番。为着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需要，这种啰嗦，看来也是完全必要的。”

按《申报》有七十七年的悠久历史，保存全份，的确谈何容易，不要说现在缺张缺页，就是较早在一九一二年《申报》四十周年纪念时，存报已七零八落，无复全璧。《申报》老报人徐忍寒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一书中，有那么一段记载：“当《申报》发行满四十周年时，以历年报纸，庋藏不全，悬格访求，初无应者。久之，张君仲照乃以所藏本报全份，自创刊至宣统三年辛亥止见赠。君隐于沪南，初未相识，既举以慨赠，且题辞曰：‘是报记载详备，立说纯正，日月无尽，报亦无尽，吾年老矣！不幸一旦淹忽，儿孙辈岂必持之恒而藏之慎，与其遗放散失，贻他日忧，孰若举而归之，俾与此报同永。’君诚爱《申报》者，既有恒心毅力，又有成美义举，堪为《申报》唯一老友。《申报》征得张君玉照，刊诸五十周年纪念册首，藉资景仰，并祝君永寿。”那么现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这一份比较完全的《申报》，当然应归功于张仲照同志的捐赠。很希望今后还有象张仲照同志那样的报纸收藏家，给缺九十九天报纸补全无缺，那不是一桩可喜的事吗！

（附识：1982 年春，我曾向上海图书馆藏书楼询问有关《申报》收藏事，据其覆函云：“我馆确实藏有一套《申报》，但由于收藏的年代悠久，其中有些破损较严重，尤其民国初年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报纸，我馆是一概不借阅的，等待以后全部摄成胶卷，再供查阅。另外，整个《申报》，其中还有缺日、缺版的情况，虽近年来稍有补充，奈迄未补全，尚须努力进行，俾得早日完成全璧。”）

史量才被刺及其他

凡谈到《申报》，总要涉及史量才。的确，史量才和《申报》的关系太密切了，他所起的作用太大了。《申报》老人冯亚雄曾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中，写有一篇《申报与史量才》。内容非常详细，可是篇幅太长，不可能把它全部抄录下来，故节录并加剪裁如下：

“《申报》为清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年）英人美查集资一千六百两所创办。当时执笔政者为蒋芷湘，华经理为席子眉。席病故，由其弟子佩继任。后美查因事回国，将《申报》全部让与席子佩接办。入民国后，上海已有大型报纸五、六家。《申报》创立虽早，业务并无进展。席颇有厌倦之意。那时史量才欲集资接办，结果双方订立转让合同，代价十二万元，分三期付清。史接办后，自任董事长，仍任席子佩为经理，另聘陈景韩为总主笔。另派冯子培为会计部主任，王尧钦为广告部主任，许灿庭为发行部主任，黄炎卿为庶务部主任。自此报馆业务渐有起色，销数逐渐增加。又复适逢上海交易所蓬勃发展，《申报》销数亦因而大增，每年盈余，可达十万元左右。

“史量才原籍南京，寄居松江泗泾镇，为前清秀才，他进学以后，抛弃科举，研究新学。但因家无恒产，不能长期困守，乃在二十岁时来沪，在南洋中学任教，嗣即创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又在广方言馆任理化教师，兼授生理学。辛亥武昌起义时，史对各方面均有相当联系。在上海革命尚未发动之初，同

盟会江苏支部长章梓曾向史商借女蚕校为攻取制造局的前线集中点，及陈英士出任沪军都督，史大肆活动，当局有重要会议，往往被邀列席。当时上海名妓沈秋水有一恩客陶保骏，系清直隶候补道，曾由端方委充南京军务要职。辛亥革命时，陶挟其所贪污的军饷十数万元来到上海，寄迹于沈氏妓院，随身携带钱衣两包，交沈暂为保存。陈英士探知陶有乘机割据镇江，自任镇江都督企图，乃以商洽要公为名，邀陶前往军府，陶应邀而往，一到即遭枪决。沈秋水闻耗，深恐陶寄存的钱物为当局所侦悉，加以追究，终日如坐针毡。史本与沈秋水相识，闻陶死，就到沈处探询，沈以实情见告，请史代谋安全之策。史沈吟不语，沈追逼之，史忽正色而言：'此事处置不当，确有倾家之祸，现在我为你起见，也顾不得一切，我来担当风险。以我在上海政、商、学界上的地位，可以说得到，做得到。'当局既未来查包裹，你尽可放心。我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就是。沈异常感激，且以史少年英俊，遂以身相委，并将钱包自愿由史带去。此即史量才盘进《申报》的财源。"

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报学史》的资料，但《报学史》出版在前，没有把这事叙述进去。

钱芥尘，他是老报人，和史量才很相熟，他曾对我谈过有关史量才的遗闻佚事，颇有趣。这些情况，冯亚雄没有谈到，不妨补述一下：史量才名家修，主持《申报》时，住居沪西哈同路（现名铜仁路，原址一度为市教育局办公处），屋子若干间，美奂美轮，高爽轩畅，有草坪，有假山，奇木佳石，拱揖映带，极游娱偃息之乐。芥尘有一次午前去访他，适值没有其他宾客，史量才留他午膳，并对他说："这儿有一个所在，你从未到过，我们就在那儿进餐吧！"说时，不知怎么一下子，座后的两面大着

衣镜，忽地自动移开，其中具有一门，抠衣进入一密室，真如武陵渔父到了桃花源，为之讶异不置。那密室陈设精雅，沙发上铺着极名贵的海龙软垫，四壁书画，都是一时名流作品，且有多宝橱二具，什么商彝周鼎，秦砖汉瓦，以及古俑玉佛、佳瓷名陶，可谓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神移。既而肴核纷呈，无不充肠适口。芥尘边举箸，边问他设此密室有何用处？史云："沪上匪氛太炽，这是用以逃避绑票的。"芥尘说："这儿有进口，没有出路，未免美中不足。"史连说："有，有"，即导芥尘至后间，在墙隙一按，顿现一仅能容身的小洞，说万一急难，那就不能不钻一下"狗洞"了。说得两人都笑了起来。

史死前患着胃病，他听医生的劝导，赴杭州西湖养疴，可是他不耐寂寞，而且上海急待办理的事很多，小住了一个时期，即行返沪。他和他的儿子咏赓，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一同乘着自己的新式汽车，从公路开往上海。讵意开至海宁附近翁家埠大闸口时，突然遭到暴徒拦路开枪，史和邓祖询及司机黄锦才被击毙，咏赓肄业之江大学，是一位体育运动员，行动矫捷，逃避得快，竟没遭殃。馆方得讯，已在夜半，史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死的，十四日报上一定要登载这一新闻，奈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易措辞。馆方深知史的被刺，有两个原因，一是《申报》曾刊载一篇文章，不满蒋介石政权而加以尖锐的讥讽；二是史曾以中南银行代表的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主持人要他认购巨额债券，史当场反对，并将情况揭发报端。这两桩事都触迕了蒋政权，蒋介石便不顾一切，下此毒手。这种情况，在蒋政权统治下，是不能发表的，发表了就会影响该报的发行。但又不能讳莫如深，完全不提，所以馆方大费斟酌。这时编辑人员夜间大都回家，只有少数负

责人员留在馆内，竟没有人肯勉为其难，毅然执笔。经过考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秘书赵叔雍来，由他大笔一挥，相机应付，可是赵已回到南阳路惜阴堂的公馆里，便打电话去请他立刻来馆，岂知叔雍外出酬应，不在家里。馆方知道芥尘和叔雍经常混在交际场中，叔雍的行踪，芥尘或许知道，便请芥尘代为寻找，果然找到了。叔雍赶到报馆，排字房工人等着发稿，急如星火。叔雍才思敏捷，考虑周到，急速写成发排。次日报上居然刊载了史量才被刺消息，如帷灯匣剑，隐约其辞，也就敷衍过去了。

《新申报》是怎样创办的？

《新申报》是苏州洞庭山人席子佩（裕福）和英国人合资创办的，在香港注册。馆址设在上海望平街，和《申报》相对垒。席子佩本来是《申报》的经理和接办人，为什么要别树一帜呢？那是有原因的。

席子佩从英人美查手中接办了《申报》之后，上海已有大型报纸若干家，它们后来居上，《申报》销路受到影响，席子佩没有信心再办下去。这事给史量才知道了，他便和席接洽，相商转让，结果以代价十二万元，分三期付清，双方订立合同，且允许席仍任经理，可是史量才是有手腕的，对席无非暂时容留，结果还是把他摈诸门外。冯亚雄曾有《史量才与席子佩的勾心斗角》一文，记载这事是较详细的，兹摘录于下：

"《申报》自史量才接办后，适逢时会，业务蒸蒸日上。在按照《申报》转让合同第三期付款期间，席子佩每因经济拮据，陆续向史商借款项，有时数百元、数千元不等。史颇厌之，有时照借，有时拒绝，二人已有芥蒂。史为彻底整顿内部阵容，亟谋将席逐去。因此，席遇事与史商谈时，史俨然以董事长的身份，冷面相向。以致席虽为经理，而事事感到掣肘。时日一久，席不能堪，即宣告退职，脱离《申报》。史量才逼走席子佩之目的既达，遂延聘张竹平为经理。张竹平本是办报能手，继任经理后，内外布置得头头是道，业务更加发达，报纸销路日增。……《申报》在张竹平任经理时期，虽盛极一时，但有一事

使史量才受了当头一棒，就是席子佩的控诉。史接办《申报》，系集资合股性质，席亦系股东之一。当初，史、席协商盘让《申报》时，史请席参加股份，又请席担任经理。席以为史对己推崇倚重，遂将历年办报经验尽情相告。不料史过河拆桥，后来竟逼席退出《申报》。席退出时，既未分得盈余红利，又未清结薪资账目。历时不久，席乃用股东名义，以清算盈余，退还股款为词，延请意籍律师穆安素撰状向会审公廨起诉。纠讼三年，史量才被判赔偿席子佩二十四万五千两，并着史当庭交保，史无可奈何，只得将赔款如数呈交。席子佩既出了气，又得了钱，心有未甘，还要作进一步的活动。席原系办报老手，就于一九一八年以史所赔偿的巨款创办《新申报》。《新申报》出版前夕，席大宴新闻界，并在席间批评《申报》，指摘史量才。当时，席对《新申报》取材、编辑、排印各方面力求精采，但新出的报纸要打开销路，吸引广告，实非一件容易之事。因此业务方面逐渐亏蚀到不能支持，只得让渡于人。”

席子佩创办《新申报》，请孙东吴任主笔，王钝根为附刊《小申报》编辑。钝根本来主辑《申报》副刊《自由谈》，他脱离《申报》后，一时为《自由谈》写稿的，纷纷供稿于《新申报》，作者阵容壮大，几乎欲夺《申报》之席。读者因为有了《新申报》，便把《申报》称为“老申报”，以示区别。但是，《新申报》铺张浪费，不善经营，不到一年，股本就折蚀殆尽，只得和合资的英国人各垫款数万两，维持局面。后来该英国人提议，拟偿还席所耗的资金，收去独办，席不愿，宁可拨还英人的投资，归为己有。因此一辗转间，席丧失十余万两。过了两年，又复资金告乏，不得已，受军阀孙传芳的津贴，才得继续出版。主笔由黄秋岳担任了。

《新申报》附刊《小申报》的编辑，王钝根之后，江红蕉、刘山农、朱大可都主编过一个时期。词翁况蕙风也一度供职，可是编辑部设在三楼，词翁年岁已高，拄杖直登三楼，气喘吁吁，不胜其惫，勉强工作了一个月，即辞谢不干。插画由沈泊尘的族弟延哲担任。杨尘因为撰《新华春梦记》刊载该报。漱六山房主人张春帆也发表了长篇小说。李涵秋、程瞻庐、朱枫隐的短篇小说和游戏文，更层出不穷。笔记很多，有庄纶仪的《四时读书记》，冠子的《茶余脞录》，讷盦的《三鉴室随笔》，罗典文的《纽佩斋笔乘》，曼陀罗室主的《送日廊偶笔》，恨石的《还读斋杂缀》，许指严的《十年花絮》，范烟桥的《鸱夷室杂缀》，姚民哀的《息庐杂记》，柳樊的《蝼庐随笔》等，都是连载的作品。庞独笑的《红脂识小录》，连载了几个月，共一百数十则，纪当时的女伶和名校书，仿《南部烟花》、《东京梦华》的笔调，辞藻是非常丰赡典雅的，后由钱芥尘所办的国学书室印成单行本。

这时张缪子在北京大学法科肄业，课余之暇，为《小申报》撰《京华尘影录》等笔记，主编者知道林琴南曾任北大教授，是缪子的老师，便函请缪子转请林琴南撰稿。琴南一经缪子介绍，果然乐于执笔，把所撰的《蠡叟丛谈》给该报排日登载。开端冠一小序，如云："蠡叟年七十矣，木然如枯僧，终日闭门，不面一客。目亦不睹报纸，以读之适乱人意，足以愈吾之聋瞆，聋瞆愈，转以伤吾之心，不如不见之为愈。忽一日，门人张生厚载(缪子的原名)，述《新申报》主笔言，请余为短篇小说，以虱报阑，意以供诸君喷饭也。余曰，论说非我所长，且不愿为狂嗥之声，以乱闻听，惟小说足排茶前酒后之闷闷，因拾吾七十年中所见者，著之于篇，命曰《蠡叟丛谈》。"其时蔡元培主北大校政，提倡新文学，请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执教，他们斥

林琴南、马其昶、姚永概为“桐城余孽”。林琴南大愤，致书蔡元培，劝他“弗施趋怪走奇之教育，为国民端其趣向”。可是蔡元培不表同情，林因此在丛谈中写有“妖梦”、“荆生”等篇，讽刺陈、胡、钱三人，校方探知“丛谈”刊登该报，是由缪子拉拢的，便迁怒于缪子，把缪子的学籍开除，距离毕业只三个月，林琴南写了一篇文章赠给缪子，寓慰藉之意，该文后来收入《畏庐文集》中。

报纸登载长篇小说的创始者蔡尔康

解放前的报纸，很注重附刊。因为在反动统治之下，没有真正的舆论，那些专电要闻，无非丧权失地，使人太气闷了，倒不如那附刊上，有俏皮话，有隽永的小品，有新奇的瀛谈，有连续登载的长篇小说，读起来比较爽快啊。附刊最能吸引人的，是长篇小说。记得民国初年的《民立报》、《民权报》，一张报上，长篇小说刊登三四篇之多。《新闻报》的"快活林"，《申报》的《自由谈》，也每天连载长篇小说，一篇登完了，就有书店向报馆转购版权（这时稿费大约每千字三、四元，向报馆转购，大约每千字一、二元），印成单行本出版，销数很广，可见当时社会上是很欢迎长篇小说的。

报纸上刊载长篇小说，究属是哪家开始的呢？开始的是《字林沪报》，这是《字林西报》所创设的中文报纸，和《申报》相竞争，且添辟附刊，由蔡尔康主编，蔡就首创刊载长篇小说。那时《野叟曝言》只有稿本，在文网森严之下，深恐稍有抵触，造成文字狱，所以当时没有付印。蔡从《野叟曝言》作者的后人手里，借来刊载于报上。后来该报让给日本同文会接办，改称《同文沪报》，主持笔政的，有高太痴、周病鸳，后又改名《同文消闲报》，所取材料，无非诗词小品，游戏文章，似乎《野叟曝言》，没有继续刊载。

蔡尔康，有一种石印名片，累累赘赘，非常特别，除姓名别号地址外，还有报务经历及著作名目，无非自我宣传而已。如

名片中有:“震旦江苏上海蔡尔康”九个较大的字,下面:“字子茀,号紫黻,晚号支佛,外号铸铁盦主,缕馨仙史,清帝逊位后,改号采芝翁”,右上角有职衔,左下角有地址,反面还有一大串著述名单等等。

南京路上的几家报社

大家都知道棋盘街和望平街为书局报馆集中地，岂知南京路一带也有好多家出版机构。据我所知，如前清庚子年李伯元组织"海上文社"，一时集合了许多文人，出版《海上文社日报》，馆址即设在南京路亿鑫里。报纸内容分社说、社榜、谈薮、笔记、杂著、艺苑等。伯元还在亿鑫里办过《繁华报》，在小型报纸中是首屈一指的。内容有讽林、艺文志、野史、官箴、北里志、鼓吹录、时事嬉谈、谭丛、小说、论著诸类，比《海上文社日报》更丰富多采。伯元自己的《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吴趼人的《糊涂世界》等，都在该报刊载。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创刊的《小说七日报》，馆址在南京路寿康里，由谈小莲发行兼任编辑，后改名为《小说礼拜报》，白云词人写了实事小说《潘烈士投海》，在该报发表，名伶孙菊仙曾把它编成京剧，在舞台上演出，演来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感人很深。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归国后，便招股办《汇报》（时为一八七四年），馆址设在南京路中市。后来因所刊新闻涉及政局人物，股东深恐得罪当局，肇成巨祸，便把报馆顶给人家，改名《益报》。

梁启超在南京路抛球场（河南路）口开设"大同译书局"，出版有关推行新政等书报。清政府曾买通租界当局，派人往书局逮捕他，他恰巧不在，捕去梁的仆人胡某及送书人唐某，书局只好关门停办。

《新闻报》是怎样推广销路的？

《新闻报》以广告费为大宗收入。如果报纸本身没有销路，也就没有人登广告，销路愈广，广告也愈多，广告愈多，收入愈多，也就愈有办法推广销路，这是起循环作用的一种连锁反应。要知道《新闻报》当时能销十五万份之巨的奥秘，就得谈到该报总经理汪汉溪的手腕了。

《新闻报》竞争的对象是《申报》。《申报》资格比它老，创刊于一八七二年，《新闻报》创刊于一八九三年，比《申报》晚二十一年。由于《申报》资格老，当时许多地方习惯地把"申报纸"，作为所有报纸的代名词。汪汉溪羡极生妒，想尽一切办法和《申报》竞争。他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一）轻政重商：所谓轻政，并不是说不谈政治，而是说对于政治要多报道，少批评。这也就是汪氏所标榜的无党无偏的实质。在民国初年，正当《申报》以长篇论说号召读者的时候，《新闻报》却别出心裁，把第一张电讯、第二张电讯和第三张本埠新闻，分成新闻一、新闻二、新闻三。为了配合这种版面，每张也来上一个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的短评。短评的内容，标榜为实事求是、不骛高谈、明白易懂。它的目的是争取一般商人和所谓小市民阶层的读者。正由于篇幅简短，文字浅显，大家看起来不吃力。

（二）内部的口号：在汪汉溪时期，《新闻报》内部有几句耳熟能详的口号："新闻快速"、"纸张洁白"、"校对精良"、"编排

醒目”。把纸张洁白和新闻快速作为办报的最高标准之一，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吧！可是，汪汉溪自有他的看法。他对人说：“一个人首先要注意卖相，纸张洁白，好比一个人穿上漂亮的衣服，令人一见面就发生美感好感，所谓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它的重要性不减于内容，甚至超过内容。”的确，当时的《新闻报》对于纸张方面是很注意的。它竭力设法大量趸购，务使报纸的色泽不致常常变动。至于校对精良，更是他三令五申的要旨。报上有了错字，校对者都得吃牌头，错得过多，或者与原稿文字的意义出入过大，有关人员就得卷铺盖。

（三）注意本埠新闻：那时，上海各报的本市新闻，叫做本埠新闻，最初，报纸上的所谓本埠新闻，大都因陋就简，仅仅是抄登几段官厅批示，以及公函、公告之类的官样文章，等于断烂朝报。汪汉溪为了争取本埠读者，首先扩充新闻来源，在会审公堂、救火会、巡捕房、医院等处特约了“报事员”（后来有些比较公开的就叫做访员）。起初是按刊出新闻的多寡结算报酬，后来为了鼓励，改为论月致酬，特别突出或独有的新闻，还给以额外的奖金。有些在工部局和巡捕房略有权势的人，只要肯在重要事件上悄悄地提供线索，汪也按月给他们暗中送钱，彼此严守秘密，做一笔黑市交易。有事的时候，另外派人跑到他们的公馆里去笔录。

（四）首先增辟《经济新闻》专栏和收听国外电讯：《新闻报》以注重经济新闻见称，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汪汉溪除了以商情表的准确来号召之外，还不满足现状，乃于一九二二年特辟《经济新闻》版，重金聘请徐沧水、朱羲农来主持其事。徐月薪一百八十元，朱一百元。当时的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也不过二百元，一般主任编辑则仅仅百元左右，可见他对于经济新

闻的特别重视了。

不久，汪又出奇制胜，想出了一个新鲜花样，设立国际电讯收报房，专收外国通讯社的电报，与同行争取时间，实现新闻快速的口号。因为那时外国人所设的通讯社在上海的分社，收到电讯以后，还须译成中文，誊写油印，才分送给各报社，时间要延迟到第二天。《新闻报》既自己设立了收报房，就可以直接收听到比较重要的新闻，当晚立即译出，翌晨就可以见报。这样，处处抢先，同样的新闻登在其他的报纸上，等于看隔夜报，"新闻"已经变成"旧闻"了。汪汉溪把这当作独得之秘，美其名曰："本报国外专电"。读者不了解内幕，以为《新闻报》真有魄力，电讯网远及国外，可以算得国内独一无二的大报。《新闻报》的销数及声望的提高，和这个"国外专电"很有关系。当时的收报员是招考进来的，有张文培和白强钟。张的薪水也高到一百八十元，在编辑部里，除了总编辑，是少有的。

以上二事，《申报》虽然急起直追，但已落后一步了。

据说，余大雄在《新闻报》当编辑时，因吃花酒被汪隔室窥见，次日就被汪以"台端志大才高，本报不敢久屈俯就"，把他解职了。张丹斧编过《庄谐录》，因有点名士习气，不为汪所喜，汪也以"不敢有屈俯就"的措辞，把张辞退。据我所知，余大雄那时兼《神州日报》编辑.《新闻报》的国外专电，时常被余大雄暗地录了去，交给《神州日报》，第二天和《新闻报》同时见报，汪很怀疑，不知道《神州日报》的电讯何以如此迅速，后来探得系余大雄所为，就借端把余开除。至于张丹斧的被解职，主要原因是张所编的《庄谐录》不够通俗，一般小市民和商人看不懂，未免影响销路，加之张在该刊上写小说《拆白党》，内容不很正

派，外界来函诘责，汪请他停刊。张很不高兴，以致宾主失和。余、张二人离职后，在《晶报》上一再挑《新闻报》的眼，那是有为而发的。后来《拆白党》小说全文交给钱芥尘，由国学书室刊单行本。

《新闻报》的"财源"——广告费

《新闻报》在抗战前，每份报纸定价三分六厘，由报贩头子批发给各小报贩，除去报贩的利润，报馆实收每份只有一分八厘。而每份报纸至少三大张，成本就要三分左右，那么每销一份报纸，报馆赔本一分有余，《新闻报》最高销数是十五万份，照这份数来推算，赔本的数字是很惊人的了。试问那办报的汪汉溪，有多么大的家产可赔呢？实则不然，汪汉溪非但不赔本，反而获利很大。内中奥秘，局外人是不易知道的。当时《新闻报》走的是商业路线，一切都迎合商人和小市民阶层的口味，注重以商业新闻和趣味性的副刊来吸引他们。这样一来，销数也就大大增加了。况且那时的商品必须靠广告宣传，尤其滑头商品，广告宣传费往往花去十分之六、七，登报是宣传的唯一法门。登广告必须选择销数最多的报纸，效力也就最大，所以《新闻报》的广告，在报界中推为独步了。这样一来，报纸广告费的收入十分可观。虽然报纸销数愈多，单就成本算，似乎赔本也愈多，但广告的收入也就激增，两者相抵，收入倍蓰于赔出，甚至篇幅有限，广告没有地位安排，放弃未免可惜，就增加"本埠附刊"，随报赠送本埠的读者，不另加价，凡是一种商品，只要在本埠推销的，或戏院排演新戏，以及名艺人登台，只要号召本埠观众的，就可登"本埠附刊"的广告。广告刊例较廉，同样花这几个钱，也就乐得在"本埠附刊"上登得大一些，显著一些，在报馆方面又大大地增加了收入。逢到节日，

张数增加，每份八张或十张不等，广告就增加了很多，这又是一笔额外的财源。

《新闻报》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刊登了很多长篇小说，较著名的，如李涵秋的《战地莺花录》，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等，都是照字数付给作者稿费的。但在抗战时期，一位小说家吴绮缘，在《新闻报》上刊登了长篇作品，如《小桃红》、《奇人奇事录》等，报馆方面非但不付稿费，反而照广告刊例收费，这又使人莫名其妙了。实则这也是一种广告术。原来某大商店向吴绮缘特约，写些引人入胜的作品，付给他稿费，然后把这些作品划入广告范围内，上半段为小说地位，下半段为广告地位，大家要看小说，就连带看到商品的宣传，这也就发生了效力。小说登完后，印成单行本，还可卖钱，所谓失诸东隅，收之桑榆，还是不会吃亏的。

该报既以广告费为大宗收入，所以对于广告户特别巴结，广告文字也很注意，特设广告编校部，仔细校对，以免错误。听说那位为该报副刊《快活林》绘插图的马星驰，最初就担任广告编校员。倘原文模糊或有些欠妥，就得提出来商讨，或打电话询问广告户，然后再作决定。广告刊出后如发现有错字，由馆方负责更正后再登一天，不取刊费。平时对待广告户尚有些折扣，大概可打一个七五折或八折，给广告公司折扣更大一些，以广招徕。当时《申报》和它竞争，广告折扣打七折，且发行"星期增刊"，给广告户在增刊上作义务宣传，但还是敌不过《新闻报》，因为《新闻报》的销数，《申报》是望尘莫及的。

《新闻报》和《申报》，以创刊年代来说，《新闻报》后于《申报》二十一年，《申报》是"老大哥"，如两种报纸并称，应称为"申新两报"。但当时《新闻报》的汪汉溪认为《新闻报》销数最

多，最受社会人士的欢迎，两报并称，应称为“新申两报”。所以他一再通知广告部，如外间送来的广告稿，有“申新两报”字样的，必须劝告广告户改为“新申两报”，倘若广告户坚持不愿更改，就宁可不登。他连这个小小的事情都不肯稍让一步！

上海《时报》和有正书局

《时报》有两种，一在天津出版，一在上海出版，两家各自为政，没有任何关系。天津的《时报》出版较早，在前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一月，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瑞琳和怡和洋行总经理茄臣集股所创办。报端画着初出的太阳，上缀"在明明德"四篆文，含有"时"字的意思。上海的《时报》，创刊于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创办人是狄平子，报头是狄平子自己题写的。

狄平子名葆贤，字楚青，江苏溧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怀有革命思想。归国后和《湘学报》主笔唐才常组织"中国独立协会"于上海，密谋革命，以"东文译社"作掩护。因经济不足，狄把家藏书画出卖，用充社费，初想结合各秘密党，入京起义，恰巧义和团大举，不便进行。及义和团失败，又购买军火运往汉口，打算占领为根据地，因事机不密而全功尽弃。狄幸而脱身虎口，保全生命。经过挫折，狄就改变方针，创办《时报》，作文字上的鼓吹。当时请陈冷血为主笔，独创新体裁，首先辟"时评"一栏，所谓"时评"，是指《时报》的评论而言。后来各报纷纷仿效，也辟"时评"，这个"时评"，是指时局评论而言。后又增加教育、实业、妇女、儿童、图画、文艺等周刊，也在其它各报之前。附刊名《余兴》，包天笑担任编辑，内容大多为滑稽作品，刊登后没有稿费，只是赠送有正书局的书券。这里说的有正书局，也是狄平子所办的，它以出版碑帖为主，还有《梅花

落》、《原本红楼梦》、《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话》、《庚子秋词》等数十种，大都可以凭券取书。以后《余兴》改为《滑稽余谈》，不久又改为《小时报》，编辑除包天笑外，又加入了毕倚虹，所以倚虹所著的《人间地狱》说部中，时常叙述《时报》馆编辑部的情况，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也常提起《时报》馆的往事。这时投稿采用的，改为现金致酬了。继任编辑的，有李涵秋、张碧梧、刘襄亭等。刊载的作品有《销金窟》、《双泪碑》、《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灯塔》、《东华琐录》、《大宝窟王》、《大侠锦帔客传》、《红泪》、《荳蔻葩》、《情网》、《火里罪人》、《霜刃碧血记》、《九十三年》、《秋星阁笔记》、《静照轩诗话》、《卅六年前之上海回顾》、《说本钩玄》、《情错》、《怪家庭》、《雌堞影》等，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毕倚虹写的长篇《黑暗上海》，姚鹓雏写的《龙套人语》在报上刊完后，均出了单行本。《黑暗上海》且由江红蕉续撰，《龙套人语》由平襟亚介绍给广益书局出版。所谓"龙套"者，其时鹓雏一度从政于镇江，自谓备员而已，好比在京剧中充跑龙套角色。

在一九二一年左右，狄平子请沈能毅任总务，沈认为白报纸有上涨趋势，劝狄尽量多购，狄信任他，便购入大量报纸，不料购入后纸价大跌，狄损失很大，因此资金不能周转，不得已由陈景韩介绍，把该报让给松江人黄伯惠。黄喜摄影，主张报纸应当图文并重，所以向国外购置画报印机，辟《时报画报》，每星期随报附送一张，附送画报的那天，报纸销数特别多，他就把画报一张分为两页，每星期附送画报两次，用以推广销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事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日莲宗的化缘和尚，被我三友实业公司的工人打伤，和国民党大办交涉，表面上算是谈判，暗地里却在运兵筑垒。国民

党却委曲求全，认为乞求和平，不致发生战事，所以一再出安民告示，命市民照常营业，不要惊慌。但是那天的《时报》，在封面上加着"难关"两个极大的红字，使人惊心触目。于是住在闸北、虹口一带的居民纷纷迁避，果然在这天晚上十一点钟，日本侵略军从虬江路突袭驻防的中国军队，烽火连宵，许多建筑物成为灰烬。那些看了《时报》的"难关"两字而及早迁避的人们，对于该报更有深切的印象。

最滑稽的是，当袁世凯想做皇帝，引起舆论不满，受到报纸的谴责。那护袁称帝的袁乃宽、梁士诒辈用偷天换日的方法，伪造舆论，以媚袁氏。有一天，袁氏正在"居仁堂"阅报，赵尔巽忽来拜访，发现袁氏所阅的上海《时报》，和寻常不同，大为诧异，袁氏看出神情，询问赵尔巽，赵即实告。袁氏派人到赵家把所阅的《时报》核对，果然内容相异，大为震怒，立刻唤袁乃宽来，加以训斥，袁乃宽认罪自责才罢。实则这是袁氏玩的把戏，故作不知，借以欺世。

《时报》附设的有正书局，发行了几种杂志，如《余兴杂志》和《小说时报》等。《小说时报》由包天笑编辑，每期刊铜版照相十幅左右，均为美女小影。写小说的，有周瘦鹃、徐卓呆、陈冷血等。天笑的短篇《一缕麻》，被搬上舞台，由梅兰芳编演为时装剧，轰动一时。还发行《妇女时报》，由天笑和冷血轮流编辑，格式和《小说时报》差不多。但写作的大都是妇女。在旧社会里，妇女识字者很少，那里来这许多女作家为该杂志执笔呢？实际上是由男子代作，而用妇女的名字刊出。天笑还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每月一册，也是变相的杂志，出了十余期，因销数不多而停刊。又《佛学丛报》，由濮一乘主编，附有《词林》，载有《频伽漫笔》、《无为馆笔记》、《悲鸳鸯》等。《时报》

对这几种杂志大事宣传，赓续登着巨幅的广告。这时写《孽海花》的曾孟朴办《小说林》，出版了很多书，后来他舍弃笔墨，走上仕途，《小说林》不再继续办下去，就把所有的出版物全部让给有正书局，代价是三千元，所以有正书局也就兼售《小说林》的书了。

当时的报纸，以《申报》、《新闻报》、《时报》为三鼎足。《申报》的对象，军政界居多，《新闻报》则销商界，《时报》为学界。《时报》馆设在福州路望平街转角，门楼为浮屠式，有正书局便在隔壁。后来馆址迁往福州路浙江路口，有正书局也就停办了。

《神州日报》的花絮

《神州日报》创刊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为三十周年纪念。每日特辟"三十年前之今日"一栏，专载三十年前的旧闻史料，寿命可算很长的了。馆址最初设在上海望平街，后迁至宁波路一百三十号，规模远不如前了。

该报创刊初期，鼓吹民族革命，与我国留日学界所办的《民报》、《复报》、《鹃声》、《洞庭波》各报相呼应。其中人才济济，如杨笃生、于伯循、王无生、张丹斧、余大雄、叶仲裕、金怀秋、王搏沙、邵力子、张俊卿、汪瘦岑、汪允中、范君博等，笔墨雄健，一时称盛。

最特殊的是，《神州日报》虽创刊于清末，但它的报头不用清朝统治者的年号，而以甲子来代替。这种做法，很为一般具有民族意识者所赞许，因此销数很不差。不料刊行不到一年，隔邻失火，风猛火烈，立刻燃烧及于报馆，这时正在紧张地编辑发稿，编辑迫于火势，只得舍弃逃避，惟有杨笃生为了抢救要件，逃避较迟，扶梯早已烧断，不能下楼，他没有办法，把抢救的要件先行抛下，然后缘着电杆下来，幸免葬身火窟。杨笃生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很多，署名"椎印寒灰"，张静庐所辑的"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已把他搜罗进去了。

副刊取名《神皋》，多载诗文笔记。张丹斧玩世不恭，常写游戏文章，笑中寓讽。长篇小说，有李涵秋的《续广陵潮》、《姊妹花骨》。王无生的作品刊布尤多。这时外国人在上海铺设

轨道通行电车，王无生大为反对，在报上写了一篇短文，力斥他们搜刮金钱。岂知这么一来，触怒了外国人，他们通过会审公廨，派了警探四出逮捕他，害得他上海不能立足，避到他的第二故乡扬州去（他本是安徽歙县人），心里很是气愤，做了两首诗，寄给上海的朋友，后来这两首诗，曾在《神皋》上刊载。诗录如下："网罗遍地将焉适，披发归来未可嗟。多难只缘文作祟，忧天拚命骨埋沙。有灵欲奏通天表，无地能容泛海槎。四海知交君最厚，可能为我作朱家？""已由亡命成张俭，拚把缣囊待杜根。落落不辞头可断，云云应悔舌犹存。敢因风浪违初志，欲驾云霓叩九阍。多少名流同一叹，更无人与作昆仑。"

《神州日报》发生过一桩颇为有趣的公案。当时上海有个商人黄楚九，他各种生意都做过，就是没有办过正式的大型报，也想尝试一下。其时《时事新报》营业不怎么好，他就想接办《时事新报》，同时提出申请加入日报公会，以此为进身之阶。这时汪瘦岑主持《神州日报》笔政，参加日报公会讨论时，他坚持反对说："黄某是个滑头药商，并曾被人控告，经过会审公堂判决处罚，让这样一个人厕身新闻界，并参加公会组织，本人大有羞与为伍之感。"对汪所提异议，在座的人默不作声，汪大为愤慨，当场声称，如果大家允许黄某入会，本人情愿退出。果然次日《神州日报》上刊登了汪瘦岑退出日报公会的启事，并把所以要退出的原因，叙述了一下。这样就丢了黄楚九的面子。黄岂肯容忍，便委托律师写信给汪，指责汪损坏其名誉，要提起诉讼。汪毫不畏惧，设法抄到了黄以前被控的案由、审讯的经过、处罚的判决书和有关文件，源源本本的在《神州日报》上按日连载。这样，更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黄楚九没有办法，只得请商会会长朱葆三出来做鲁仲连。汪时常去

味莼园喝茶，一天他才觅位坐定，朱葆三便走过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巧，我介绍一个朋友和你谈谈。"说完就从近座中拉了一个人来，说这位就是黄楚九。黄见了汪，装得非常谦恭的样子，经过双方谈话，又加上中间人的调解，结果黄不接办《时事新报》，汪也把攻击黄的历史材料，戛然中止。

《神州日报》时常停刊，时常复刊，换了很多的主人，变了很多的风格，情形是相当复杂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号角——《民立报》

谈到辛亥革命，就得谈一下《民立报》。因为《民立报》对于当时的革命是起了号角作用的。

《民立报》是怎样创办的呢？它有一段光荣的历史。一九〇九年，一般具有民族气节，立志推翻清廷的先进人士，组织革命团体，在那年五月十五日，创刊《民呼报》，不料因记载湖北政界新闻，提到"丫姑爷"三字，触犯了湖北提督张彪，他便奏称《民呼报》为革命机关报，一面派他的心腹湖北标统陈得龙，代表他到上海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该报侮辱长官，立即逮捕主笔，以后不准继续发行，并威胁说："以后谁敢当主笔，就把谁的眼睛挖掉。"为什么提到"丫姑爷"，张彪要如此大发雷霆呢？原来，张彪做过张之洞的马弁，他善于献媚，深得主人的欢心，主人便把一个伶俐的丫头配给他为妻室。张彪因此逐渐递升，居然爬上湖北提督宝座。从此他一味效忠清廷，屠杀革命志士，鄂人怨声载道，给他起了个诨号，叫"丫姑爷"。《民呼报》不加忌讳，也在新闻中提到"丫姑爷"。张彪就借题发挥，报馆只得被迫关门。《申报》曾详载其事，颇轰动一时。可是那时有位谈善吾，他不畏强暴，继办《民吁报》，认为眼睛不劳人挖，还是自己来挖掉。那"吁"字即去掉两点的"呼"字，无非含着讽刺的意义。该报出版后，因详载了日本外相伊藤博文被刺事，又触犯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方命其驻沪领事松岗，请上海道蔡乃煌查究，蔡即札饬会审公廨禁止，仅出版了四十三期。

到了下一年(一九一〇年),于右任、宋教仁、吕志伊、章行严、覃寿堃等,继《民吁》之后创办《民立报》,创刊号于是年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出版。它的发刊辞有这样几句话:"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月灭。"这表达了它的创刊宗旨。撰写评论的,以宋教仁、徐血儿两枝笔最为锋利,其他如杨笃生、杨千里、王无生、景帝召、范鸿仙、沈缦云,都是一时之俊。附刊很出色,由谈善吾等主编。谈善吾笔名"老谈",天天写小品文,有一长篇小说《夸父逐日记》,影射日本侵略野心家大限伯,寓有警惕国人的意思。这时的附刊,没有名称,篇幅却占着全张的二分之一。当时报馆经济窘迫,无力收购外稿,除外界义务投稿外,均得由诸编辑自己撰写。好得编辑大多是南社成员,便请南社社友帮忙写稿,有柳亚子的《磨剑室随笔》,陈匪石的《旧时月色斋词话》,叶小凤的《一万里山水美人记》,以及胡朴庵、胡寄尘、姜可生、姚鹓雏、王蕴章、汪影庐、高吹万、高天梅、余天遂、陈去病等的杂著。最末一栏乃片言只语,标题为"剩水残山",后易名"东南西北",内容也充满着民族反抗的气氛。他们还请南社小说家海门陆秋心翻译历史小说《葡萄劫》,叙述希腊志士反抗土耳其统治,揭竿起义光复故土的故事,用以激励人心,鼓吹革命。秋心又发起撰写点将小说,取名《斗锦楼》,也是别开生面之作。叶小凤一度任附刊编辑,他每天写《天声人语》,并连载长篇小说《壬癸风花梦》,拥有很多读者。

那时馆址在望平街,有一天,馆中忽然起火,顷刻之间,报馆被焚毁殆尽,但报纸照旧发行,可是铅字排印已来不及,只得临时用有光纸石印两大张,报上标着:"遭难中之《民立报》"

七个字，并登一启事云："本社机器铅字，修补铸造，颇费时日，须一星期后可复元气。今日出石印报两张，阅者谅之。"那石印报仍备有专电、译电、社论、天声人语等类，都由杨千里手写，从清晨写到半夜，钱病鹤画师配画，真是煞费苦心。后来由沈缦云力筹巨款，才得维持下去。沈是上海信成银行的主持人，可向银行挪移款项，不料该银行竟因此亏累而停业。

武昌起义的下一天，《民立报》就大力配合宣传，每天都登载着振奋人心的专电，激励民气的短评，销数顿由数千份激增至二万份。其时《申报》、《新闻报》每份售三个铜圆，这时的《民立报》，报贩却大大的抬高价钱，每份售至小银圆三角，最高价竟至一圆，还是被争购一空。报馆门前还贴着报道战况的大字报，不是某处光复，便是革命军怎样胜利，一天贴好几次，以致望平街上万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车辆纷纷改道。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取大权，残杀革命志士，最后刺杀宋教仁，《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杨千里、朱宗良等，除在报上对袁氏进行笔伐外，又编了一本书，取名《宋渔父》，来揭露袁氏的罪恶。袁氏派人和公共租界当局协商，加以禁止。该报受到威胁，把馆址迁至法租界三茅阁桥堍，继续出版。淞沪警察厅仰承袁氏意旨，出一布告云："凡《民立》、《民权》、《民强》暨乱党各种机关报纸，立即禁止售卖。凡我人民，亦应一体勿再购阅。"经过布告通知，这许多报纸只能在租界上推销，举凡华界及外埠各地，都不能发售，邮局也停止寄递（内地人士阅报，由民信局私行寄送）。由于受了这些限制，该报就一蹶不振，结果由范光熙承办，把激烈的论调，转为缓和，无非想向袁氏妥协。当时的《民权报》、《天铎报》等主持者不以为然，向《民立报》大事攻击，在报上展开笔战。一般《民立》读者，也不

赞成这种灰色的言论，销数大大地减少。一九一三年，掀起二次革命，《民立》销数只有千份左右。经济奇窘，也就无法维持，只得宣告停刊。该报晚节不坚，有头无尾，这是莫大的遗憾。

关于《天铎报》

清末民初，上海发行的报纸，大都以"民"命名，如《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民权报》、《民国日报》、《民声日报》、《中华民报》等等，但也有例外的，《天铎报》便是其中之一。该报主持辑务的，除张客公外，都是南社人士，如邹亚云、李怀霜、周桂笙、陈畏垒、俞语霜等，所作的诗词散文，清新雄健，都为市民所爱读。邹亚云有《杨白花传奇》，谱杨小楼与清宫福晋秘事，排日登载该报，还有其它零星作品，后来收入《流霞书屋集》，柳亚子为之刊行。柳亚子也是编辑之一，他这时在虹口七浦路赁着屋子和他的夫人郑佩宜组织小家庭，可是经济没有来源，邹亚云便介绍他进《天铎报》，发表许多诗文，又用"青兕"的笔名，大做论说，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反对妥协性的南北和议。孙中山宣布让位以后，亚子便在报上天天骂南京政府，骂临时参议院，主张由起义各省组织都督团，反抗南京，取消和议。那时的《民立报》，被南京政府所贿买，竟在报上反骂柳亚子，柳亚子针锋相对，不肯让步。《大共和日报》主笔汪旭初，是柳亚子的姨夫，写信劝阻亚子，亚子倔强到底，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写了一篇洋洋万余言的公开信，在《天铎报》上登载，直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有一次，该报登了一篇夏重民的短评，对于章太炎颇有微辞，不料太炎的弟子黄季刚不以为然，责问亚子，亚子说："我不是《天铎报》的总编辑，找我干吗！"可是季刚硬要亚子脱离《天铎报》，亚子徇情，就脱离

《天铎报》，进入《民声报》。其时总编辑是李怀霜。

王无生化名"天僇生"所著的《恨海鹃声谱》，由民权出版社刊印单行本，最初是登在《天铎报》上的，共五万言，分二十章，叙述一瑞士女子，身蹈情网，百折千回，情节是相当离奇变幻的，间叙普法战事，也很生动。岂知其中有一秘密，原来该小说并非王无生手笔，实则是贡少芹所著。贡少芹有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说："余曾著《恨海鹃声》小说一种，欲售诸报馆或杂志，苦无介绍者，王天僇为吾扬人，因走谒之，出书示王，要彼为介。王留读吾书，越日，王招余往，谓君作虽佳，然亟欲求售，恐不易，兹设一变通法，君果以著作权予吾者，吾可受之。时余窘甚，允所请，得三十金，立署让与著作券，并要王曰：'他日拙作发表，请必署余名'。王嗤之以鼻曰：'我市君文，非市君名，幸勿过虑'，余感而诺之。数月，《恨海鹃声谱》载诸《天铎报》矣。视署者为谁，天僇生也。余怒甚，驰函诘王，旋得覆，非惟函中无道歉字样，且词意极强硬，有'弟久居海上，见惯风潮'两语，余自知非所敌，乃罢。"这和李涵秋的《雌堞影》被欺于包柚斧，可谓无独有偶。但《雌堞影》刊行单行本，改署李涵秋，《恨海鹃声谱》刊单行本，始终是天僇生，一直把贡少芹的名儿抑没到底了。

《太平洋报》和柳亚子

柳亚子的《南社纪略》有那么一段话："叶楚傖办起《太平洋报》来了，于是我从《民声》出来，跳进了《太平洋》。《太平洋》的局面是热闹的，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阵容揭示如下：姚雨平（社长）、陈陶遗、邓树楠（顾问）、叶楚傖（总主笔）、柳亚子、苏曼殊、李息霜、林一厂，余天遂、姚鹓雏、夏光宇、胡朴庵、胡寄尘、周人菊、陈无我、梁云松（主笔）、朱少屏、王锡民（干事）。"的确，阵容是很坚强的。因为中坚分子都是南社人士，报上也就加强了文艺气氛。那时的文艺附刊是很精彩的。姚鹓雏除写了长篇小说《鸿雪印》外，还写了《博浪锥传奇》，高钝剑撰《愿无尽庐诗话》。该报上所登的广告，用各种书法，加以木刻，非常美观，都是李息霜设计并亲笔书写的。

苏曼殊为该报画刊绘图，并为附刊《文艺集》写小说，柳亚子所辑《曼殊全集》，有一篇《太平洋报时代的朋友》，谈到曼殊与朋友的情况。当时曼殊的朋友是很多的，如柳亚子、胡寄尘、朱少屏、叶楚傖、费天健、姚鹓雏、李息霜、林一厂、胡朴庵、余天遂。此时是民国元年，《太平洋报》在上海印行，经理是朱少屏，总编辑是叶楚傖，文艺编辑是柳亚子，后来亚子有事离沪，由胡寄尘继续编辑。曼殊的稿件，包括诗文书札在该报登的很多，较有名的是署名"飞锡"的《潮音跋》和小说《断鸿零雁记》。《断鸿零雁记》在报上没有登完，后来由胡寄尘交给广益

书局出版单行本。寄尘有一日记谈到这部书："《断鸿零雁记》稿，前数页系从日报剪下，粘贴于簿上者。其后为曼殊亲笔所书，字极娟秀，惜被排字人油墨所污。余藏之数年，两次谋为刊行，均不果。直至前年，始得如愿印行。然原稿系未完之稿，发刊单行本似不相宜，不得已，余于其末略加若干字，似未完似已完而了结之。此非余好事，实无可如何也。"所谓曼殊稿件，散见在该报者极多，在《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一书中，可以查出一部分，如《南洋话》、《冯春航谈》、《华洋义赈会观》、《简法忍》、《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寄广州晦公》、《失题》、《西京步枫子韵》、《水户观梅有寄》等。又铜版印一日本女子照片，曼殊题"东海女诗人"，大概这女子是与曼殊有关系的。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该报《文艺消息》上，有《苏曼殊君东渡》一文云："曼殊于前日东渡省母，临行，画纨扇十余柄，分赠朋侪，留作纪念。曼殊的画，高旷淡秀，不似食人间烟火者。顾平生颇矜重，不轻为人作，宜得之者珍重视之也。"凡这许多，都是亚子替曼殊安排的。曼殊当时认为林琴南所译《茶花女遗事》，不够忠实于原作，打算把小仲马原著复译一过，登在该报上，且在《文艺消息》栏宣传，结果没有成为事实。

寄尘一度代亚子编辑该报文艺。为了品评冯春航剧，亚子几乎与寄尘闹翻。寄尘的《春航集纪事》谈到此事说："亚子去《民声》，至《太平洋报》，扬之愈力，同人投赠之诗文愈多，而春航之名亦愈噪。是年秋，亚子返黎里，余承其乏，余不喜顾曲，终年足迹，不入梨园。又值亚子归，而毁春航者以起，姚鹓雏其最著者也，辄以短春航之语付余，刊之报端，亚子见之，怫然怒，并责及余。又或有扬春航者，以文字付余，余亦刊之报端，亚子见之，欣然喜。黎里去上海数百里，邮简两日而达，亚

子日有书往还，大抵为春航也。”

亚子在该报，还几乎与胡朴庵闹翻。当时亚子除编辑该报外，还主编《南社丛刻》，他对于社友来稿，是编而不选的，当然比较简单，可是他要保存原稿，把全部诗文词亲笔抄到每页二十四行、每行三十格的红格纸里面去，然后将所抄副本付印，这样做是很费事的。他抄好了，请胡朴庵经手发排，不料朴庵一个疏忽，把稿子遗失掉，亚子很天真，带着孩子气，一定要朴庵赔偿。这损失怎样赔偿呢？直使朴庵束手无策。结果是叶楚伧出来作了这样的调停：亚子原来编辑“太平洋文艺”以外，还要兼编电报，现在电报归朴庵去编，亚子只管文艺，腾出时间来把南社第五集的稿子重新抄写起来。双方都同意，一场风波才告平息。这时《南社丛刻》的发行所，即设在望平街《太平洋报》馆。

一九一七年三月，有一个杂志也叫《太平洋》，这是《甲寅杂志》分支出来的。每月一册，分论说、海外大事、评林、译述、国内大事等栏，和《太平洋报》不相干。

对外宣传反袁的《民国西报》

英文晚报《民国西报》，创刊于一九一二年，馆址设在上海博物院路。该报系孙中山创办，由马素主持笔政，并兼发行。

孙中山为什么要办《民国西报》呢？原因是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外国归来，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当时他尚未识破袁世凯的面目，便让位给袁世凯主持国家大计，不料袁大权在握，便野心暴露，屠杀革命党人，这时孙中山悔之不及。当时各地掀起反袁运动，孙中山觉得虽有许多民党报纸主持正义，揭露袁氏罪行，但在华的外国人不懂中文，对于他们来说，宣传失其效力。况且当时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动辄干涉我国内政，所以宣传不能不内外兼施，使外国人也知道我们所以要反袁的道理，为此想办一张报纸。但办报并不那么容易，需有一笔巨额经费。孙中山没有钱，怎么办呢？那不要紧，有人暗中帮助，那就是张静江和庞青臣，他们和孙中山交谊很深，且资力雄厚，帮助一笔无所谓。孙中山有他们资助，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取名《民国西报》。为了节省开支，内部人员大都身兼数职，印报机器都自己购置，每晚出版，销路还不错。

一九一三年夏，林虎在江西九江湖口炮台举起反袁旗帜，不久李烈钧在南昌响应，《民国西报》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反袁，聘董某任北京访员，董曾研究新闻学，他时常跑北京美国使馆，在使馆探得袁氏行动后，即写成稿子在《民国西报》上及时登载，这种消息为当时其他报纸所没有。由于上海有

法租界，法国侨民也很多，又请了一位娴于法文的人担任笔政，每天用法文写一社论，以广宣传。孙中山自己不便到报馆里来，就委托《中华新报》主笔桂林人邓孟硕为联系代表，常到报馆里来有所规划，后来邓被袁氏逮捕。他出狱后曾辑《狱珊瑚》，以纪其事。

《民国西报》还反对英商在华贩运鸦片，认为它的毒害胜于蛇蠍，非文明国人所当出此，这样一来触怒了那些贩毒的英国人，他们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向会审公廨提起诉讼。但该报有根有据，辩论振振有辞，结果诉讼被斥，租界当局也就被迫实行禁烟，这是应当归功于该报的。

后来由于孙中山反袁失败，流亡日本，报务无人主持，该报不得不于一九一三年冬停刊。

《民权报》和民权出版部

《民权报》，为周浩私人所创办，他字少衡，做金子生意时，发了一笔财。他参加自由党之后，关心国家大事，便出资办《民权报》，作为自由党之喉舌。他看到袁世凯玩弄阴谋诡计，就仗义执言，在报上痛加斥责。周浩还具名发表声明，有"头可断，言论不可屈"等语。当时该报设在公共租界江西路泗泾路口，袁氏没有权力封它的门，乃出下策，通令邮局禁止寄递，以致只局限于在租界发行，销数下降，广告收入又大受影响，周浩赔贴了很多的钱，勉强维持了二年，就宣告停刊了。该报撰社论的，有戴天仇、牛霹生、徐天啸、尹仲材、江季子、何海鸣等，编电报的有高冠吾等，编新闻的，有徐枕亚、李定夷、刘铁冷、包醒独等。文艺版篇幅很大，为整个半张，主编的为蒋箸超、吴双热等，他们行文，都喜骈俪出之，托旨骋妍，雕镂组绣，人目之为"鸳鸯蝴蝶派"。同时一张报上连载了几篇长篇小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红粉劫》，先后刊登的还有定夷的《霣玉怨》，徐吁公的《蝶花劫》，砭俗子的《黄白缘弹词》，丁悟痴的《黑鸭逸史》及《刺马见闻》，枕亚的《燕市断云》等。

随报附送有光纸石印的《民权画报》，绘画的有沈泊诚、钱病鹤、张聿光、汪绮云等，又有长篇和中篇小说，如吴双热的《兰娘哀史》，悟痴的《女儿红》，刘铁冷的《征人恨》，颉钦的《葛蔓楼》等。该报以文艺小说吸引读者，销数尚不差，若非袁氏

加以摧残，寿命不致如此短促。

《民权报》停刊之后，该报内部人员心犹不甘，由马志千、陈鸳春等组织民权出版部，地址在福州路麦家圈口，曾请蒋箸超编刊《民权素》，第一期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出版，为月刊性质。内容分名著、艺林、游记、诗话、说海、谈丛、谐薮、瀛闻、剧评、碎玉共十栏，每栏用采色纸作扉页，加以名人题签。所载的作品，一、二两期无非摘取《民权报》上登过的旧作，第三期起完全为征来的新稿，如杨南郁的《红冰碧血录》，李怀霜的《装愁盦随笔》，沈肝若的《琴心剑气楼忆墨》，汪洋的《影生杂记》，向恺然的《变色录》，高钝剑的《愿无尽庐诗话》，苏曼殊的《燕子龛诗话》，陈匪石的《旧时月色斋词谭》，郑逸梅的《慧心集》等。一九一六年四月结束，共十七期。后来售缺了，外界还有人要补购，该出版部又把十七期的作品再加精选，刊成《民权素粹编》五册。

该出版部，还刊印了许多单行本，如徐哎公和蒋箸超合作的《蝶花劫》，署名天僇生的《恨海鹃声谱》，李警众的《破涕录》，以及几种"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和《兰娘哀史》等，一自《民权素》出至十七集，蒋箸超应会文堂之聘，该出版部主持无人，也就停歇了。

反对袁世凯的《袁政府画史》

民初，各民党报纸对袁世凯阴谋称帝，群起反抗，特别是《民权报》，反袁更为激烈。那时负责该报绘画者为钱病鹤，他除担任插画外，还编辑了一本《袁政府画史》，用有光纸石印，十六开本，民国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定价六角。封面是周浩写的，下附《老袁百态》，题签出于蒋箸超手笔。周浩和蒋箸超都是《民权报》主笔政的。首冠邓家彦序文云："抱经天纬地之才，赋冰清玉洁之质，举世滔滔而名不彰，乃托绘事以见志，如钱子味辛者有几人哉！忆自辛亥革命以还，海滨多逐臭之夫，廊庙无识时之杰，窃钩窃国，匪夷所思。顾钱子迥不犹人，极绘事之能，补斯文之阙，箴规刺讽，蔚成此帙。昔子美诗史，摩诘诗画，钱子何多让焉。凡有血气者，固将展卷披图，为之百感苍茫也。噫！"陈志群的序文介绍钱病鹤说："钱君病鹤，名辛，字味辛，又字民有，湖州璨初先生之哲嗣也。先生精金石，家藏碑帖甚多。君渊源家学，自幼富有美术思想。庚子后，即弃举子业，而从事丹青，得其表叔方爵先生之指导，艺乃大进，来沪，历任民党各报图画主笔，逐日作讽刺画，耐人寻味，惟积稿散而不聚，阅者憾焉。今将民国开始以来，一年有半之画报，择尤汇存，付梓问世，颜曰《袁政府画史》，嬉笑怒骂，皆得神理，诚大观也。"该画史凡二百数十幅，附有目录，作品病鹤几占一半，其他还有拙葊，王醒侬、焕文、绮云、铁汗、乐轩、丹徒恨人、泣花、巨章、伯经、天恨等人的作品，大都经病鹤修

润。那《老袁百态》，画了一百幅猿猴嬉戏图，袁氏丑态，暴露无遗。那时袁世凯爪牙密布，动辄杀人。钱病鹤这种大胆作风，确实颇不容易。

袁世凯收买报纸

《大共和日报》，民初在上海颇有声誉，销数也很不差。担任编辑的都是一时名流，如章太炎、张丹斧、汪旭初、黄季刚、钱芥尘、谈善吾等。附刊称为《报馀》，很多作品是值得一读的。

扬州李涵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过渡镜》，载汉口《公论新报》，不久武昌起义，该报便停刊了。涵秋拟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商务主持《小说月报》的王蕴章，认为没有多大文采，拒绝接受。结果《大共和日报》主持人钱芥尘把它收了下来，登载在《报馀》栏内，改名《广陵潮》，居然大受读者欢迎。以后李涵秋又续写《双鹃血》、《瑶瑟夫人》、《琵琶怨》。后来《新闻报》也载他的小说《侠凤奇缘》、《战地莺花录》，这一下，李涵秋便红起来了。

钱芥尘不知从哪里获得了一部手抄秘本小说《玉娇梨》，这书未列写作者姓名，内容系记金兀朮南下，胡兵四出骚扰，掠妇女置营中，以供淫乐之事。书中的渲染描写未免流于秽亵。钱芥尘拟把这部小说，发表在《报馀》上，当时汪旭初、黄季刚大不赞成，认为这种小说，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也干禁例。钱以为秽亵处不妨删节，代以方框，于是即在该报上排日登载，一年多才登完。以后有人把这书加以删改，割裂原文，印成单行本问世，那就不是本来面目了。

丹斧与朱天目友善，天目工华绮绮丽之文，丹斧向他索

稿，天目便把所著的《情海归槎记》交给丹斧，它无非追溯前游，颇多艳迹。戴天仇看到了，便在他所主辑的《民权报》上，撰写《刑法上之大共和日报》一文，批评该报登载淫秽文字，有失报格，有伤风化。租界捕房认为淫秽文字，例所禁载，便把主编张丹斧拘了去，馆中同人大为惊恐。这时钱芥尘恰巧有事去嘉兴，立电促返。《字林西报》华人编辑经子刚，芥尘和他很有交谊，经熟识捕房当局，即托他代为疏通，第二天丹斧果然释出。此后，天目曾有一文记载这事，略云："挟一党纷争之见，借此起一小小波澜则可，若目此书为淫书，必欲禁之则不可。越二年甲寅，张子受陕豫总司令陆公之聘，轻车返里，偶及前事，张子矍然曰：说部之功诚大矣！然万国五洲，未闻有假他人之著述，作党争之利器者，今有之，则自《情海归槎记》始。恐君涉笔时，亦断不料及。仆一夕羁縻，实受君赐，可想见矣。他日野史中，或当载此佳话也。"

袁世凯上台后，收买报纸为其张目。《大共和日报》一度受袁的津贴二万元，以致言论丧失立场，但袁尚以为这样做还不够，欲把该报改组为《大中华日报》。但该报同人不愿这样做，便把报纸停止发行，纷纷入《神州日报》供职。袁又派遣一姓亢的带了巨款到上海来，想收买《神州日报》。这姓亢的肥硕似弥勒佛，坐定即打瞌睡，而肤体又很洁白，黄季刚称他为"羊脂白玉，行尸走肉"，但这人并不糊涂，知道南方舆论的激昂，不易应付，也就以"干不了"覆命。因此袁别设《亚细亚报》，该报社后来连吃了两颗炸弹。

据钱芥尘谈，《大共和日报》受袁的津贴二万元，那是有一段秘史的。当时章太炎看到光复后，各省各自为政，相互歧视，认为这对于民国前途是不利的。他就发起成立"中华民

国联合会”，会址设在黄浦滩头白渡桥堍，一时名流，纷纷加入。有一位杭州人程祖福，字听彝，一署定夷，能绘画，精鉴赏，在前清做过显宦，手头很有钱，他也加入联合会的组织。他慕章太炎的名，和章订交，章办报缺少资金，他慷慨地借给章太炎二万元。在他是有用意的，认为章负一时重望，一定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后来觉得章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深悔二万元的虚掷，于是便不客气地向章索还。章那里有钱还债呢，程索之更急，甚至有涉讼趋势。这个消息，给袁世凯在沪亲信某探得了，立电袁政府，袁即派某持二万元给章，章颇踌躇，欲不纳，卒以无法应付程祖福的借款，不得已收之。某要一收据，章不肯出正式据证，仅在名片上写“收到二万元”五字。这样一来，《大共和日报》便无形中被袁收买了。事后，太炎对此事深自悔疚。

按此一段秘史，外间绝少有人提及，即使翻遍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都没有涉及此事。这是我亲聆钱芥尘所谈。芥尘参与《大共和日报》笔政，和太炎同事有年，以上所云，决非无稽之谈。虽时隔二十年，而言犹在耳，可靠性是很大的，况当时太炎对于袁氏，尚抱有若干幻想，未免因循苟且，这也在情理之中，与其说他受贿，毋宁说他受骗吧！

《亚细亚报》两次被炸

辛亥革命后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得政权，还想过皇帝瘾，于是《筹安会》应之而起，制造鼓吹帝制的舆论。这样还不够，又办了一个御用机关报，取名《亚细亚报》，由薛大可主持。最初在北京出版，一九一五年移至上海发行。上海望平街为各报集中所在，因有"报馆街"之称，那《亚细亚报》的馆址即设在望平街十一号。它为装饰门面，还请当时的书法家清道人（即李梅庵）写招牌，清道人把《亚细亚报》的两个亚字，中间各加一点，成为"亞"字，说是古体。

该报还在筹备发行，就引起爱国人士的公愤，人们纷纷投函反对，有的署名"君主之敌"，有的署名"中国公民一分子"，有的说："如果出版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二日，为该报发行的第二天，下午七时左右，就有人投掷炸弹，当场炸毙守门警察一名。但该报非但不知悔悟，且仗势从严根究，以为这样再也没有人敢来冒犯了。岂知到了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九时，又有一颗炸弹从二楼窗口掷入，炸毁了玻璃窗及桌椅等用具，主任刘竺佛几乎被炸死。当时就有人指着清道人所书的招牌说："这个清道人真有先见之明，所以两个亚字中间都加一点，仿佛告诉他们，这种违反民意的言论，吃起炸弹来是接一连二的。"

该报连吃两颗炸弹后，屋主迫他们迁移，只好关门大吉。一张为虎作伥的反动报纸，在爱国人士的压力下，就这样结束

了。

这张反动报纸初发行时，因为没有人肯为它撰稿，编辑部人员四出拉拢，且稿酬特别优厚，但应者仍寥寥无几，于是利诱之余，再行威胁。当时有黄远庸（远生）其人，为《时报》通讯员，后又为《申报》通讯员，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称他为"报界的奇才"。帝制议起，袁氏爪牙以远庸的通讯，极能吸引读者，强邀之任《亚细亚报》总撰述。时帝制派声势很大，远庸不敢公然反对，姑以似是而非，不着边际之文应付。他于一九一五年九月离去，托词赴美游历，辞去《申报》通讯，及《亚细亚报》的特约总撰述。不料他到了美国之后，被旧金山华侨误认为帝制派而遭狙击致死。他的作品，散见各报刊，由他的友人林志钧汇集成书，名《远生遗著》。还有一个署名马二先生的冯叔鸾，也被该报特约撰写副刊稿，但他也仅写了些戏剧评论，不涉及政治。一自远庸死耗传来，叔鸾深恐连带遭殃，为明哲保身计，曾借《晶报》篇幅，发表了一篇《为亚细亚报写稿经过》，以明心迹。

上海的画报潮

上海的画报，从《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开始，很受社会人士的欢迎。于是《申报》、《新闻报》、《民立报》、《民权报》、《时事新报》等都附刊有光纸石印的画报。这时作画的有张聿光、沈泊尘、徐咏青、汪绮云、钱病鹤等，所作无非为人物、仕女、飞禽、走兽、风景、习俗、戏剧、讽世，是以图画为尚的真正画报。后来《申报》请戈公振主编《申报画报》，那是以摄影为主而用道林纸影写版印，名为画报，实为摄影报。《申报画报》受战事影响而停刊。《时报》的黄伯惠爱好摄影成癖，他请戈公振编《时报画报》，很受读者欢迎。毕倚虹看了眼热，也就办起《上海画报》来，许窥豹、曾师竹做他的助手，三日出版一期。恰巧五卅惨案发生，他罗致了许多使人惊心触目的照片，铸版刊印出来。倚虹一枝笔轻灵隽永，他自己写了一些具有新闻性的小品文及打油诗，加上杨云史、周瘦鹃、陈小蝶的笔札，配了文史性的铜版图，居然轰动一时，读者纷纷预订，收得一笔为数很大的报费。倚虹是挥霍惯了的，坐汽车，讲排场，只几个月，报费就给他花掉了，《画报》无法维持下去 甚至办事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只得把《画报》盘给钱芥尘。钱芥尘接办后，请余大雄、沈能毅、查士端三人协助他，并请周瘦鹃每期撰稿一篇，余空我、鄂吕弓、舒舍予、赵君豪、范烟桥、张丹翁、陈冷血、袁寒云、包天笑、张冥飞和我等都为之执笔写稿。摄影家黄梅生摄了许多名媛、坤伶、美术家、电影明星及新闻照

片，充实了《画报》的篇幅。钱芥尘藏扇甚多，逐期刊印《百扇图》，在版面上是很热闹活泼的。芥尘尚不满足于既有的成绩，他和戈公振交谊很深，请他罗致名贵照片。有一次戈公振在《时报》馆随意取了些图照，装入一个很大的信封，放在办公桌上，预嘱馆役送给钱芥尘，而他自己却有事它去，不意黄伯惠走来，发现信封没有封好，抽出来一看，其中有的图照《时报》已用过，有的没有用过，认为戈公振吃他的饭，干别人的事，大不以为然，于是把图照扣留，仅以空信封遣馆役送去。戈公振知道了，很不高兴，不久，便离职出国。后来，钱芥尘谈到此事，犹不胜内疚，觉得很对不起戈公振。

自《上海画报》创刊后，相类似的有《三日画报》、《中国画报》、《骆驼画报》和《紫葡萄报》。《三日画报》是张光宇、刘豁公两人主办的，邀了步林屋、袁寒云、顾肯夫等写稿，只刊行十六期即止，包天笑的长篇小说《黑海银灯》，未能完稿。《中国画报》，由松江闻野鹤主持辑政，有周瘦鹃、潘毅华等撰写作品。这时上海诗谜风靡一时，到处有诗谜社，各游艺场设列许多诗谜摊，成为变相的赌博。该《画报》上就有早雁词人的长篇小说《诗谜秘史》，也是不了而了。这个《画报》的寿命更短，只出了六期。《骆驼画报》是安徽人在上海办的，当时苏沪一带，往往称安徽人为"徽骆驼"，不知何所取义，于是一般皖籍作者组织《骆驼会》，大有名我固当之概。后来，《骆驼会》办了个《骆驼画报》，主持者为曹梦鱼。写稿的最初限于皖籍人士，后来就放宽了。也是三日刊，执笔最勤的有余空我、王梅癯、王天恨、张慧剑、刘豁公、张秋虫等，郑曼陀、丁悚、张荻寒等的画，以及朗静山的摄影，也很精采，出至六十期止。《紫葡萄画报》出了十七期，由周瘦鹃主辑，颇多希见的图照。文字有范

烟桥的《三十三年落花梦考》，及《长春宫的剩粉残脂》、陈蝶仙的《栩园联话》、曹血侠的《吴孚威退鸡公山秘闻》，以及我的《訾腾杂记》等，可谓图文并茂。

别树一帜的，有《摄影画报》，每星期六出版。这个《画报》是怎样办起来的呢？原来林泽苍、庞亦鹏、丁惠康三人在某处参加宴会，彼此闲谈时，谈到市上的画报，他们认为所有的画报，照片都欠精美。他们都是摄影爱好者，说得高兴时便决定自己办一张注重照片的画报。林泽苍和一家专售照相材料的柯达公司的大班很有交情，就拉登广告，柯达大班答应他每期出广告费二十元，每月四期，共八十元。他们有了这笔钱作为基础，便毅然刊行，先取名《画报》。这一下很使报贩为难。因为市上画报种类很多，读者购买时，报贩就要问你买《上海画报》，还是《三日画报》，单称《画报》，很不明确。所以出了四五个月，便加上"摄影"两字，成为《摄影画报》，每期辟"摄影研究栏"，作为中国摄影学会的周刊。并请赵君豪担任文字编辑，注重文艺作品。继之有吴微雨、吴农花、张若谷、黄转陶、褚保衡主持笔政。由于吴微雨那时兼编《福尔摩斯报》，所以《摄影画报》征求订户，每期附赠《福尔摩斯》。微雨编辑时，刊物风格和君豪编辑时不同，他注重新闻消息，稿子不多，他们就请《福尔摩斯报》的作者写稿，经常充实篇幅，同时沈吉诚又供给些学校新闻，在画报上时常见到沈的名儿，读者往往把他作为该报的编者。吴农花主编时，又加强学校消息，若干著名的学校，都有特约撰稿员，上海的大中学学生大多数喜欢看，因此销数很不错。林泽苍为了增加读者兴趣，别辟插图一栏，这种插图，往往由几个针对时局的字样配合而成，粗看如一图，细看却不然，每期发表一幅，请读者猜测，猜中的备有赠品，或赠

报三个月。张若谷注重新文艺，长稿太多，文字又超过图照，版面比较呆板，不合读者口味，销数突然下降。后来，黄转陶、褚保衡煞费苦心，销数才得恢复。到各种画报停刊，画报高潮已过去，《摄影画报》还维持了相当时期，所以在画报中，它的寿命要算最长的了。

“死作雄鬼”的朱惺公

《大美晚报》创刊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为英文《大美晚报》的中文版，风格多少带些美国味儿。总经理兼主笔为西人T．O．THACKREY，经理兼主笔为中国人程树仁。它在上海中文报纸中，可谓是别开生面者。每晚发行两张。《大美晚报》的附刊《夜光》，一九三八年起由朱惺公担任主编。朱惺公一署朱松庐，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硬汉。上海沦为孤岛后，惺公在《夜光》版上发表反对汪派媚敌的文章，结果收到一封具名“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恐吓信，威胁说：“如再恶意谩骂，将被国法宣判死刑”。惺公不但毫不畏惧，而且针锋相对，在《夜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一文。原文很长，节录数段如下：

“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二年来之寄生孤岛，早如待死之囚，所以不死者，乃刑之尚未遍及无辜。余乃叨天之幸，直至今日，仍得以不死之身，借文字与孤岛人士相见，今贵部将宣判余之死刑矣！此诚余之宠幸也！盖以如此死法，死为烈士矣。烈士，死之最光荣者也，余一介寒士，庸懦无能，安足当此！余自信不能为烈士，余友皆谓余未必能为烈士，今贵部乃欲以此嘉名宠赐于余，是则安得不令余自抚昂藏，频摸头颅，亦如汪精卫先生当年‘慷慨歌燕市，不负少年头’所发之豪语。余之头颅能得为无情之枪弹所贯，头颅乃不得谓为无价，头颅有价，死何憾乎！虽然，死则死耳，死必死得清白，而不作糊涂之

鬼。兹当贵部尚在容忍之日，余不能无一词以为辩，是以在将死未死之前，披肝沥胆而自为之供，所以答贵部者，亦即所以告社会人士知余死之而不冤也。"又："秦桧，误国之大奸也，究无通敌作伥之史证。而今日之汪精卫则不然，居然将欲欣膺伪命，袍笏登场矣。是则汪精卫已由秦桧而进一步作刘豫受金主齐王之封矣。以奸恶如刘豫者，而欲国人不反对，是则除非将中国人皆杀尽，方可安享其永久之禄位。否则，中国如尚有一人，必将誓死以反对。余固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又："嗟夫！余今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屈服，惟有作待死之囚矣！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哉吾弟！复何怨？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诫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死，汝如长大，必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将亦雀跃而告余之妻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歆格，尚飨。'至是余之英灵，必将彪炳于云霄之上，而与日月争光，照遍全中国任何黑暗阴霾之面，而追寻文文山、李若水之魂，相与共话亡国之痛矣！言尽于此，即此可代遗嘱，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被苍者天，其必佑我。……余生作庸人，死作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者矣。"

这篇洋溢着民族气节，对汪伪极尽讽刺之能事的文章发表后，一九三九年秋的一个下午，朱惺公从盆汤弄（今山西路南京东路）寓所步行去报馆时，突然被暴徒狙击，弹中太阳穴而死。他的遗体，后来葬于沪西虹桥烈士丛墓中。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大美晚报》是中文报纸中最先采用横排的报纸。在这之前的中文报纸都是直排的，《大美晚报》创刊后，打算把所有新闻报道以及附刊小品全部改为横排，借

以一新观瞻。他们深恐读者一时不习惯于看横排报纸，而影响销路，乃用变通办法，先把评论一页排为横式，以作试探，果然读者不赞成，纷纷致函反对。这样试行了一个月，该报又把评论一页恢复为直排。可见新事物的推行很不容易啊！

小型报中的“四金刚”

民国以来，出版了许多小型报刊，其中有所谓“四金刚”，那是小型报中具有代表性的。“四金刚”是《晶报》、《金钢钻报》、《福尔摩斯》、《罗宾汉》。

先谈《晶报》。该报在“四金刚”中是出版最早的，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起初作为《神州日报》的附送品，但也可以单独订购，这样一来，《晶报》便别树一帜，销数日益增加，后来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在上海，订阅《申报》和《新闻报》的，几乎都是《晶报》的订户。它为什么这样好销呢？那是有原因的。当时报纸不是由邮电局发行，而是归报贩推销的。报贩中的头儿脑儿，是很有力量的。报纸要有销路，一方面取决于报纸的内容，另一方面却要好好地请报贩设法推销。《晶报》主持者余大雄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居然如愿以偿。原来那时一般订户不订《申报》的，便订《新闻报》，不订《新闻报》的，便订《申报》；不论《申报》和《新闻报》，每月报资都是九角。《晶报》所以取名为“晶”，是因为“晶”字由三个日字合成，就是说明报纸是三日刊，每月报资为一角。报贩就利用这一点，向订户介绍《晶报》怎样的趣味化，怎样的雅俗共赏；还说什么：看了大报该备份小报，作为工余的消遣；订一份大报，每月九角，付了一块钱，省得多一找头，附送一份《晶报》，就是两得其便。大多数订户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同意这样办，于是《晶报》的销路就打开了。

《晶报》主持者为余穀民，别署大雄，有时署名宝凤、神狮。他是安徽人，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大共和日报》和《神州日报》记者。他善于交际，认识很多人。他主持《晶报》时，不惜脚步，时常奔走于作者之门，因有"脚编辑"之称，先后特约了张丹斧、袁寒云、何海鸣、孙玉声、李涵秋、包天笑、毕倚虹、冯叔鸾、冯小隐、宣古愚、周今觉、徐凌霄、宋春舫、钱芥尘、张春帆、徐卓呆、周瘦鹃、姚民哀、江红蕉、宋小坡、黄转陶、姚鹓雏、侯疑始、步林屋、王削颖、严独鹤、王西神、谈老谈、范君博、汪子实、俞逸芬、胡寄尘、陈小蝶、邵飘萍、吴观蠡、张庆霖、朱天目、欧阳予倩等写稿，沈泊尘、丁慕琴、黄文农、张光宇、叶浅予、杨清磬等作画。这些作者，当时都是颇有声誉的，阵容是很强的。每篇题目，往往用原迹木刻，在版面上显得生动活泼。后来因为有些作者，化名不愿给人知道，用原迹刻印出来，容易被人辨认，所以题目也有由该馆职员代写，不一定是原来手迹了。第一篇总是张丹斧的俏皮短文或打油诗，他玩世不恭，笔墨又很尖刻，人们喻之为"毒蛇"，他便以"张蛇"自居。他又喜摩挲古泉、古印、古文物，经常在报上和宣古愚、袁寒云等研讨，有时引起争论，有骨董癖的读者，很感兴趣。其它如寒云的《辛丙秘苑》及《新华私乘》、《宾筵随笔》，瘿公的《宝盖图官秘记》，拈花（即包天笑化名）的《记张謇与余沈寿事》，漱六山房主人的《秋星泪语》，天倪的《人海忆语》，林琴南的《畏庐杂录》，周今觉的《邮话》，垂云阁主的《京伶百评》，姚民哀的《歌场赘语》等，都有号召力。长篇小说，有李涵秋的《爱克司光录》，包天笑的《一年有半》，张恨水的《锦片前程》，姚鹓雏的《夕阳红槛录》，漱六山房主人的《最新九尾龟》等，爱读的也不乏其人。可是，一九三〇年左右，该报由三日刊改为日刊

以后，内容大不如前。及至抗战军兴，余穀民丧失民族气节，靦颜事仇，该报由钱芥尘接办，吴农花、孙筹成担任编辑。上海沦陷，日军进驻租界后，该报的寿命也就告终。

四金刚的第二位，便是《金钢钻报》，创刊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八日，报头题字，出于大书家曾农髯手笔。它的创刊，是有来由的：原来，《晶报》主持者余穀民喜欢在报纸上骂人，不管当骂不当骂，他都一味的谩骂，这样引起笔战，报纸的销路也就进一步打开了。当时陆澹安、朱大可、施济群、孙玉声等，都在被骂之列。陆澹安有戏癖，他对京剧名旦黄玉麟（艺名绿牡丹）写过颇多表扬作品，曾刊《绿牡丹集》。余穀民请毕倚虹撰文讽刺，说陆澹安"中了绿气"（这时化学元素之一的"氯"字，还没有通用，"氯"都写为"绿"），"绿"指绿牡丹而言。澹安等大不以为然，便创刊一报和它对垒，取名为《金钢钻》，其意为：金钢钻的硬度在水晶之上，"以钻刻晶"，迎刃而解，这样和《晶报》开起笔战来，就有了地盘。该报由十位同文发起，共同负责编撰，没有主编的名义。由于澹安常写第一篇小言，毕倚虹就认为澹安是该报的主编，向法院控告澹安"公然侮辱人格"，澹安就被传到法院，他侃侃而谈，理由充分，法院无从判罪，也就不了而了。

《钻报》本来是不预备长期刊行的，可是经过涉讼，引起一般小市民的注意，销数却不错，于是也就长期刊行下去。十个发起人中，九个人都有工作，济群较为空闲，编辑就由他担任。后来报务发展了，济群对内对外忙不过来，就请人主编。若干年来，人事变迁，编辑换了很多人，主撰者也常有变动。据我所知，编辑除济群外，尚有韦兰史、冯梦云、张恂子、沈秋雁等，我也担任过较长时间的编辑。这张四开的报纸，辟了"小金钢

钻”、“新金钢钻”、“金钢扶轮会”等栏，除特邀了原来的“元勋”陆澹安、朱大可、孙玉声外，又请陆士谔、王小逸、金季鹤、范烟桥、卢溢芳、胡梯维、黄转陶、顾佛影、俞逸芬、火雪明、何立三、许息盦、施叔范、黄南丁、胡憨珠、尤爱梅等，轮流担任分编辑。《游艺界》开辟后，由倪高风主持，各具机杼，版面非常活泼。我每天撰一篇，标题《清言霏玉》。济群自己也经常写稿，署名济公或老衲，也是很风趣的。在这一阶段，长篇小说先后刊载的，有陆澹安的《落花流水》（没有登完），张恨水的《铁血情丝》，顾明道的《龙山王》，汪仲贤的《恼人春色》，孽云生的《黄熟梅子》（以上四种，后来都刊单行本），张恂子的《虎窟双雏》，王小逸的《天外奇峰》（这篇小说很特别，不称第一回第二回，而称第一峰第二峰），金季鹤的《吴趋影事录》。笔记连载比较突出的，有朱大可的《嘤鸣诗话》，朱其石的《赍盦论印琐录》，谢玉岑的《墨林新语》，胡石予的《画梅赘语》，莽书生的《文坛点将录》，孙玉声的《旧上海新上海竹枝词》及《沪壖话旧录》。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他是一位真正的老上海，什么都懂得，且记忆力特别好，不论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声色犬马、人物掌故，以及社会隽闻等等，每天撰写一篇，连刊了两年左右，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可惜没有汇刊成书，报纸散佚，无从搜集，否则确是研究上海史的大好资料哩。

该报特约写稿的很多，写新闻的有王均卿、陆丹林、蒋剑侯、陆诒、蒋叔良、王水史、汪漱碧、孙纪于诸人，多数人是化名。有江秋蓼其人，专写北里花讯，他排行第四，人家叫他“江四”，北里中人以江四谐音“钢丝”，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钢丝包车”的绰号，他写稿也就以“钢丝包车”署名。绘插图最久的为沈延哲，沈绘了一幅漫画，一人穿了一件长袍，袍上满缀

$图文，迈步进入一门，门旁有一标语“衙门堂堂开”，盖歇后语尚有所谓“有理无钱莫进来”，暗讽当时司法界的黑暗，结果被法院控告，把我传去，被判罚金三百元，这很使我不高兴，便离职不干，由陈蝶衣继任，至抗战前夕停刊。

济群曾撷取《钻报》菁华，刊行《金钢钻月刊》，共十六期。

《福尔摩斯》为“四金刚”的第三位，创刊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三日。最初馆址设于香粉弄，一切很简陋，主持者是吴微雨、胡雄飞，后来加入姚吉光。原来有一天，吴微雨、胡雄飞在春江楼茶室喝茶，偶然谈起市上小报情形，觉得都不能使人满意，决定自己创办一张报纸。谈后便积极筹集股本，找寻馆址。一切就绪，但一时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报名。吴微雨主张取名《平报》，但觉得叫起来不响亮，胡雄飞主张取名《快报》，又觉得报既三日一刊，“快”字名实不符，正在苦思冥索时，忽然看到案头置一《福尔摩斯探案》，认为福尔摩斯四个字很新颖，用此报名也具有深意，结果就决定《福尔摩斯》了。

该报主持者作风大胆，什么都要揭发，以致纠纷交涉，对簿公庭，那是经常的事。被涉及的人往往控告该报，致屡被罚款。可是每发生一次交涉，或者吃一次官司，他们都把它公诸报端，希望获得社会人士的公允评判。主持者还这样说：“假使办了一张报，这篇稿子也不敢登，那篇稿子登出来，又恐得罪人，不愿登，请问这种报，还能具有真实记载吗？”当时有一进步青年写了一部《赤人传》，任何刊物都不敢用，该报却把它连续登载，结果招来很多麻烦，卒被国民党禁止，只能不了而了。其它长篇作品，有吴双人署名“而已”的《走马英雄传》。

吴农花、胡憨珠、平襟亚、贺芗坨、秦瘦鸥、陈听潮、陈存

仁、沈吉诚等，都是该报主撰者。农花乃吴微雨的弟弟，也是一枝健笔，胡憨珠是《时事新报》的外勤记者，所以新闻材料很多。他和当时大新舞台有特殊关系，关于京剧的消息，也比任何人灵通，他就化名"跑龙套"、"探子报"，写了许多戏稿，很受一般戏迷的欢迎。还有一位署名"华生"及"白帝"的，常从姚公鹤、黄警顽那里得到新闻，加以渲染，也很出色。该报销数一高，不料引起一些同业的嫉妒，有人照着该报的格式及广告等，一模一样的印了一万多份，其内容却是触犯刑章的文字。当时小型报纸一出版，便送到望平街报贩头子处，由报贩分销。这张伪造的《福尔摩斯》送得特别早，报贩头子当然不知其中的狡狯，报纸一到，就分给各报贩，送各订户和沿路出卖了。等到那真正的《福尔摩斯》送到，闹了个双包案，反使人莫名其妙。结果由于文字触犯刑章，该报又遭到了许多麻烦。

该报是三日刊，一九三〇年改为日刊，由姚吉光独办。

"四金刚"的第四位是《罗宾汉》，出版迟于以上三报。主持该报的为周世勋和朱瘦竹。最初名《三四报》，每天出版，注重电影和戏剧消息，有一次登了一篇秽亵小文，因攸关风化，被法院判罚一百元。经此挫折，报就停刊，另出《天雷报》。该报开始每天出版，后因稿荒，改为三日刊。可是销数不佳，周世勋动了脑筋，恰巧这时舶来电影"侠盗罗宾汉"轰动一时，他就把《天雷报》改名《罗宾汉》，经这一改，居然销数激增，站住了脚。周世勋出入于电影界，电影消息很多，又拉了熟于戏剧的朱瘦竹来，充实戏剧消息。朱瘦竹供职天蟾舞台，这样，戏剧消息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但瘦竹不肯得罪人，对于名伶只褒不贬，有是无非，读者认为不够刺激。周世勋笔墨较为横厉尖锐，各家影片公司摄制新片时，深恐周世勋在报上加以恶

评，总在该报登一广告，买个交情，所以该报广告收入尚不错。后来汤笔花专任广告事宜，四处兜揽，刊例不一，也就滥了。

周世勋和朱瘦竹，写作非常敏捷，所以报上稿件，大都由他们两人包办，如署名“铁手”、“唯唯”、“亨丁丹”、“观海生”等，为周世勋所作，署名“保罗”、“腓力”、“西门”、“雅谷”、“彼得”、“约翰”等，为朱瘦竹所作。李元龙是票友又兼电影家，左右逢源，义务担任写稿，那署名“黑旋风”、“四骑士”的便是他。馆中一切事务都由张禹门负责。该报从不脱期，晨间送望平街比任何报纸都早，因为他们早一天发稿，早一天印就。但缺点是：消息也就不及其它报纸灵通、新鲜了。

别树一帜的《小日报》

民初的小型报，大都是三日刊。创始每日刊行的是《小日报》，这在当时的确是别树一帜的。

最早的《小日报》，是扬州韩天受主办的，因为办得不好，没有销路，只一个多月便停刊了。过了一个时候，舒舍予（不是老舍）想办一个三日刊的小报，请钱芥尘写稿，芥尘说："与其办三日刊，不如来个日刊，倒可以轰动一时。"舍予考虑了一下，认为天天出版，要闹稿荒，拟办两日刊。芥尘坚持他的原意，说："不办则已，办则非日刊不可；稿子没有，我来帮助你拉稿。"舍予有了靠山，便决定办日刊，邀了天受的兄弟啸虎合伙来办，取名《小日报》，请沈吉诚担任编辑，由芥尘转请袁寒云写了报头，创刊号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出版。这时毕倚虹逝世，倚虹夫人缪氏，整理倚虹遗著《天赐楼笔记》及《旧记》五册，由芥尘介绍，给《小日报》排日登载，很受读者欢迎。芥尘还拉张丹斧、步林屋、江红蕉、余空我等写稿。由于稿费开支很大，沈吉诚一向和电影公司打交道，便请各电影公司帮忙登了许多电影广告，不料广告费收不到，办了两个月，亏蚀了一千多元。舒、韩二人不想再办下去了。这时与钱芥尘合办《上海画报》的查士端，认为《小日报》销数尚不差，停掉可惜，就约了黄光益接办该报，请冯梦云当编辑。梦云一执笔政，就力主取消稿费，节省开支，一方面把八开的报纸改为四开，同时竭力拉拢徐小倩、史超雄等写义务稿。但因为内容不精彩，加之

印刷所时常延误，以致一再脱期，所以销数大大下降，查也心灰意懒了。有一天，查因事访包天笑，谈到拟将《小日报》让渡与人，天笑劝他说："认真办下去，上海每天出版的小型报，只此一家，未必没有希望。"可是查仍想不干。不久，姚苏凤忽有办小报的兴头，他曾与刘恨我办过《虎报》，正想把《虎报》复刊，这给包天笑知道了，天笑和苏凤有世谊，就向苏凤建议：《虎报》早已冷了场，不如接办《小日报》。苏凤也以为然，但一个人单干，没有力量，后来邀江红蕉、黄转陶、范烟桥、包天笑参加，与查士端、黄光益合为七股，议定每个股东，除分摊资金以外，尚须每日写稿两篇，作为基本稿，编辑由大家负责。但对外的编辑主任名义，没人肯自居。查士端异想天开地说："我们一共七人合作，且复友善，可以媲美晋代竹林七贤，我们就用'林七贤'的名义来担任编辑主任吧！"

后来又加入了尤半狂、杜进高协助辑务，尤用"铁蛇道人"的化名，写了许多有关张宗昌的秘闻轶事，称为《稷门余腥录》。张毅汉绘插图，署名"飞将军"，销数又复上升，维持了数年，终于停刊。

小型报中的《大报》

所谓小型报中的大报，实际上是一种小型报，命名夸张，称为《大报》而已。该报创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三日刊，步林屋、徐朗西、郑子褒主持辑政，丁慕琴、张光宇、刘海粟、姚吉光先后担任插画。馆址设于西藏路育仁里五百七十七号步林屋的寓所中。

该报的主要文章有孙癯蝯的《好春簃杂缀》及《歙廛诗话》，郑正秋的《说中国影戏》，漱六山房的《画眉浅说》及《髻之沿革史》，袁寒云的《梨园影事》及《岁阑杂兴》，俞粟庐的《度曲刍言》，步林屋的《异闻录》及《歌场杂记》，周今觉的《栖心室脞谭》，菊影的《坤伶小史》等。还有袁世凯遗作《戊戌纪略》，确是值得参考的史料。此外如马二先生的《啸虹轩忆语》及《三国京剧考》，老拙的《伤心人语》，梅真（寒云夫人）的《倦绣室词》，还有某某的《百丐图》，都是连载的。担任排版的张声扬，据说是坤伶王克琴的丈夫。

铜版图多为名伶照片及名人书札，如樊云门、吴昌硕、冯君木、郑大鹤、侯疑始、曾农髯、康有为、袁寒云、张丹斧等，都很精雅。出至二百三十七号，为了某事，被罚二百元，林屋以言论不自由，甚为懊丧，停刊一年。一九二八年元旦复刊，俞逸芬助理辑务，但已是强弩之末，内容大不如前，出至三百数十期结束。

一九四三年，又有一种命名《大报》的小型报出版，每天刊

行。馆址设于北京路一百五十九号，和步林屋的《大报》不相干。该报分四版，第一版所载的，大都是社会新闻，但在新闻中却刊载着包天笑的长篇小说《上海大变》。第二版由吕白华编辑，载长篇小说王小逸的《花外莺声》，谭雯的《唐玄奘西游猎奇》。连载的作品，尚有李伯琦的《客窗随笔》，丁福保的《历代钱币考》，风人的《海上新竹枝》，李家咸的《合肥名胜杂咏笺注》，马公愚的《耕石簃题画诗》，吕白华的《匣剑篇》，驹光的《东西南北集》等。还有钱萼孙、白蕉、周岐隐、孙筹成、杨赫文、朱铭新、离石等的短文。第三版由我编辑，载程小青的探案《赤练蛇》，顾明道的武侠长篇《胭脂盗》。我每天撰一篇《梅龛散记》。金季鹤的《有无涯斋忆语》，徐卓呆的《东宝之由来》，陈涵度的《宝娑罗室随笔》，培中的《造型的艺术》，范君博的《十国新词》，李晓耘的《遂庵杂录》，都是连载的。吕伯攸、张毅汉、沧粟经常供稿。第四版为游艺消息，篇幅较小，因有广告占据了一大半。共出一百数十期，以经费支绌，停止出版。

隔了五年，在一九四九年春，又有命名《大报》的小型报出版，馆址设在河南中路三百六十八号。编辑者陈蝶衣，直到解放后，尚出版了相当时期，结果并入《新民报》。该报登过的长篇小说有李薰风的《丹凤朝阳》，张恨水的《醉春风》及《西风残照图》，少史氏的《金龙殿》，田舍郎的《花事了》，公孙拜（卢冀野化名）的《齐云楼》，孙了红的《绿色之烛》。第一版为新闻，第二、第三版为小说、笔记和散文，第四版为家庭常识和戏剧。也是日刊性质。

大报中的小型报——《立报》

什么叫做大报中的小型报？因为它规模较大，排场和大型报不相上下，可是形式却与小型报相同，这张报纸就是《立报》。它创刊于一九三五年，馆址设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和《新闻报》馆望衡对宇，由成舍我担任社长。舍我名平，湖南湘乡人，在北方办报多年，富有经验。《立报》出版时提出一个口号："新闻大众化"。它的特色之一，就是版面上不登任何广告。当时上海各报，都把广告作为大宗收入，而成舍我则认为一张四开小报，广告多了，无异喧宾夺主，侵占了新闻地位，不如摈除广告，让报纸多登一些文章。当时上海各报的发行，均归报贩支配，大报贩之下，有小报贩，小报贩之下，又有小小报贩，这种职业是世袭的，势力很大，报社不遂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从中作梗。但《立报》不买他们的账，自己备了一百辆自行车，每晨八时前直接送给订户。此外，还雇了一些失学和失业的青年在街头巷尾及公共车辆站头叫卖，销路也就打开了。

该报有三个副刊，第一个副刊，名为《言林》，主编为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是给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看的，在严肃中带些趣味性。第二个副刊，名为《花果山》，主编先后有张友鸾、吴秋尘、张聊止、张恨水、包天笑、蒋剑侯。每期有《山中人语》，那是主编者所撰的短篇的小言。这是给一般市民、自由职业者与商人们看的。第三个副刊，名为《小茶馆》，那是总编辑萨空了自己编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劳动者，极力为劳工呼吁。那

署名"小记者"的严谔声，是继萨空了之后的主编。

包天笑写过《我与新闻界》一文，其中谈到《立报》，摘录如下："立报的组织是如此的，约同志若干人，凑集十万元，作为股本，将十万元存在银行中，公同保管，到了这十万元用完的时候，再行开股东会商议增资。结果，这十万元并未用罄，而报纸已足以自给了。每份定价，全年是四元，零售铜元三枚。最多的时候，越申、新两报，曾销到十数万份。因此之故，到了事变以前，《立报》停刊的时候，银行里的十万元，还是十万元，却多了两部机器，以及铅字之类。立报馆曾招考了几位练习生，这些青年，有的高中毕业，有的初入大学，而都是有志于新闻事业的。这比在学校中死读新闻学的人要好得多。练习生有适宜于外勤的，有适宜于内勤的，各就其性之所近，可以分任，又可以互相磨练。对于新闻事业确是有一种天才，欧美人称之为'新闻鼻'。说来新闻记者不要生气，新闻记者的鼻子，要似猎狗一般，在空气中一嗅，便知道何处有新闻，此其所以为'新闻鼻'呀！《立报》不但是编辑上招了练习生，它的排字房里一班青年职工，也都是训练过的。这些人都是北方人，是成舍我在北方办报训练成功，带到南方来的。这些青年职工很可爱，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受过相当教育，他们而且会写稿子。我在编副刊时，他们常投稿，思想意识而且颇前进咧！因此《立报》的职工，和上海别家报馆的职工不通气，别家报馆往往闹罢工，而《立报》却不受他们的影响，现在办小型报的，都想追踪《立报》，但谈何容易呢！"

《立报》的消息是很灵通的，如当年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放，七君子被捕等重要消息，在上海报纸首先发表的就是萨空了主持的《立报》。《立报》的消息之所以灵通，

与朱广生其人有关。该报备有收报机，负责收报的朱广生，为人勤勉耐劳，常昼夜不停的寻找各地所发电讯。无讯可收或睡觉时，他也从不摘下耳机，一听到呼号就立即收听，故其所得电讯特别多。"西安事变"时，从西安发出的电讯均系明码，朱收到后，知道事关重大，便迅速通知编辑部采访科，由采访科派人证实，立即刊出。当时其他报纸对此都一无所知，甚至有打电话来询问此消息是否确实的。后来蒋介石被释放，消息来自端纳所发的英文报告，为朱广生首先收到，《立报》发表后，南京方面始知道此事。"七君子"被捕的事，是张曼君亲自打电话通知《立报》的，时已凌晨五时，报纸已开机付印，编辑部中仅有两人未走，当即决定停印，立即写稿，写一行排一行，排一行校一行。出报时间虽较平日略迟，但销数突由四万份增至八万多份，上午九时印机方停。

一九三六年，物价飞腾，《立报》不得已提高售价，可是这一下却使销数大大地下降。加之日寇势力将及上海，便停止发行。

2 038 6715 5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书报话旧
作者=郑逸梅
页数=264
SS号=10293854
出版日期=